Shengshi

盛世

中國，2013年



陳冠中小說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是最好的。— Voltaire

OXFORD

陈冠中

原籍宁波，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曾住台北六年，现居北京。1976 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曾在 90 年代中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太阳膏的梦》、《总统的故事》、《什么都没有发生》、《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西米亚中国》（合著）、《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移动的边界》、《事后：本土文化志》、《城市九章》。

献给 于奇

目 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一部

1

不久的将来

第一个久违的人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是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许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解，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来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止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第二个久违的人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二零零四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记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那天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逢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以我跟

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现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著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支吾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支吾应对。

她继续：“太好了，我就知道。刚才在书店看到你走下楼梯，我就在想，老陈会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楼梯等你上来。”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个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人。我喜欢别人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指一下长椅说：“我们坐一会。”

我这个建议是对的，坐下后她放松了，闭上眼睛说：“终于，终于。”

他曾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这么多年轮廓和体型都没有变样，可是脸缺保养多了皱纹，头发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发忧郁。

她好像在闭目养神。我看着看着，怦然心动一下，还是喜欢这个女人，我喜欢忧郁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说：“我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恋。”

我说：“别犯傻，谁不孤独，再孤独也得活着。”

她没有理会我的陈腔滥调：“没人记，我记。没人说，我说。难道是我疯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没人管。”

我喜欢她说北京话的腔调。

她闭着眼睛说："你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怎么就这么多年都不见，你说说。"

"我以为你出国了呢。"

"没有！"

"没有就好，现在大家都说，哪里都不如中国。"

她睁开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无表情。她露出笑容："亏你有心情开玩笑。"我哪是在开玩笑，但我立即顺着她，也笑一笑。

她说："差点以为是我儿子在说话。"

"你儿子，刚才你说不要说他，你们怎么啦？"

她语气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学，入了党。"

我含糊说："那，很好，将来好找工作！"

她说："他要进中宣部。"

我以为听错，该是中移动、中石化、中银、中信之类吧。"中宣部？"

小希点头。

我说："中宣部可以报考吗？"

"他说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没话。你见着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与小希挨坐着，有一种幸福感。好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园来消磨时间了，也有些烟民在抽烟……烟民？两位烟民一根烟抽完，再抽第二根。我爱看侦探推理小说，我还真写过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情景很有幻想余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节。不过在现实里，我只是个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畅销书作家，并无一点被跟踪的价值。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烟民，很平常。

我听小希还在向我倾诉：“这算添乱吗？算折腾吗？是，这儿没我的事，但是总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说变就变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么刺激？她儿子，还是她个人噩梦般的过去有后遗症？

她看着我说：“有一次在蓝旗营一家小馆，跟一个你们台湾男人相亲，是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资世界大局，没完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把我闷得，到我刚说了几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训我，说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气坏了，真想抽他，太可恶了。”

“台湾男人也不见得个个如此”，我觉得有必要替“我们”台湾男人说句话，然后好奇地问：“后来你跟那人怎么啦？”

她现出笑容：“他只顾着教训我，屁股就坐了一个椅子边儿，隔桌有个挺高挺壮的男孩结完帐起来，走过的时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噗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问。

小希：“年轻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么表示？”

“什么表示？就走了呗！乐死我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倒真想认识。”

我有点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得很。我现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见过太多暴力，难免受影响，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不敢和她过分接近的原因。“那台湾男人后来怎样？”

“他凶巴巴的站起来，想开骂，又找不到对象，就骂了一句‘没文化’。你看，你们台湾人还是看不起我们。”

“现在哪敢？”我知道以前两岸三地人心底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过现在怕都改变了。

我问：“那次相亲就黄了？”

小希说：“人家想找年轻的。”

我心想，女人不该不染头发。“你生活还可以吗？”

她锁一下额，翘一下嘴，在阳光下暴露了更多皱纹：“生活可以，周围的人都变了，心里难受，现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没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脸茫然的望着前方地面。顺着它的目光看过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筛落的一地斑驳碎影吸引了她，还是她忽然想起些什么而走神了？片刻，她回过神来：“哎呀，我得走了，待会高峰车挤。”

我把名片给她：“我们约吃饭，跟你妈、儿子。”

她温柔的说：“看吧。”她站起来，说一声“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还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从后面看还真有看头，身材、动姿都像年轻女人。她从公园南侧出去，我愉悦的漫步走向公园东侧出口，突然想起两个烟民，转身一看，发觉他们也已走到公园南侧出口处，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术馆方向，走出我的视线，那两个烟民等了几秒钟，也跟着往美术馆方向走。

三里屯的盛世

我不想马上回家，打车到三里屯太古村找星巴克坐坐。自从旺旺集团收购了星巴克之后，一些中式饮品就被开发成了全球化饮品，像我手中的桂圆龙井拿铁，口味就非常好，据说巴格达、贝鲁特、喀布尔等伊斯兰重建城市都在热卖，连非洲的安哥拉卢安达、苏丹喀士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都开了店，是星巴克旺旺与一家叫欧非拉友谊投资公司的中资企业共同开发的新市场，以后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星巴克旺旺，商业不忘文化，也算是软实力的呈现。

我来这里太对了，心情又好了，我最近常有的幸福感又回来了。你看，世面多热闹，年轻人多好看，加上各国友人、游客，多国际都会！更何况大家都在消费，刺激内需，贡献社会。记得几个月前，有个在社科院研究农村文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外甥女放寒假从兰州来北京玩，住她家，问想去哪里，外甥女说想去 Y 三买衣服，那朋友打电话问我：什么叫 Y 三？这书呆子这真是的，不会上网去查一下？Y 三开始的时候，是阿迪达斯与日本的山本耀司合作的新时装产品品牌，Y 是耀司，三大概是指阿迪达斯的招牌性三斜条设计，牌子在中国做得很火，据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它在北京的旗舰店，正是在我的眼前，太古村星巴克旺旺的侧对面。记得它在零八年奥运前开幕的时候，只占这家阿迪达斯五层总店在四楼的三分之一店面，现在整个地面一层都属于 Y 三。当然，阿迪达斯在太古村也扩充了地盘，占了原来耐克的楼，这些都是在李宁和阿迪达斯两家合并重组以后的事了，要谢就谢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凡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都要含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资本，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享有更多优惠政策，然后想在上海挂牌上市又必须如何如何，细节我忘了，总之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品牌要等国家商务部特批，拿不到特批就请退出十三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市场。

我们在台湾、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以前总认为一个地方要发达起来，是要靠出口，靠节衣缩食小富由俭的累计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才知道内需和消费的重要。中国人肯花钱，救不了全世界也至少可以成就自己。中国就凭这一点成功的转轨了，虽然内部消费在这些年间由百分之三十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再上不去，不过，从方方面面看，还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的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你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毁，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后，稍有起色才没几年，又再度陷入滞涨期，祸延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未能爬出谷底，惟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三怕两拨让经济奇迹般再度起飞，以内需代替枯涸的出口，以主权财富代替已蒸发的外来资本，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单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想到这里，我又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我近来的问题，就是容易感动，有时候还发觉自己眼眶湿湿的。此刻我想起看上去很潦倒的小希，心里有点难过，周围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惟独她好像越活越不舒展。我深呼吸，强忍了一下眼泪。我以前是个很酷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伤感？我没意识到有一颗泪珠竟如漏网之鱼夺眶而出，掉到半杯桂圆龙井拿铁里。我急忙用纸巾擦眼，离开星巴克。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自从 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分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代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只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才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叫韦国。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你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他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还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与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的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

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 in 哪个 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理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计买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周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道。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 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 EQ 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 EQ 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知道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分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 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二零零四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港台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道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声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二零零四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零四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 BOBO 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二零零八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唯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八二、八五、八九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唯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 Batard Montracher 1989 和 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九六四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

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五九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九二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关注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分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就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都还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我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春色撩人夜

看完老电影喝了酒，初春凌晨站在街头上候车，我睡意全消。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朋友，然后去了她的居所。十多年前她还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是个平和的人，但有时候也有需要，那就找她。算起来，已有两年没找，连想都没想，直到最近，直到今天。

没想到，回到家还睡不着，好一个令人心猿意马的春夜。这几天，心里惦着的是一件事，要不要发个电邮给小希？

宋大姐说小希常换电邮，不写，怕她又换了，想联络也联络不上，写呢，我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她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她开餐馆的时候就让我心动不已，当时很多顾客都冲着她而来。我们虽然认识有二十年，可说是老朋友了，但从没在男女方面亲近过，连调情都没有，一个是她身边总是有一群男的围着她，有的好像是哥们，有的是追求者，有的是追求不遂成了哥们。她是身边只有男性朋友没有女性朋友的那种女人，同时却又是那种对自己的魅力没什么自觉的人，以为男性朋友真的只是哥们。我没有下过决心非要跟她好不可，她也没有特别表示过，始终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后来我以为她会跟一个老外结婚嫁到英国去， 看样子没嫁成，不过从那时候算起我有七、八年没跟她联络了。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顾虑就是，她是个会惹麻烦的人。她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性的异见分子，但过去的三十年，政治上的麻烦总是跟着她，完全是因为性格太直，又太固执，简直是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以前，很多人都愿意帮她，包括一些外国人，现在，这样的外国人都不见了，谁都不愿意得罪中共，愿意得罪的大概也拿不到进中国的签证，而她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好好，都不想折腾，我猜想都有点躲着她，所以她上次在小公园才会说周围的人都变了。

跟宋大姐与韦国见面后，我感到小希最近一定又惹麻烦了，我现在也更肯定上次在美术馆旁的小公园，她被跟上了。

如果我跟她好，岂不是她的麻烦变成了我的麻烦？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一切都可以预期，充满幸福感，我犯什么傻？但是如果跟她见面，只要她稍稍表示对我有意思，我会把持不住要跟她好。她是老了很多，脸上多了皱纹，头上多了白发，但我还是喜欢她，包括性方面她都非常吸引我。这才让我害怕，很久没这么想过一个女人。但是，就算一时冲动，我们好了，我跟她肯定还是没办法相处下去，她想像中的我是跟她同声同气十年前的我，其实我就是她所说周围变了的人，我们现在的心境不一样，对现况的判断也不一样，我跟她肯定是话不投机，说不到一块去。我想起台湾当年陈水扁出来选总统连任，不少朋友家庭男方支持国民党，女方支持民进党，夫妻都做不下去。

我对着电脑，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突然，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幸福感。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很明显，就是小希。

小纸条上写着 feichengwuraook@yahoo.com，我看得懂，小老鼠前面是拼音：非诚勿扰 OK。

2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 Google 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 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分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制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

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记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藉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行。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体，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后来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在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店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店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分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但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八九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分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团、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梢。

我很孤独，除了妈以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藉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 Email 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张逗的自述

我，张逗，二十二岁。

现在录影的地点是妙妙的家，在北京怀柔。

我是河南人，父母是农民，我自小有哮喘病，但长得高，十三岁就像人家十六岁，在火车站被拐骗去山西的黑砖窑，前后三年多，做盖房子用的砖，几次哮喘病发差点死掉。曾经试过逃走，被别人救了，送到当地劳动局，又给劳动局的人转卖到另一家黑砖窑。六、七年前，那地区的黑窑厂在全国媒体曝光，很多厂关了，救出不少童工，年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是失踪人口。我见到很多记者，其中包括广州来的妙妙，我们相处的特别好，她叫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妙妙说写得很好，说会替我在媒体发表。之后我被送回家乡，我妈死得早，我爸去南方打工，我又回到学校，重新读初中一年级。

一年多后，受到妙妙的信，说媒体都给打招呼了，不准再报道黑砖窑，以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那篇文章也不能登了，只能交给天涯网发表在网上，跟帖很多，一周后才给和谐掉。妙妙把她的 Email 地址给了我，我去镇里，上网吧发了一封邮件给妙妙，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家里也没人，我想再出去打工。妙妙回邮，叫我去北京找她。她是北京人，已辞掉广州的周报工作，搬回北京。她说现实世界太恐怖，压力太大，宁愿做自由撰稿人，在家工作。

我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到北京怀柔找妙妙。原来她现在也是住在村里。

她叫我跟她住，教我做爱，教我弹木吉他，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有蛋糕、饼干什么的。她有三只猫三只狗，都是捡回来的。她说之前北京因为奥运，大片大片拆迁，很多人把猫狗留下没有带走，所以北京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甚至名种金毛犬都成了肉狗，在农贸市场才七块钱一斤。

我也是她捡来的。我现在哮喘发作也不用害怕了。

她写文电视剧本赚稿费养家，我有时候在附近的宠物诊所打工，因为经常带猫狗去治病跟诊所的人混熟了。妙妙的小院是跟农民买的小产权房，有三间北房，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和带淋浴的厕所。我们和猫猫狗狗过了一年三个月很快乐的日子。那年妙妙三十二岁。

然后听说全国到处大乱，北京也人心惶惶，我们首先想到是到处找猫粮狗粮，怕断粮。后来，人也快断粮了。宣布严打后，局面就稳下来了，但妙妙怕我被抓，不让我出门。我在家呆了一个月。当时粮食还是紧张，很多人都把宠物丢掉，妙妙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来猫狗，有些还是病的、残的。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几十只猫狗。我学会了照顾他们。

那年冬天过后，社会一下子繁荣了，每个人都面露笑容。但对妙妙来说，却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她突然不认得我了，任何人都不认得，见到任何人，她都点头微笑，但不说话，每天，

她只记得喂猫狗，每隔几天会做一批没加糖的曲奇饼，但她不再写稿子、不弹吉他、也不出门，有需要的时候，会跟我做爱，但她不再跟我聊天说话了。

我一直知道，我到北京的一年多，她在以为我看不到的时候，回去吃某种药，所以有时候她会像灵魂出窍一样谁都不认得，不过一般不到半小时就会回神。这次她没有回来。

我知道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光靠打零工养家。所以我做了一件事，希望妙妙原谅。我偷偷卖掉家里的猫狗，尤其是刚生出来的小猫小狗。我不会卖给肉狗商贩。因为经济好了，很多人又开始收养猫狗，我已经挺擅于培养、配种，生一批、卖一批，家里永远有很多猫狗，还好妙妙对猫狗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看到谁就喂谁。

我还每天练三个小时吉他。有几个傍晚，我对妙妙说我去听音乐，她没有反应。我坐长途公交去五道口，到一些以前妙妙带我去过的地方听现场音乐，不听我有点难受。每次，我都碰到几个玩音乐的半熟脸儿，还一起玩过几首歌，他们都很喜欢我那手西班牙吉他，说以后演出时需要吉他手的话会找我。回来后我加紧练习，妙妙，你教我的技法我都练熟了，等着去五道口上台演出。

想不到演出那天晚上我出事了。

我接到电话去演出，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把你和猫狗的晚饭准备好，跟你说了一声，去了五道口。跟之前几次去听音乐一样，演出结束后太晚了，回不来，我就会找个地方打个盹，再坐头班车回来。这次我到了市区后，现在蓝旗营的一家小馆吃点东西，小馆店窄，坐得很密，隔桌是一男一女，男的说话是电视上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那种腔调，滔滔不绝的在说，内容我听不太懂，突然那个阿姨开始说话，是个北京人，我发现她竟然在骂政府。

自从两年多前中国人的盛世正式开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碰到的人都好快乐，很少听到有人说不快乐的事，我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有点怪，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也装得很快乐。所以听到那个阿姨骂政府，我心里感到很特别。没想到那个台湾腔男的竟然教训起那个阿姨，说你们的政府多了不起、多照顾你们，你们大陆人不懂得感恩，你们以为喂饱十三亿人是件容易的事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你们女人懂什么……可能是他不停的说你们、我们，我听着觉得特别扭，结账走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屁股只坐五分之一椅子，我想都不想就猛撞了他椅子一下，他摔在地上，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小馆，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

我去了一家叫五味的音乐现场，那晚上我们的乐队表演不错，现场气氛特好，我也分到二百块钱。其他乐手拉着我喝啤酒，说庆祝我第一次正式演出，一直弄到了两点多。

分手后，我本来想熬到天亮，但是喝了酒有点犯困，就在车站附近一栋楼的侧面，靠墙坐下，打算眯一下。

刚坐下合上眼睛就给五六个人用木棍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连爬起来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台湾腔男人找人打我吗？我虽然身体很壮，但这样打下去可扛不住了。后来突然那几个人就走了。我吸不到气，左手像断了一样，右手压在身下，哮喘药在裤兜没法拿。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看我，我发不出声，手颤动着想告诉他药在裤兜里，那人没反应过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妙妙，我那时想，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妙妙，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该撞人家，现在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

突然我吸到药了，我又可以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壮，打是打不死的。

醒来已在病床上，只听到护士喊：喂，你送来的人醒啦。有个大叔走到床边，我不认识他，我提起精神说，裤子，我裤子。他把我裤子拿过来，我叫他在裤脚小兜里掏出五百多块钱，又叫他拿了纸笔写上怀柔妙妙家地址，猫粮狗粮牌子，分量多少多少，加上面粉，鸡蛋，拜托那人替我买了送去。我也不知道那人拿了我的钱会不会走掉，是否愿意跑到怀柔，我甚至不明白他送我到医院后，为什么还等我醒来。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想着你们断粮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那人回来，说东西已经送过去，有个女人收了，他向她解说我在医院，那女人只微笑的点头，请他吃不甜的曲奇饼。他还说我家猫狗真多。听了我就放心了。

下午他又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照顾我？他说，看我躺在地上喘不过气，手在裤兜上颤动，突然明白我是哮喘患者，因为他也是，也长期用激素。他从口袋找到我的药。

他说，看到我用激素，忽然想知道另一个用激素的哮喘患者，平常是怎么样过的？

我问："知道来干嘛？"

他说："看有没有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他们没哮喘。"

他说："他们很快乐？"

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不是我不快乐。五年前开始我和妙妙在一起不会不快乐，现在妙妙不跟我说话，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不快乐，但是这两年，我发觉我见到的人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们很快乐。反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就算快乐也不是同样的一种快乐。

他一直看着我，等我答复，我点头。

他好像中了彩券一样高兴，然后看看左右，想怕有人在偷看我们。

他靠近我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只有我们用哮喘激素的人，才会不嗨。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不记得那一个月？”

“哪一个月？”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那一个月。”

我不明白。

他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不是大家现在说的好像是紧接在一起的，而是隔着一个月时间的，正确来说是从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天数起共二十八天。”

大概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是不是你现在跟人家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我心想，的确再没人跟我说起这些事，的确有点好像不曾发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忘了。

他以为我忘了，颓丧的坐下来，轻轻的说：“原来你也是忘了，我弄错了，太一厢情愿了。”

我说："大叔，我记得。"

"你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年的事。"

他仍怀疑的看着我。

我说："我记得到处去搜购猫粮狗粮，记得严打躲在家不敢出去……"

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老天爷，我终于找到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逗。"

"张逗兄弟，你叫我老方，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因为你是我知道唯一记得那个月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你现在记得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月找回来。"

他救了我，救了妙妙和猫狗，他怎么说我怎么听吧。我也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妙妙捡回来的，妙妙是对我最好的。

韦国的自述

我，韦国。二十四岁。

好久没写日记了，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是要记下来的，作为历史的记录。

今天，我向我的人生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正式成了 SS 读书班的成员。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班里最年轻的成员。

SS 读书班是学术、政治和产业界的结合，正式成员有副部级官员、少将级军人、央企和主权财富投资老总、百强民企老板，加上几位社科院和重点大学的所长、教授。其实，我们的人脉一直往上延伸，直通天庭。

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用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里的真正精神贵族。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来自革命家庭——有几个学术界的成员就只是平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但大多数是。像我的外祖父是共和国的法官，我从小在政法大院长大，这在我们读书班里，已经算是出身最不显赫的了。

或许我应该感谢 X、Y、Z 三位教授——特别是 X 教授——因为是他们在大半年前介绍我到读书班当候补成员的，这样我今天才能成为正式成员。X 教授经常炫耀说我是他一眼看中的，是他决定要提拔我的，就让他这样想吧。其实念本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大学里的教授做了分析，看谁在政治上最有前景，会跑得最快最远，是我选中了 X。

我没选错，X 和 Y，Z 教授是 SS 读书班的发起人，他们的主张是：理念与权力结合，让中国更强大。是他们以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名义，吸引官员、解放军将领和企业界中有理想的人来参加读书班。XYZ 都想当国师，认为十年内他们的理念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这都很符合我个人的十年计划。

三个人之中，X 掌控着重要的学刊，人脉最广，在媒体的锋头比较大，但嘴巴也比较大，学界传说他有国安背景。Y 在学术上最有地位，是学科带头人，在南方的重点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任院长，在国外学界也颇有名气。Z 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班讲课，这个研究班是军地混合编班，学员都是省部级高官和高级将领。

Z 为人深沉，事情想得最远，他才是最懂我的人。我做过两件事，都只跟他报告，当时他听完没反应，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有点后悔自己太急躁了，不过这次在读书班收新成员的委员会议上，主张把研究生还没念完的我，破格收为正式成员的，是 Z。之后 X 也居功一番，说是他和 Z 共同替我说话了，不然我还要多做三到五年候补成员。

青春有价，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随便给人家耽误呢？我要主动去促成我的目标。我察觉到 Z 才是关键人物，因为他跟读书班里一个所有人都叫他板寸头的大哥是有默契的。板寸头大哥是真正的红色贵族，表面上是在海外做投资的，其实党政军黑白道都通，更有通天的本领。我认为他是将来做元首的可能人选之一。读书班人人有来头，但他们见到板寸头大哥都还带点敬畏。板寸

头大哥和 Z 才是读书班的灵魂——虽然我不相信灵魂。可惜板寸头大哥不好亲近，我至今还没找到可引起他注意的妥善办法。暂时我先做 Z 的工夫。

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替 X、Y、Z 做很多跑腿的事。他们有不同的外围组织，掌握着不少资源，譬如申请国家拨款给愿意成为同盟军的学者做学术项目，或拿一些富豪基金会的赞助，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扶持国内外学界的同路人，建联合阵线，又或每半年办一次全球华人人文社科优秀研究生的学习营，训练下一代的学术精英，参加者全程免费，夏营在北京或上海，冬营在香港或澳门，吃得好玩得好但少不了洗脑般的脑力密集激荡，所以叫魔鬼训练营，也叫新黄埔军校。这么多活动，XYZ 当然要分工，譬如魔鬼营 YZ 只去演讲，组织上交由 X 去主导，X 自己也不出面，名义上的召集人是 Q，因为 Q 最能折腾，最会忽悠年轻人，特别是满腔热血、读了一点书的硕士研究生。Q 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是想当帝王师的，但 XYZ 都有点瞧不起他，说他学历不完整，说他没有学术著作，说他立场变来变去。私下里，XYZ 叫 Q 做魔笛士，就是在西方童话里，用笛子吹起动听的调子，把小孩子拐走的人物。很明显，XYZ 都知道，一场思想的革命——SS 读书班策动的就是一场中国人当代世界观的革命——需要有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拐小孩的魔笛士是不能从缺的。

我第一次向 Z 交心的，是我如何落实读书班上常说的政治就是分敌我的理念。我从大二开始，就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后来我们从虚拟兼顾到实体，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他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

Z 听完没什么表示，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因为不久之后他故作不经意的说，你去听过你们学校的那位龚教授的课吗？我立即心领神会，打听之下，知道这个姓龚的家伙在讲堂上批评政治儒家公羊之学，我们就鼓动曾听课的同学去向校长告状，说他污蔑中国传统文化，还发动同学在网上签名要求校方彻查和开除姓龚的。这件事现在还没了，但姓龚的已给我们玩弄得狼狈不堪。我相信 Z 对我的表现应是满意的。

我没跟 Z 说的是，我的长年告密行动终于受到国家的欣赏，首先是公安网络监控部门，然后是安全部门，都正式联络上我了，等于说我现在是公安和国保的眼线。这点我没告诉 Z 和读书班其他人，免他们防着我。待我知会上线我现在正式成为 SS 读书班内围的人，他们也会更器重我。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刚做了读书班候补成员，去听 Z 的公开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盛世与爱，他说："现在社会弥漫着'爱'，媒体更常有人提倡大爱、博爱、爱全人类，一时间大家感觉良好，内心充满'爱'，很有满足感、幸福感，国家也一片和谐，暴力犯罪案件减少了，连家庭暴力都少了，可见'爱'的力量。"没说到单字"爱"的时候，Z 就做一个加引号的手势。

我正听得无精打采，觉得 Z 的演讲了无新意，到接近尾声时才突然听到 Z 带过了一句：“大家都在‘爱’，尚武精神不彰了，敌人没有了，恨不起来了。”我整个人为之一震，Z 真是高呀，用心良苦呀。

我记得 Y 曾说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也没有慧根，我们哲学家不能对他们说真话，不然他们会攻击我们，就像他们杀掉苏格拉底一样。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即所谓微言大义。

Z 跟 Y 是一个套路的，所以 Z 也是在微言大义。

爱是说给大众听的，大众以为 Z 在宣扬爱，或主张当前中国盛世需要爱，但其实 Z 在整篇演讲中，都只是在描述爱，不是在肯定爱，只是说爱如何影响了盛世里的中国人，但没有说中国人应该多去爱。关键是那句“尚武精神不彰了”，这是对前面所说的“爱”的全面否定。这就是说给我这类自己人听的暗语，因为从 SS 读书班我知道，尚武精神是我们崇尚的美德，Z 是尚武的，如果尚武精神是正面的，让尚武精神不彰的就不可能是正面的了。在 Z 的演讲中，是什么让尚武精神不彰？是“爱”——尚武精神不彰，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爱”。像我这样受过哲学训练、懂得阅读字里行间深意的人就体会到这个引号里的“爱”是指前文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Z 认为这样的“爱”让国人不尚武。理论上，尚武不一定需要恨或敌人，但敌人和恨可使人更尚武——敌人和恨是尚武精神的春药。Z 演讲的真正目的，他微言的大义，是要否定连敌人也爱的“爱”——批判不分敌我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这些所谓普世价值，甚至暗示我们要找到敌人，让恨能再起来，尚武精神才能彰显。我懂了。

我知道这也是我以后能取信于 Z 的窍门，我能听出 Z 的微言大义，主张内外有别的她一定会把我纳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立即挑选了六个崇拜我的北京的大学生，自称铁血忠魂，开始练武。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缺胆色缺杀气，受到社会上泛爱的气氛影响，都变得女性化了，缺乏男子气概，有时候连我也怀疑自己太有爱心，太不够绝断，做不了大事。我设法提升他们的杀气，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恨，忘了分敌我。我们一起看南京大屠杀、纳粹灭犹之类纪录片，鼓励他们去幻想如何有系统的屠杀日本鬼子，可是有一次我们野营的时候想杀两只流浪狗，磨练磨练胆色，最后都给畜生逃走了。我觉得大学生都是窝囊废。

终于，给我等到机会，替他们行成人礼。

我姥姥五道口的破店“五·味”，每天晚上有乡谣表演，是我观察年轻人心态的平台。有一个晚上，铁血忠魂都在，但士气低落，大家在喝闷酒。可能是酒精上头，其中一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指着台上一个大块头的吉他手说：“你看，那个弹吉他的大个，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出来的。”那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本身是来自农民家庭的，但是他最厌恶农民，整天说农民是贱民，农民是不能同情的。我向来知道，穷人恨穷人，农民讨厌农民，小孩最爱欺负小孩。清华铁血忠魂还在说：

“你看他，贱肉横生，恶心不恶心。”另一个铁血忠魂说：“大个子弹得挺好的”，但另一个立即反驳：“他的身体语言特别土，手指头粗得像棒槌，还要弹什么西班牙吉他，我靠！”清华铁血忠魂再咬牙切齿说：“就是个农民！”大家都对那个弹吉他的大块头农民投以极度厌恶的目光。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大伙一下就领悟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回去拿家伙。”

我们在店外等，那大块头还在店里喝酒作乐，大家更气不过。等到他出来，我们跟着他，不知该如何下手，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个蠢家伙竟然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栋临街楼的侧面夹道，靠着墙角坐下来睡着了，众铁血忠魂这时候一拥而上，乱棍齐下，打到那大块头动都动不了，我在不远处看着，心想：好家伙，这回非得把他打死不可。这时候有辆切诺基开过来，大家就撤了。

我犹疑了很久，要不要告诉 Z 这件事，因为后果只有极好或极坏两种。如果 X 知道这事，可能会给吓到，Y 甚至会谴责我，但 Z 却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决定赌一把，我跟 Z 说，受他关于爱的演讲启发，我读出了他的微言大义，并且付诸实行，要做大事，恨是必需要的。我的潜台词是：我是可以替他干大事的。他听后一贯的不做表示就走了，很多天没动静。还好事实证明我看人还是准的。今天，我成了 SS 读书班正式成员，证明押对了宝。

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后记：SS 读书班的 S 和 S，是两个德国人——虽然其中一个是犹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

再后记：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我必须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四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寻月

我，方草地在录音。

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他叫张逗，二十二岁，河南人，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我六十五岁，有资格认他为弟，以兄自居吧，哈。

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跟我一样，是哮喘病患者，长年用类固醇。我现在大胆假设，我们两人没有失忆，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哈，这是大好的消息，表示在我国境内，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我能把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哈。

上星期五晚上，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我顺便进去，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我如获至宝，假装买了几件东西，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拿报纸跟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电子版一对照，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不知何故，看到《南方周末》被公然强奸篡改，反起普世价值来，我哈哈大笑，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

这份《南方周末》报纸单张，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更幸运的是，那天凌晨，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我停了车，理智叫我少管闲事，正犹疑着，发觉那人在地上拼命想吸气，这情况我熟悉，再下车走近，看到他一只手在颤动，我念头一闪，伸手在那人裤袋一掏，果然是我想的哮喘喷雾剂，立即就往他嘴里狂喷几下，他就缓过来了。

我还要管他吗？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

这个大块头！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送到北医三院。我怕他出院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她，他仍然在昏睡着，下午醒来，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我决定照办，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我对了，他记得，我们是一类人，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哈。他就是张逗，我认了他做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两年来，他是我唯一找到的一个同类。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

最初，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他们的记忆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而那二

十八天的电子版报道都跟我的记忆不合。在电子版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

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但我不能肯定。

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找有关的报道，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没有报道真相的报刊。

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道各地居民囤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职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道回顾二零零八年的贵州瓮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一九八三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

终于，我找到张逗。我们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

我跟张逗说，这几天每天去他家，看看妙妙和猫狗有什么需求，我越来越喜欢他的家，善良微笑的妙妙，和猫猫狗狗。张逗说等他出院后，我可以搬去跟他们同住。哈，我太兴奋了，我需要一个保险的地方保管我收集回来的证据。我期待张逗出院。

补一段录音：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几大医院挂号以看病为名，接近其他哮喘患者，故意攀谈说起那个月的事，他们都没有记忆，我很失望，我以为每个服哮喘药的人都跟我和张逗一样，原来不是。我又回到原点。我向张逗报告了情况，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多孤独，只要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忘记的人，我们也要把他找出来。

为免忘记再录两句：上周在新东路上碰到《明报周刊》和《联合报》的陈老师，才想起他以前也是个明白人，曾帮过我很大的忙，他现在是不是我这类人呢？从他的眼神看，他是我们同类人的机会不大，但我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有空找他。

陈老师笔记本里的方草地

小希或非诚勿扰 OK 没回我电邮，却收到方草地的邮件，约见面。我没有立即回复。

近来心思都是在小希身上，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奇怪，想小希的时候，常常也联想到芳草地，想起那次在幸福二村外碰到时他说的无厘头话。认识他这么多年，他都是叫我老陈，那次他竟叫我陈老师。我甚至觉得方草地的状态，跟小希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

我打开一个搬到幸福二村后没开过的纸箱，检视我的笔记本，有一本是关于芳草地的。

方草地原名方力钧，后来有同名画家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后，我认识的这个方力钧才自己改名方草地。

我首先知道方草地这个人，是我在香港《明报周刊》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个署名老方的美国读者的来信，有时候是校正月刊一些文章的事实或论据，更多是看到文章后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却往往因为太详细而无法刊登，只知道这个老方了解很多当代中国的野史秘闻。有一次我在读者栏登了个小启事，请他提供真实名字和通讯地址，果然后来他来信就附上了真名和地址，我还写过信谢谢他。

他对我的文章也特别注意，甚至我用笔名在《明报》中国版发表的文章也被他看出来，用现在的说法，他是我的粉丝。

八九年夏天，我们在香港见了面，他经香港要回大陆。我奇怪这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大陆，竟有人想回去。他问我是否认识那个抢救天安门学生领袖的组织，我说香港有个支联会，可以去问问。我当时不知道有黄雀行动。

我发觉他的生平很特别，第二天再约他长谈，并做了笔记。

方力钧祖籍山东，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出生，他父亲曾跟军阀盛世才一同在新疆参加苏联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四九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在东单坐飞机去情的青岛，再坐船去了台湾，没带上年纪甚轻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儿子方力钧。

盛世才那支共产党，跟现在所说的朱毛中共还不是一回事，曾主张新疆脱离中国。不过，老方父亲不单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并且跟西北的黑道帮派走得很近，又负责培养特异功能人士。老方就是出生在北京城东边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道观，母亲还是那道观的总教母。解放后，这个道观是归国家安全部门而不是宗教部门规管，可见中共对道教方术的警惕。

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共随即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练各派武功或特异功能者都有可能被划为反动会道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大批曾替国民政府工作的投降人员以至中共自己在白区的地下党人也被杀，包括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

镇反后，黑道帮派分子和会道门追随者有过一阵子在神州大地上几乎销声匿迹，逃得快的头子都去了台湾或香港。老方的父亲什么都掺和，所以也去了台湾。老方的道上大姐大的母亲没有这么幸运，死在北京的监狱中。

至于老方这个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兼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后代，则在重门深锁、闲人免进、去宗教化的道观长大，带他的是个看门老头，老方从小就跟老头干些庙里修缮的活，并读完了高中。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老方未能上大学，也因为年龄大了几个月的缘故，没资格跟老三届高中知青下乡插队，更无缘当红卫兵，在文革最初期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当小学老师，但学校还没开学文革就升级了，改成下放到门头沟木城涧矿场当挖煤工人，一待多年。据他说，七一年九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颐和园一游，因为整天听说却没有进去过，觉得再不去以后会很长时间没机会去。但那天他前往颐和园途中，发觉路给封了，猜想一定是颐和园附近的玉泉山军事禁区有什么戒备或军事调动。他回工人宿舍后逢人就说，中国要发生大事情了。果然没多久就传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叛国潜逃、飞机坠毁在外蒙古的惊人消息。老方从此不肯再去上班，他说当时已经想到“历史终结”，写了一张小纸条，去到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把纸条塞在桥上汉白玉栏杆的缝里头：“历史已经停止，不会再前进了，所有新的革命皆将是反革命，不要再想骗我，你们凭什么叫我去挖煤？”

他哮喘病复发，待在宿舍，不管单位怎么威吓都不下坑道。

不知道是七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来华，还是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反正美国方面有人带来了一张华裔美国公民滞华亲属的名单，在这个中美关系戏剧性解冻的期间，中方为了示好，放

了一批人出境，其中包括老方，因为他父亲早已脱离国民党政坛，以亲美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政府荫庇而移居美国。

老方接到通知后去公安局领了一张摺页的通行证，还在磨蹭，去颐和园、北海四处玩了几天，又回到东边的道观看望带大他的老头。老头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走？万一政策改了就走不了了，今天马上去买火车票去香港。老头从庙里一墙角挖出几片金箔，是以前修庙剩下的，这么多年一直藏着，拿去换了现钞给老方带到路上用。老头说，老方母亲是道观的大恩人，因为她在狱中咬死不松口，坚持道观只是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反动会道门活动，这七百年道观才能保留到今天。现在算是回报给当年总教母的后人老方。老头养大老方，也要等到最后关头才透露点真相，当时人对人都有戒心。

还好带了点钱，老方坐火车南下，在广州等了七天，等香港的配额。在深圳又等了两天，才过罗湖。老方就是在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拿着一张摺页的通行证，终于跟罗湖海岸边防收到的通知对上，进了香港。

老方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拿签证，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老方不是偷渡到香港的，而是那通行证出境的，所以够不上是政治难民，美国不能立即让他入境，必须以家庭团聚的理由正式申请移民美国。

老方在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一家廉价国际宾馆暂住，一住大半年，因为美方签证迟迟不下来。在宾馆里，老方过着大开眼界的生活，结交了各地的背包客和小商人，据他说至少来自五十个国家。有一个长年住在印度果亚的美国嬉皮士，鸟倦知返，说回美国后将会加入一个嬉皮公社，继续过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日子，令老方羡慕不已。

老方到了加州洛省蒙特利公园市，见到了自襁褓之后没见过、现在已年迈的父亲。老方的父亲当年跟随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时候，没少害过人，现在整天怕有人报复，平日深居简出，房子四周建了很高的围墙，连卧房都加了铁门。这时候父亲已另娶，老方跟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依父亲意思，去德州豪斯顿唐人街，投靠父亲的旧部，在旧部开的下面是铺面、上面是居家的中国家具古董杂货店当会计。旧部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双方家长如意算盘是让老方娶旧部的女儿。那女儿已完全美国化，知道父母的用意后不肯跟老方同桌吃饭，老方就自己吃住在店铺的储物间。这样的唐人街生活并不是老方想象中的美国。

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做蜂蜜、果酱、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士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干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分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

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二零零六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八九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侗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

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眉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二零零六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纪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二零零八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八三严打、八九六四、九九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3

春夏之际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 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厅副厅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厅副厅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厅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 798 随便逛逛。现在的 798 可不是十年前的 798，结合了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 798 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 798 附近。

每次到 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画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的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八九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藉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地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 iPhone 和亚马逊 Kindle 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 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 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 BOBO 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一九四七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二零零九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双手托头。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

何东生继续说："完全不要外国技术是不行的，但完全靠外国技术也是不行的。自力更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大国不能完全不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完全自力更生。老毛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粮食和消费品基本上自力更生，不假外求，放弃对外贸易，只跟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小国做生意，这就是追求绝对的自力更生，最终影响发展，没必要。老邓的改革开放年代美国人要全世界放弃自力更生，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是不科学的，老美自己都做不到。当时我们拼命出口赚外汇增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效果倍儿好，但是在这个用美元结算的世界，为了压低人民币汇价有利出口，就得购进美元，这从学理上就知道不可能长久，会造成结构性偏差，最后美元贬值，老美经济垮了，我们差点也被拖垮了，幸好及时调整政策，说穿了就是改成相对的自力更生，我们输出工业成品给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澳洲、加拿大，换取石油、粮食、矿产、木材、原料，都是我们中国缺的，也跟欧美做点双边对等贸易，买他们的波音飞机，再买些高科技工业生产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能种的就自己种、能研发就自己研发，能消费就自己消费，从土豆到小商品到手机到汽车都一样，十几亿人的大国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主要市场，不过度依赖美国，不再乱搞重商主义，但也不玩老毛闭关自守那套，对外贸易照样对外贸易，但只占 GDP 百分之二十五不到，这不等于说就是相对的自力更生！"

何东生说话时很带劲，一停嘴就变回泄气皮球。我们知道今晚的演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三个人喝闷酒，到十二点前何东生上完厕所，大家就撤。

他厕所出来，又问："一起走？"这次我答："好"。我不想留下听简霖酸溜溜的说文岚。

跟他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有点尴尬，何东生不说话，我也不好开口免自讨没趣，只能闷着头走。

他开的是一部黑色的路虎越野车，这类进口车在北京已属于常见到了不起眼的地步，我瞄了一下，车牌也是普通北京车牌，大概是谁送他用的吧。

何东生坐上车开动引擎后，从上装内取出一个电子仪器像个遥控器，一按即亮了一个小绿灯，三秒钟后再亮了两个小绿灯，何东生把仪器放回上衣内袋，说："没事。"

我不好意思追问，谁知道他补一句："反窃听、反追踪。"

我禁不住问："谁敢窃听你、追踪你？"

他说："都敢！中纪委、国保、国安、总参，这么多单位，养这么多人，谁说得准？谁没有对头？我监控人，人监控我，我有你的把柄，你有我的把柄，谁都有档案，游戏就是这样。"

我又长见识了，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怕有人监控。我强装见过世面，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样子，很酷的系上安全带，想调一下座位，不知道按错什么吓我一跳，椅背往后翻，整个人就仰着平躺。何东生连忙把我扶起，说他的车改装过，两个前座椅都可以往后放平，像床一样睡觉。大概他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暧昧，想解释一下，但又忍住不说，怕越描越黑。我也不追上去调侃他。

他问我住哪，我说幸福二村，他说知道，熟得很。

我问他有见到当年兴华营的同学吗？他简短的回说没有。

我以为话又断了，谁知他主动说话："水兴华是个有心的资本家，你知道兴华营让我知道了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而且不光是你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坦白说，也没有太大兴趣理解，我是说真的理解，几乎不可能，我失去了兴华营才意识到，三地知识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对我后来思考台港事务很有帮助。"

我三地都呆过多年，他这番话我懂，难得像他这样去一次兴华营就领悟了。

我说："这几年台港精英怕都乖乖的在好好学习大陆了吧。"

他只回了一句："中国的事情外面人不好理解。"

大概车速太高，我们给交警拦住了。我想这交警真不知好歹，但不知道何东生会怎样反应，只看到何东生边慢慢停车，边拨手机说："我在工体东路快到新东路，嗯。"

就这样他就挂了手机。一个肥胖的交警跟他要证件，他毫无反应，交警再问，他眼皮都不抬的说："等一等。"我看那交警有点按耐不住要发作了，幸好这时候交警的手机响了，交警一接电话，何东生就启动引擎，不理交警的反应开车走了。他说："我秘书会处理。"

我心想，老板失眠，开车乱闯，秘书一定经常深夜接到这样的电话，马上要摆平，当秘书真辛苦。

这一来何东生又不说话了，有些可惜，因为我挺喜欢听他发表高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这个失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五道口朋友

五一过后，有天早上打开电脑一看，收到 wudaokoupengyou 的电邮，以往一般来历不明的邮件我都会删除，怕中毒，但最近都一一打开来看。五道口朋友果然是小希。

小希约我在工体南门附近的露天农贸市场门口等她。

平常我也喜欢没事逛逛菜市场。中国北方四季分明，水果菜蔬各依时令，在菜市场看得最清楚，更不用说，比超市新鲜。菜市场更让我有接触老百姓的感觉，想不接触也不行，人挤人，你挡住人，那些大妈大叔会用肩膊身体来推开你，因为她们双手都提着菜。

今天，我着急。小希已经迟到大半个小时了。

北京市的管理当局是很不像话的，这个农贸市场只准营业到上午十点，现在只差十分钟就十点了。我心里骂那些北京的小官小吏太缺德，心中都没有老百姓。这时候小希在我身后叫我老陈。

我回头，小希笑着，很开心的样子。我说："你来了！"她说："我来了！"

她手中拿着个帆布袋，说："我去买菜，你在这等我。"

我说："不，我跟你去。"

停市前最后十分钟，人流到了高峰，我跟在小希身后，她走我走，她停我停，感觉是一直挨着她，一直闻到她的体味，她却专注的问价、讲价、挑选、付钱、取回零钱，然后用肩膊身体推着前面的人，开路去另一摊。这样的十分钟飞快的过去，让我感觉似找到久违了的忘我经验。

小希在电邮上说要到我家做一顿饭给我吃，那真是太让我期待了。

菜市场出来，小希说："今天只能吃菜和水果了。"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说："家里有米吧。"

我说："有！"

其实本来没有，但收到小希电邮后，我去家乐福买了米、油、调味品、鸡牛羊肉，还添了厨具。我猜到小希会想在农贸市场买些菜。

小希说："刚才让你等着急了吧？"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语气一转说："我得先摆脱盯着我的人。"

她一路说来我才知道她为了跟我见这一面，做了多少动作。她前阵子故意到处看房，像是想搬家，然后找到了一个筒子楼带家具的房间，今早约了房东，把一箱东西搬过去，并付了房租，然后拿着帆布袋，说去超市买东西。她估计跟踪她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会留下趁她不在的时候为装窃听器的事跟房东打招呼，她在原来住的地方也因为房东态度突变，引起她疑心，才发觉自己被盯上被窃听了。另一个人可能也不会盯着她，因为她才付了租金，去超市后应该很快会回来。不过就算跟着她，也很可能只在超市门口等她，而她去的那家京客隆有两个进出口，仍有可能甩掉他。她说她一直装着没发现有人跟着她，所以那两人的警觉性应该不高。

我已经听得心惊肉跳。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的想象，是她神经过敏，是她多此一举，但是也极可能她真被盯上了，上次在美术馆小公园我不是也亲眼看到过吗？当时我都没尝试去提示她。现

在的问题是：小希真的摆脱盯梢了吗？如果没有，我记得自己想过的一句话：她的麻烦很快会变成我的麻烦。

“你确定没人跟着我们吗？”我问。

小希突然停步，一百八十度转身，张望一番，很得意的说：“你看，没有吧。”

我们两个站在空敞的新东路上，一眼看去都没人。我感到挺羞愧，小希为了这次见面，这么费力气，而我只想着不要给我添麻烦。但我怎能不在乎我安安稳稳的好生活呢？

小希问：“怎么样？放心吧，没事。”

我们还站在路边。我问：“小希，那你以后怎么办？”

小希还开玩笑：“凉拌！”她又说：“看吧，也可能我下午就离开北京。”

我有点激动，说不出话的呆站着。她笑着问：“要不要吃饭呀？”

我们继续走回幸福二村。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空气中都是槐树开花的味，一种很冲很性感的味道，我感到自己爱意澎湃，想流眼泪，我想说，小希我们在一起吧，都不要再折腾了，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吧。

但我不敢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在小厨房，小希快手快脚做饭，我在旁边瞎帮忙。她脱了外衣，右边胳膊皮肤凹凸不平，是当年被军车撞伤留下的疤痕。我心情已平静一点，心想：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好女人。

她切大白菜的时候突然说：“老陈，现在我们的老朋友都变了。”

我记起在小公园里，她也说过同样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这次我问：“怎么变法？你说说看。”

她停下来，说："变得……，变得都好满足。老陈，你满足吗？"

我觉得她在试探我，于是我说："小希，为什么你不满足？"

这确是当时我们的对话，两个五、六十岁的人。

小希呆了一下，又反问："老陈，你还记得当年的感觉吗？你在场的，八九年在我和我妈五道口第一家店，后来九十年代在重开的店，我们谈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愤怒，我们为什么而争吵，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记得吗，老陈？"

我温柔的反问："小希，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呢？时代不一样啦！"

小希若有所失的看着我，隔一会才说："我已经忘记太多，我给关在精神病院好长的时间，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不想再忘记。"

我刚想再说，小希有点不想说了："先把饭做了。"然后她埋头切菜。我知道我失去了她。

吃饭的时候小希仍挂着笑容，但她对我已下了结论，我是她周围已经变掉的人的其中一个。

饭前，她吃药，还坦然跟我说："精神科的抗忧药。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我把剩的吃掉以后不再吃了。"

我称赞她炒的尖椒土豆丝和醋溜白菜好吃，她说有机会做顿饭给我吃，真好，我觉得她的话有告别的味道。

在饭桌上我想尽最后努力挽回她。我有点摸到她的思路了，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不一样了，只有她还在愤怒。我试探说："小希，你知道吗，有些人比较能伪装，伪装是为了保护真实的自己。"看到她眼睛一亮，我知道这话说中了。

"当然，伪装久了，会分不出伪与真"，我说着，小希在听。

我就顺着这个话头，边说边想着如何去说："鲁迅说过，诱人会怀念失掉的好地狱，因为还有比好地狱更坏的坏地狱，这不用说，但是在一个好地狱与一个伪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有

很多人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伪天堂还是比好地狱更好，他们开始的时候还知道那是伪天堂，只是不敢或不想去拆穿它，久而久之他们甚至忘了那是伪天堂，反而替伪天堂辩护，说那是唯一的天堂。但是，世界上总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哪怕是非常少的一群人，再痛苦也宁愿选好地狱，因为在好地狱里，至少大家都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在地狱。”

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边说边觉得自己说的挺有道理。小希很认真的在听，我想起在大陆，一搬出鲁迅，有点年纪有点文化的人都会比较愿意听。起码，这番话再度拉近了我与小希的距离。

小希想了很久，才说：“你是说我因为太过怀念好地狱，所以拒绝接受伪天堂吗？”

我狡猾的说：“我是在说两个选项。”

小希问：“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你选哪个？”

她问到点上了，这是关键问题，我得格外小心。我想再拉近与小希的距离，含糊的说：“必要的时候，我或许愿意尝试考虑好地狱。”

我看到小希露出笑容，如果我们挨着，我可以拥抱她，可是我们隔着一张餐桌。

小希说：“老陈，我想跟你拥抱一下，行吗？”

还用说，我即走过去，跟小希紧紧抱着。

小希说：“欢迎来到好地狱！”

我想说我们在一起吧，但话到嘴边又收回去。

我家的门铃响了。小希身体一下僵硬起来，我放开小希，心想，他们找上门了，这回逃不掉了，只得硬着头皮去开门。

冲进来的是文岚。

她扑到我的胸脯上说："有人欺负我，我需要一个肩膀。"她把我当做永远的候补？

文岚瞄到僵立着的小希，伸手指着小希说："她是谁？"

小希拿起外衣和帆布包，像犯了罪一样说："谁都不是，谁都不是，我马上走。"

我说："小希，你不用管她……"

小希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边走出门，我被文岚一挡，没拦住。

文岚说："小希？你跟阿姨好啦？"

这一刻我更害怕文岚会再缠上我："你怎么找来这里？"

文岚说："幸福二村，问警卫香港作家住哪就带我来了。"

我严厉的指着门说："你给我走，立即走！"

文岚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尖声说："什么？"

我说："我以后都不想见到你！"

文岚还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你滚！"

文岚才完全明白："好，你狠，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了，你等着瞧！"

文岚走到门口，回身给我一个中指，我也回了她一个中指。

天上人间

我不应该让小希走掉。

我应该早点向小希表达爱意。

我后悔了。

小希从我家走了已半个月，音讯全无，写电邮到五道口朋友信箱，没人回，搜五道口朋友这几个字，出现一大堆跟五道口或朋友有关的资讯，但找不到小希的帖子，跟上次小希用 feichengwuraook 电邮地址和非诚勿扰 OK 这个网上跟帖网名的情况不一样，小希现在知道有人在盯她，电邮地址和网上跟帖网名大概不再有关连。很可能，五道口朋友这电邮地址当时是特别用来跟我联络的。现在，她在网上用什么地址、网名？

我的反应太慢，小希走了以后，每过一天，我就清楚一点自己有多爱她。我愿意为她下好地狱。

莫名其妙的，我连续了两年多的幸福感不见了。我很渴望爱情，因而不再快乐。

在北京的杨柳絮和海棠花瓣齐飞的一天，我进了董娘的屋子，垂头丧气的径自走进她的闺房，把上衣和皮鞋脱掉，躺在床上。

董娘开始在我面前脱衣服，她说："把衣服脱了吧，老朋友，今天免收费。"

我问："为什么免收费？"

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问："什么最后一次？"

她说："我要走啦，离开北京。"

我坐起来，沮丧的说：“你要离开北京。”

董娘看着我，逗我：“不许哭不许哭。宝贝，董娘这么多年没看到过你像今天这么不开心。你是我的开心宝贝，是不是？”

我说：“我确是很不开心。”

她说：“让董娘抱抱。”

她抱着我，我说：“小董，我们聊天。”

她放开我，看了一下，说：“我用塔罗牌替你算个命。”

她下了床。我不喜欢叫她董娘，我喜欢叫她小董，就像她当年在天上人间。小董知道了我是作家，叫我推荐小说给她看，其实她就是爱看小说，不用我介绍已看了不少琼瑶、严沁、芩凯伦、亦舒、张小娴。我叫她去看翻译小说，先看简•奥斯汀，她还真的六本都看了，看得比我还细，之后她看了很多翻译的流行小说。记得我问过她最喜欢哪些小说，她说美国的《廊桥遗梦》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我们的阅读趣味虽然不一样，但因为她也是看小说的人，我就跟她好像比较亲。后来她自己待在住家接客，我这么多年都有来找她，感觉上她依然是看小说的小董。有一阵子一些台湾客人常在她家打扑克抽雪茄，我也参加过几次，他们董娘董娘的叫，把我的小董叫成董娘。

她拿着塔罗牌坐在床上，我顺手拿起她床头的书，是鹿桥的大陆版《未央歌》和拉辛的《金色笔记》，可见她还在看大部头小说。她说：“你想问什么？”

我随便说：“我的爱人在哪？”

她准备替我算，我改说：“不不不不，算别的。”我对她的牌术没这么有信心，总觉得她是闹着玩的，万一她真说了一个地方，变了我要决定是不是听她之言去找。我不能把我的命运放在她手。我改说：“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一条路会让我过稳定舒适的生活，其实很不错，但心里总有点不满足，第二条路会碰到麻烦，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大麻烦，但可能会带我去找到真爱和最大的幸福，我应该选哪条路？”我提了这样一个非常塔罗的问题。

她翻了些牌，分成两边，然后说第一条路很安静，也富足，第二条路有障碍，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有爱情。她的答案完全就在重复我的问题。

然后她说："这是副变的牌，你在第一条路上很久了，想变到第二条路去，那去吧，不去你会不甘心的。"这大概就是我想听的话。

我说："小董，我还是喜欢叫你小董，谢谢你。"

小董："老陈，这两年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真实的一面。"

我说："真实的一面？我以前不真实吗？"

她说："以前，以前你跟所有人一样，整天都，都……"

我心跳加速的说："充满幸福感？"

她说："对，两年多前开始，你，我的其他客人，甚至周围的人都充满幸福感！"

我说着小希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

小董说："可以这么说。"

我问："但你没变，是不是？为什么？"

小董沉默了一会，才说："老陈，我们十几年朋友，我跟你说真话。"

我点头。她说："你知道我是香港人说的道友、道姑吧？"

我说："你不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针孔。"

她说："我不用针，客人看到不喜欢。"

我说："那你嗑什么药？"

她说："各种能找到、能嗑的。"

我警觉的说："待会你都给我写下来，我要知道是哪几种。继续，嗑药又怎么啦？"

她说："嗑药有时好嗨，有时好当，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很清醒，这时候就看得出世界变了，周围的人都不对了。"

我说："怎么不对了？"

她说："就是不对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老陈你在内，都太……太有幸福感了。说不出来，总之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是我们这种嗑药的狂嗨，而好像是一种很温吞很温吞的小小小嗨。"

我努力在反省，好像有点感悟，又好像没法跳脱来看自己。

她继续："我和我男朋友都受不了。我男朋友是澳洲人，以前编过背包客旅游书，来中国二十年了。我男朋友常说，中国人的心态几年就蜕变一次，九二年南巡是一变，九四年宏观调控是一变，零三年非典后是一变，零八年抢奥运火炬和奥运举办又是一变，这两年又是一大变。我男朋友说，以前国民快乐指数的全球排行，头几名永远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波多黎各这些，他们的国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中国都不知道排在后面哪里，突然最近两年都是中国排第一，十几亿人都说自己很快乐，你说中国人是不是有毛病？有这么快乐吗？"

我想，小董跟了这个男朋友，的确见识不一样了。

她继续："我男朋友也是嗑药的，有时候嗑完药我们一起聊简•奥斯汀，真的是太妙了，之后我们就要好了。那年严打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不是住在望京吗？我知道会有人举报，就躲到男朋友在外交公寓的家，几周不敢出门，不然不知道现在还有命没命。你看，你不记得了吧？"

我说："那段时间的记忆真是很含糊……"

她说："现在不记得才是正常人，像我们记得的反而是不正常了。这也是我跟我男朋友受不了的原因。加上这两年在北京，我们要的货越来越难找，好像道友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年初去了一趟云南山区，看看那边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发觉那边的人是跟我和我男友比较像的，当然我们碰到的很多都是道友，很多是非常坏的人，也有好人，另外还有山区的人，他们都没有平地人那种说不出来的小小小嗨。我男朋友叫小小小嗨做 hi-lite-lite。他有时候说话很夸张，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文革工农兵海报上的人了。你身在其中可能看不到，现在不光是北京这样，我们去过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到处都 hi-lite-lite，嗨赖赖，除了那些山区或西北偏远地区。我和男朋友商量了很久，我们决定搬过去云南三二零国道近缅甸一带居住。"

我说："我认识一个跟你感觉上很相近的人，她也特烦嗨赖赖。"

小董说："是吗？"

我说："她是服抗忧药的。"

小董若有所思说："说不定抗忧药也有同样效果。"

我说："说不定是这样。她就是我刚才问塔罗的第二条路。"

第二部

1

走过来走过去

后折腾时代

“后折腾时代！”《读书》杂志创办元老之一庄子仲常想到这个词。他深庆自己能活到今天，活过了折腾岁月，见证了这个幸福新时代，后折腾的中国盛世。他经常对自己说：人最重要活得长，《读书》杂志的其他元老都不在了，自己硕果仅存，一切荣耀将归自己。春节的时候，负责文化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到家看他来了，还带了央视的记者，虽然还比不上以前季羡老那样得到总理的看望，却已经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头等大事。庄子仲又不是大国学家或桂冠小说家，几年前如果有人听到国家领导人去家里看望一个杂志元老的消息，一定会说：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由此，更可以看得出这一届领导对知识思想界的重视，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没有过的。那天开始，庄子仲谦虚的对所有人说着荣耀是归《读书》杂志的，说明杂志几代人三十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庄子仲想起党一度对杂志有着误解，责难杂志的办刊方向，后来虽然跟党相安无事，但总得不到党的真正信任。这两年间一切改观了。首先是历任主编、编辑奇迹般的大和解，继而是本来不同立场的作者在治国理念上取得共识，尤其是新任联合主编们两年前策划了新盛世主义大讨论之后，《读书》恢复了一度失落的知识文化界标杆杂志的地位，并得到上面的高度重视。

庄子仲想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即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这些主张，现有看起来都像是平平无奇、自然不过的常识，怎么当时的《读书》要争论那么久才得到结论？对庄子仲来说，不管怎样，《读书》受党肯定，也等于确定了他是爱党爱国的。庄子仲觉得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

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由年轻的夫人推着，往他的小轿车走去。自春节国家领导人到家看望他之后，单位的党委决定替庄子仲配一辆带司机的公务车。这车的其中一项公务，是每周六下午送庄子仲到三联逛逛书店看看书。

◎◎

庄子仲出门的时候，长住北京的台湾作家老陈也刚步出幸福二村小区，开始他每天下午的例行公事，步行去他家两公里直径内的三家星巴克之中的其中一家。因为是星期六下午，三里屯太

古村和东直门外银座的星巴克肯定已经人满为患，只能去工体北路盈科中心的那家，希望那些雅皮白领周末都去了健身房，不会占着太多沙发位子无线上网看电脑。

跟过去两年唯一不同的是，老陈没有开开心心的出门，他的幸福感最近不见了，甚至可以说，老陈出门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好。

自从小希走出他幸福二村的家门后，老陈的心情没有好过。

小董的离开北京，更是雪上加霜。几天后，老陈去五道口找宋大姐。他很识相的选了青年才俊北大法学院研究生韦国可能要上课的早上十点多，去到“五•味”的后门，在巷子不显眼的地方等宋大姐来开店，想问她有没有小希的消息。那天他穿了香港人叫干湿褛的米色长风衣，像搞笑片里吴孟达演的私家侦探，或罗家英演的露阴癖咸湿佬，不过当时的老陈一点不这么觉得，他想象自己穿干湿褛会像好莱坞巨星汉弗莱•博加特或英国硬汉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可是就因为这样的认知落差，当他看到宋大姐转进巷子而焦急的一跃而出时，却把走在大姐前面的年轻女郎吓得惊呼狂叫。

一番扰攘平息后，老陈问大姐可有小希的联络办法，大姐从内衫取出一张小字条，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前阵子还能跟小希通上电子邮件的时候，她还说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见面，我还劝她找你，之后她也没跟我说你们见面了没有。前几天收到个手机短信，不知道从哪里发来的，就留了这一堆拼音字母，我把它抄下来，就知道你会来。”

老陈看着那字条，问：“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宋大姐说：“不知道。”

老陈说：“是小希发给你的吗？”

宋大姐说：“准保没错，一定是的。”

老陈半信半疑之际，宋大姐握住他的手，双膝微弯像半跪的说：“老陈，你一定要救小希，救小希。”

老陈扶起大姐说：“大姐你起来、起来。”

大姐站着老泪纵横。老陈眼睛也湿了，拿出白手帕擦眼睛。

大姐说："我知道老陈你会救小希的，老陈你是好人，你会救小希的。"

老陈说："我尽力，我尽力。"

回到家坐在电脑旁，老陈看着字条发愁，maizibusi。上次 feichengwuraook，老陈反而一眼就看出是非诚勿扰 OK 的拼音。这个 maizibusi，什么意思呢？卖姿布丝？埋字补嗣？中文拼音的问题是四声不分，一音多字。

老陈突然想起小时候住在调景岭的时候，妈妈平常白天在天主教堂当厨娘，周日上午则带着老陈去新教礼拜堂听礼拜，因为听完后可以领取一包美国人民捐赠的白面粉。当然老陈妈听礼拜的时候都会打瞌睡，但老陈则从小喜欢听牧师布道。有一回牧师在追悼以为死去的教友时说，一粒麦子不死，就只是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上，就会变出更多麦子，所以，落地的麦子不死。难道小希改了个麦子不死的网名？不过从没听说小希有宗教倾向。

老陈搜麦子不死四个字，出现一本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论张爱玲及张派传人的《落地的麦子不死》论文集、一本法国文学家纪德的小说体自传《如果麦子不死》的中译本，一部叫《麦子不死》的短片，以及很多文艺性和宗教性的链接。老陈搜了几十个网页，没看到像小希写的帖子，就没信心和耐心继续搜了。早上承诺宋大姐要救小希后，就好像背了一个十字架一样。不过，心情再沉重，生活还得过，于是老陈就出门打算去星巴克喝桂圆龙井拿铁。

◎◎

老陈没期待的是，原名方力钧的方草地在新东路上等了他快两小时。方草地曾在新东路上碰到过老陈，并拿了名片，写了电邮，但老陈没回复，今天方草地决定回到上次碰面的地方，假装是再度意外遇到，这样可进可退。

方草地现在几乎可以凭一个人的神态，判断该人是否他和张逗的同类。上次碰到的老陈，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还真不像。不过，方草地曾经认为老陈是个有智慧的人，而方草地很少改变他对人的看法。今天，让方草地喜出望外的是，老陈从幸福二村小区走出来的时候，一副愁眉苦脸。

方草地脱掉自己的棒球帽，趋前说："陈老师，陈老师，方草地，方草地。"

他拍拍自己的秃顶，像是在唤醒别人的印象。

方草地说："陈老师，您今天气色就对了。"

老陈说："老方，我今天没心情跟你聊天。"

方草地说："没心情就对了，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怎么会有心情呢？"

老陈说："老方，我真有事，改天再聊吧。"

方草地说："陈老师您去哪？"

老陈一想，不能说去星巴克喝咖啡："我去三联书店。"

方草地立即说："我送您，陈老师。上我车。"方草地打开身旁一辆切诺基的前座门。

老陈还想推："不用，真不用，我打的，你忙。"

方草地说："我不忙，我什么事都没有，我专门来想跟你说几句话，陈老师。"

老陈无奈的上车。

方草地边开车边说话："陈老师……"

老陈带点脾气的说："不要再叫我陈老师！圣经说过，当世界各地到处都是老师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方草地认真的说："那可不是开玩笑。我不叫您陈老师了，还是叫您老陈好了。"

老陈有神无气的说："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说吧！"

方草地说："老陈，一个月不见了，怎么办，我们得去找回来呀。"

老陈烦了："不见就不见了，关你什么事？谁在乎一个月！"

方草地往下说的那番话，却又引起了老陈的注意："不见了不行呀，老陈，您有没有发觉，这两年周围的人都变了？"

老陈心想，这像是小希小董的原话。

方说："那个月之前和之后，整个中国变了，人也变了。"

老陈总觉得方草地很夸张。

方草地继续："现在的中国已经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极大多数的人，一种是极少数的人。"

老陈问："极少数的人有多少？"

方草地说："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就是我和张逗，我的铁杆兄弟，我们相信还有同类，我们希望您是其中一个。"

老陈问："为什么你认为我是其中一个？"

方草地说："因为您心情不好，因为您的气色很差，因为您的样子像泡了水的面包一样松松的。"

老陈问："心情不好就是你的同类？"

方草地说："那只是表征，以我两年多的观察，关键在于记不记得那个月发生的事情。"

老陈想起小希和小董，试探着问："老方，你有没有长期在用什么药，譬如……"

方草地惊诧的说："那您确是我们的同类了！"

老陈说："你别着急，先回答我的问题。"

方草地说："我和张逗都是长期哮喘病患者，我们有服用类固醇。"

老陈发了"噢！"一声，方草地立即说："您先别噢，我调查过，绝大部分服用类固醇的哮喘患者都不是我们的同类，至今为止我唯一找到的是张逗。"

老陈边想边说："说不定用别的药也会如此这般。"

方草地问："老陈您说什么？"

老陈自己在推理："类固醇、抗忧药、有麻醉成分的止痛药、吸毒，或许还有其他什么药，都有如此这般的效果，只是，嗑药可能提高了如此这般的机率，也可能另外要看连带的变数，譬如说：嗑的是什么药，或她平常吃点什么，或许性格和个人际遇也有关系，都有可能影响她会不会如此这般。会如此这般又如何呢？会如此这般，她就一、觉得这两年周围的人都变了，二、所谓变就是周围的人比以前快乐，比以前多了小小小小的一点嗨，三、至少有一例情况是，她自己记得很多别人不记得的事情，就是如此这般。"老陈想到小董记得很多，但小希却说自己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方草地附和："精辟，老陈，精辟！确是如此这般，确实会记得很多别人不记得的事情，特别是失踪的那个月。"

老陈才想起："失踪的那个月？所以你一直在说一个月不见了、一个月不见了？"

方草地说："对呀，集体失忆呀。"

老陈说："是哪一个月？"

方草地说:"就是世界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间的一个月,严格来说是二十八天。"

老陈短暂走神，想起自己当年的侦探小说《十三个月亮》。然后他马上回神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件事不是不分先后连接在一起的吗？"

方草地笑：“老陈您还真幽默。”

老陈不作声，拼命在想那段时间，但记忆一片模糊，说不定这一切都是芳草地的胡思乱想，根本之间就没有失踪的二十八天。方草地这时才意识到老陈不是在开玩笑:“老陈您真的不记得？老陈，我刚才还真的以为您是我们的同类。”

方草地和那个张逗可能是小希和小董的同类，老陈想到这点。

方草地失望的说：“那真打扰您了。”

老陈说：“不不不，你听我说……这样说吧，你们是几个外太空人，误闯地球走不了啦，我是一个能跟你们沟通的地球人，是你们在地球的朋友，这样说你明白吗？”

方草地说：“明白，您是地球人的汉奸。”

老陈懒得争辩，只说：“我有认识的人，还不止一个，可能是你的同类。”

方草地说：“太好了，他们在哪？”

老陈说：“我不知道她们去哪了，我也正在找其中一个。”

方草地说：“我帮您，我们一起去找。”

老陈看着方草地，在想要不要让方草地加入，加入会不会添乱。

方草地说：“我特专业，过去两年我就是在干这事，寻月、寻人、寻证据。老陈，让我帮您。”

老陈说：“老方，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方草地说：“好。”

方草地安静了一会，快到三联书店，方草地说："老陈，现在书店都不用看了，我走遍全国都一样，卖的都是官方洁本，甭想在书店找到真相，不信您待会自己去看看，不要说关于失踪那个月的书了，八九六四之类的，那肯定没有，连反右、文革的书都没有一本像样的，都是谎言。"

老陈不搭腔，心里烦这个方草地，到书店看书还要你来指点我不行？三联书店里面，有多少万本好书你方草地看过吗？光是当代名人的回忆录就肯定可以放满几大架子。我以前隔周、这两年每隔几个月来一次三联，找书我还不比你在行？看书找书我才专业呀！这个老方，向来如此，就是烦人。

到三联韬奋中心门外，老陈下车，方草地立即拨打手机，老陈手机响，方说："你有我手机号，二十四小时，随时找我。"方说等他电话，临开车又侧身说一句："老陈，我敢打赌，他们连杨绛的书都不卖了。"

说罢方草地开车走，老陈心想：抛开那些只在香港、台湾出版的禁书和大陆地下自印的非法书不说，曾在中国大陆正是合法出版的书之中，笑蜀的《历史的先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徐晓丁东徐友渔合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早就被禁，现在是肯定没有的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吴思的《潜规则》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走到人生边上》，长销书怎么会没有！《我们仨》，三联本版书，难道都没有？不可能。

◎◎

老陈一进书店，就请店员在电脑查杨绛的几本书，店员对着电脑说：没有。

老陈心想现在的年轻店员对书都不熟悉，说："没货是吗？"

店员说："没这书目，没有进过货。"

老陈说："以前呢？"

店员说："以前没记录。"

老陈说："《我们仨》是你们三联本版书呀。"

店员说："不知道，电脑上没有。"

老陈问："你们店长呢？"

店员说："上二楼咖啡厅看看。"

老陈还是一个有点反省能力的人，他想到自己这两年都没有再读中共党史或共和国史之类的纪实书，连反右、文革回忆录也少沾了，只看经典小说、国学名著、名家游记美文，和重读金庸张爱玲鲁迅，已经很久没有注意三联书店架上有哪些关于反右、文革的纪实书和回忆录。于是，老陈决定下地下层去查证一下。

三联的地下层，在两年前做了点改变。楼梯一下去以前是三联的本版书区，现在改成小说区，接着是国学、宗教和影视媒体书区。今天，小说、国学、宗教和影视媒体书区的顾客还挺多的，虽然无法跟地面一层的畅销书、商业书、个人励志书和旅游书区相比。但是，在地下层一直往里面走，过了一个 L 型转角位之后，顾客就明显疏落，那就是哲学、历史、政治书区。上次三联春节联欢那天，老陈就是走到这里，胸口感到郁闷，今天，老陈的头像爆炸一样阵痛。老陈唯有放弃找书，急步走上地面，头痛稍缓，他想到要找个地方坐下，于是直奔二楼咖啡厅。

老陈只想着到咖啡厅深处找位子坐，没想到听到一声"小陈！"老陈回头一看，竟是《读书》元老庄子仲在叫他，旁边坐着书店店长，两个文化界的半熟脸，和一个年轻女性。上次《读书》聚会，老陈嫌太多人围着庄子仲，所以没过去打招呼，现在被叫住逃不掉，特别心虚的热情握着庄子仲的手说："庄公！见到您太高兴了。"

庄子仲指着身旁年轻女子："我的太太大人，是我现任领导，你没见过吧。"

老陈轻握女子手："庄夫人，叫我小陈。"

庄子仲问其他几人："你们认识吧？"都说认识，熟得很。

庄说："小陈当年替香港《明报》访问我的剪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

众人做另眼相看状。

庄说："小陈，坐下，我有话问你。这次中央领导到家里来看我，《明报》的报道怎么说？"

《明报》的网站在大陆是受屏蔽的，老陈根本看不到，但他开口就说："噢，跟《新京报》的报道差不多，篇幅还挺大的。"

庄公很高兴。

老陈不由自主的问了句心里话："庄公，是不是知识分子现在真的愿意跟党和解了？"

说完老陈都害怕自己话说得太冲。

庄公说："什么知识分子愿不愿意跟党和解？是党愿不愿意宽恕知识分子！"

这时候又有人来跟庄公打招呼，老陈趁机细声问坐在旁边的店长：杨绛的书怎么都没有了？

店长反问："哪个杨将？"

老陈说："钱钟书夫人杨绛。"

店长好像记起来了："啊，你是说那个杨绛，大概都没人看了吧。"

老陈头痛又加剧，怎么自己几年不看这种类型的书，一般阅读者的趣味也跟着变了？

老陈跟庄公说："庄公，我今天有事先告辞，很高兴看到您，您多保重。"老陈又对庄夫人说："庄夫人，告辞了，请好好照顾庄公，他是国宝呀。"

老陈走出三联书店，还在想着自己是不是太狗腿，叫庄公做国宝是不是有点过。不过他一转念又想起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让别人高兴一下又如何？

随风而飘

回到家，老陈吃感冒止痛药，蒙头睡到天亮，醒了也不想起床。中午做泡面，是现在超市里康师傅一百种口味的其中一种，老陈没在意吃了什么口味。随后他上当当、卓越书网，查杨绛的书，竟然连书目都没有。

接着老陈按题目查，八九六四、九九法轮功，正如所料，一个显示都没有，但就算是延安整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灾害、五九西藏骚动、文革、西单民主墙、四五事件、八三严打等，这些在八十、九十年代一度可以谈论的题目，现在都没有几本书目，最常列出来的是一本《中国读本当代篇》和一本《普及版近代中国简史》，这是两年官方钦定的关于近当代中国历史的标准读物。

老陈想，方草地这个人有时候也够神，他好像没说错，全国这么多书店、书城，加上号称无书不备的书网，有成千上万的书目，可是都不会找得到任何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历史的真相。奇怪自己怎么没早想到这点！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书店的书种很少，人们都知道真相被屏蔽了。现在，图书琳琅满目，让人看不过来，其实真相依然是被屏蔽的，只不过人们以为可以设计自己的阅读兴趣，自由选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反而忘了自己已经被设计了。

接着老陈上网。他发觉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关键词固然搜不出什么名堂，就算文革的链接都很不像话，大多是阳光灿烂日子的青春期怀旧，少数谈历史的都是简略洁本。怪不得现在年轻人说不出谁是四人帮，而八零后出生的从来没听过魏京生、刘宾雁的名字，也难怪王丹每次在海外大学讲八九六四，都会有中国留学生去叫板骂他，因为年轻人不再可能从书和网络——学校和传统媒体更不用说——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

老陈想到一点，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知识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代沟。有些往事，对五、六十岁那代人来说，是无人不知的常识，甚至现在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仍会谈到，甚至家里仍有现在已找不到的书报刊，因此他们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他们早就不代表社会大众，他们的认知是完全没有管道传递给比他们年轻的人，而下一代是全面不知道当时的历史真相的。

老陈想起伪天堂与好地狱，在好地狱，人们还知道自己是在地狱，所以想改变地狱，但在伪天堂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并以为已经是在天堂。

有什么好说的，老陈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最近几年，他也再没胃口看痛苦的当代历史，只有兴趣正典名著和风花雪月。他是每天上网，并经常逛书店，但都没有察觉到历史已经重写、真相已被删除，因为他也不关注了。直到昨天在三联书店、今天在网上，他才重新注意到历史真相明显的不在、公然的失踪。

老陈是写虚构小说的，是个说故事的人，他知道在后现代的符号世界，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历史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什么叫真相或存不存在真相这回事都是可以争论的，不过，对于睁着双眼说假话，眯着双眼删改事实，肆无忌惮的歪曲真相，赤裸裸的篡改历史，老陈心里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

如果老陈当年不是当过记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事实必须受到重视，如果不是做过大陆文化名人的访谈，也不懂得应该保留历史的真貌。尊重历史、事实和真相是一种后天学习回来而不是自然天生的价值观，不见得受普世认同。大多数人对历史事实真相都不在乎、都不会有所坚持。

一般人也没法在乎，坚持的代价也太大。

何况真相往往令人痛苦，谁不想去苦取乐？

老陈这一刻就是想卸掉历史的重担。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强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的苦楚吗？难道知识分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难道老百姓平常过日子还不够忙？

难道年轻人不应该向前看？

难道知识分子少批评多建设，实际一点，把精力花在国家需要的课题上，不是更有意义？

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谁还有空管得了那一点点历史事实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历史、纪实或回忆的书都不能出版，相反的，这类书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战中共当代历史正统论述的书才会全部消失。

老陈忽然想到一个词：九成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题材都可以自由谈论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动都已经不受管制了，难道还不够吗？大多数人连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还嫌太多呢！不都已经在抱怨资讯爆炸、娱乐至死？

老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他有一张很长的书单，都是他想看还没看的书，包括国学的，如二十四史，也包括经典小说，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那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阅读取向不一样，老陈的同代大陆知识分子在看帝俄小说的时候，老陈则在看当代美国小说。作为小说家而没看过俄国小说，老陈有点心虚。他一直都对自己说，以后有机会要补回来。现在，老之将至，还等什么？老陈有这些正典就可以了，用不着太多的自由。

况且，将来国家条件许可，还可以放宽到九五成。说不定现在已经到达九五成。那跟西方所差无几了吧。西方也有言论和活动的不自由，譬如德国政府就限制纳粹支持者的言论自由、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剥夺同性恋结婚的自由。唯一的差别是理论上在西方，政府权力是人民给的，而在中国，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给的。这差别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连清洁阿姨都会跟老陈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中国是在进步，希望它再好好地走十年、二十年，谁都不想再有大折腾。

大家务实的做好分内的事，国家稳步向前发展，老百姓生活慢慢改善，那就很好了。

老陈想：都怪那个方草地，说什么一个月不见了，什么杨绛的书都没了，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老陈现在只有两个自寻的烦恼：想再写小说，想寻找迟来的爱情。

他打电话找社科院的朋友胡燕。

◎◎

胡燕现在也知道星期天该在家休息，不应该工作。自己年龄到了，孩子都上大学了，不要太拼了，她老公一向劝她。

她更知道，项目是做不完的。现在的情况跟她当年不一样了，当时她做的研究课题不被重视，找不到经费，还常替她惹来麻烦，现在她也算是学科带头人，而农村社会文化研究也成了显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贵州黔东南做少数民族女童失学研究，还要靠台湾和香港的民间捐款才能开展项目。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她调查城里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时，京城学界也看不起这

样的课题，而且她还受到各级政府的抵制和打压，要到千禧年后情况才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央出笼新政策，地方政府要制定对策，纷纷找专家学者咨询，虽然那时候学界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新专家学者，但自然也会找到胡燕。之后的新农村建设和农地流转重大课题，胡燕都分到研究项目，拿到令同行妒忌的国家拨款。

近年在做农村田野调查的时候，胡燕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家庭教会的快速蓬勃成长。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地下教会"加上三自爱国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信徒，二零零八年的调查数字是五千万，现在胡燕心里的数字是一亿，而这个跳跃都发生在这两年之间。为此，胡燕和两个做农村社会学的朋友合写了一份非公开的初步报告，在学界朋友之间流传征求意见。胡燕在考虑的是，自己有这么多国家重大课题在手，已经顾不过来，还犯得着花精力去研究家庭教会吗？何况，宗教社会学并不是自己的专业学科，若自己成功的立项取得国家拨款的话，更得有人眼红，私下闲言闲语就会很难听，说她是学霸学阀学术帝国主义者已经是客气的了。

胡燕一向洁身自爱，不惹学界是非，所以，为了自己要不要踏出研究地下教会这一步，不得不思前想后。但是，诱惑太大了。十三亿人里有一亿基督徒，十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国家是不得不重视的。胡燕知道自己的学术嗅觉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这个态势，地下教会马上要成为社会大热话题，有关课题将立即升格为显学，这对学者胡燕的诱惑非常大，自己已经预感到了，还能忍住不放马过去吗？最近，胡燕整天感到潮热，并有点亢奋。

星期天的傍晚，老公在厨房唱着革命歌曲烧菜做饭的时候，胡燕在书房盘算地下教会研究该如何开展。这时候她接到老陈的电话，说有事要请教她，问她明天会不会进社科院，她说一般星期四才会去，不过，她马上说，有事明天也可以，遂与老陈约了在社科院旁的四川驻京办餐馆吃中饭。

胡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就是靠老陈帮着请台湾的文化大学发函邀请的，后来资助她做失学女童研究的台湾基金会，也是老陈介绍的，这是她学术生涯很重要的一步。她是个念旧的人，总是会给老陈面子，虽然老陈已跟她的学术事业没关系。

◎◎

第二天，老陈跟方草地一起去见胡燕。之前，老陈跟方草地说，你想知道中国的实况，问胡燕就可以，没人比她更贴近底层和草根，如果她也说不知道的事，其实就是不存在。

老陈想一次性澄清方草地那个二十八天失踪了的说法。

方草地依然很倔的说：我记得的东西，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不会忘记。

老陈找胡燕还有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想问她对麦子不死有什么想法。前阵子，老陈收到一份胡燕发来的电子档，是关于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研究。

吃饭的时候，胡燕解说她在忙什么：协助国家拟定农业合作社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政策，也在做农地流转社会效应的追踪调查。

老陈速战速决的直问："简单总结而言，现在的农村情况是在变好了还是在变坏了？"

胡燕说："问题当然还是有，但总的来说是进入了良性循环周期。"

老陈问出这个结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老陈去过的中国城市不下少，他知道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现在都非常繁荣，甚至县级市都建设得不错，城市老百姓好像都活得很好，小康是没问题的。老陈心里没底的是农村，他只在城市近郊农村旅游过而从没在农村长住过，所以，他每隔一段日子就问胡燕农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好像打长途给亲友问好，知道一切平安就踏实了。知道了农村情况也比以前好，老陈就可以告诉自己：整体来说中国越来越好，然后心安理得的去过他的好日子。至于农村良性循环周期的详细状况——详细状况交给专家学者去管吧，老陈觉得自己没必要知道得太细。

方草地突兀的问胡燕："胡老师，您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省市正式开始之间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胡燕好像不太知道方草地在说什么。

方草地："就是之间那一个月，准确来说是之间的二十八天时间。"

胡燕很耐心的说："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也就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三分之一，中国推出盛世新方案刺激经济的那天，是同一天，这是总所周知的事情。我不知道方先生你说的二十八天，是用什么计算方法。"

方草地不说了，老陈心想，老方这回你没话说了吧。

老陈问胡燕关于她跟别人一起做的那份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报告。

胡燕说：“我们建议中央必须把宗教问题脱敏化，就是解除敏感，不要当敌我关系来处理，甚至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加以正常化，就是把宗教当做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错误政策中总结经验，不能重复镇压法轮功的错误。”

方草地附和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太作孽了。”

胡燕点头。

老陈另有所思，问：“胡燕，你对麦子不死这四个字有什么想法？”

胡燕说：“我对基督教经文不熟，好像他们福音里有这么的一句，落地的麦子不会死，大概如此，很多基督教徒都知道这段，河南有一个家庭教会就叫落地麦子。”

老陈警觉的问：“河南哪里？”

胡燕说：“河南豫西或豫北吧，准确地点我要去问另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

老陈认真的说：“你替我去问一下准确地点，好吗？”

胡燕说：“没问题。”

◎◎

跟胡燕分手后，方草地说：“胡老师人很好，但她不是我们的同类。”

老陈说：“还好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是你的同类。”

方草地说：“我从她的神情，早就猜到。她乐乐呵呵的。果然，她都不知道有失踪的那个月。”

老陈劝方草地：“关于失踪的那个月，老方，你听我的，算了吧，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方草地不接话，老陈知道他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方草地叫板，谁也挡不住。

上了车，方草地说："老陈，赏个脸到我和张逗妙妙家吃顿便饭。"

老陈并没有很想去方草地家，但念到可能需要他帮忙找小希，而自己今天也没事，就答应了。

方草地又来劲，边开车边指着长安街的那边说："那一带，以前有很多很多上访的人在那里，我还特意去找过，看看这群人中，有没有我们的同类，结果您知道发生什么，一个上访者都找不到，南城那些他们住的地方也都拆光了。本来我还在想，说不定您的那个朋友也躲在那里。"

老陈也好几年没想到这些外地来北京的上访人群了，不过他知道一点，就算上访人群还在，小希也不会在其中，因为那一带是高检高法所在，小希一定会躲得远远，不想给熟人看到。

方草地继续说东说西，天南地北跳跃，老陈都听不进去，心想早知道老方住得这么远，就不来了。

到了怀柔妙妙的家，方草地介绍张逗、妙妙和部分猫狗给老陈认识，然后带老陈进他的屋里。屋里四壁都是铁架，放满剪报、报刊和破烂杂物，中间是张书桌、几张折椅和一张折叠床。

方草地指着一堆报刊说："老陈这些都是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找回来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二十八天发生的事情，是跟大家所说的不一样。您是读书人，一生追求真善美，为真理而斗争，您一定能体会我的苦心。您慢慢看，我去准备我们的烛光晚餐。"

老陈无奈的留在屋里。妙妙拿了一盘巧克力曲奇饼进来，放在书桌上请他吃，然后也出去了。

老陈百无聊赖，随手拿起无糖曲奇饼放进口里，又抽出几本过期的地摊刊物，几张旧的地方小报，胡乱的看，真不知道方草地从中看出什么历史真相。然后，也看了一张半张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一本半本的《财经》、《南风窗》、《亚洲周刊》。

老陈回想，自己那段日子都待在北京，好像是平平安安，无惊无险，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否则应该会有印象。从方草地收集的所谓证据来看，外地可能发生过一些动乱，但这不稀奇，中国这么大，每天有地方发生动乱也不稀奇，自己从来不找这种新闻来看，就算看到，也会立即略过，所以不知情。中国之大，自己不知情的事情可多了，像瞎子摸象，谁能知道全貌？这在知识论层面上是不可能的。方草地一鳞半爪的证据，不说明什么。其实说整个月不见了看来是不准

确的，只不过大家对那个月的记忆不同而已，况且中国的事情，你可以找它坏的一面来看，多坏都有，只看它好，也确是一片大好，大国都是这样，你想想美国、印度，不都一样？那有什么稀奇？不管了！最重要是当下，世界经济都陷入冰火期，中国盛世却刚刚开始。小希，你在何方？希望你能跟过去说再见，回来过好日子。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过，我们就一起过。

可能是巧克力曲奇饼的缘故，老陈心情好起来了，对找小希的事更有决心了。

在初夏的黄昏，露天烛光晚餐的情调确是让人愉悦。老陈坐在桌旁，方草地烧菜捧菜放满一桌，叫老陈先尝，又喊张逗弹西班牙吉他制造气氛，不远处妙妙跟那些猫狗在随音乐起舞。老陈尝了几口菜，还真不错，问方草地："你做的什么地方的菜？"

方草地说："杂碎菜。你看，四川泡椒、湖南豆豉、广东虾酱、泰国香茅露，还有咱们自己种的香菜，意大利罗勒、越南柠檬叶、中国葱，随吃随摘，都是有机的，用咱们自家的猫狗加上人粪堆肥的。"

吃饭时候，聊得高兴，最令老陈想不到的是方草地说了为什么崇拜老陈。老陈以为是自己的文笔征服了方草地，原来却是因为说了一句老陈自己都不记得的话。八九年的时候，方草地接受老陈的访问，一直在说自己的预感有多灵。七一年看到颐和园一带封路就感到毛或林彪出状况。七二年在香港重庆大厦凭窗看弥敦道，眼看着对街有人跳楼死，就预感香港要出事了，果然不久香港股市从一千七百点跌到只有一百多点。在美国嬉皮公社的时候，有天大伙敲锣打鼓庆祝越战结束，方草地眼前却出现越南人逃难的幻景，后来也应验了。说着说着，老陈打断他说："这些预感，有意义吗？改变了任何后来发生的事情吗？"

方草地说，老陈一言惊醒梦中人，细想起来，一生让自己觉得与别人不同的预感能力，既没有影响世界，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此方草地不把预感当做一回事了，也不会给自己无谓的压力，都是要感谢老陈那句话，可见老陈是高人。

方草地吩咐张逗说："兄弟，老陈的智慧远远超过你和我，我们都要听老陈的，知道吗？"

老陈正吃得起劲，听到方草地这样说也有点不好意思，不由自主的站起来跟方草地拥抱了一下。

这顿漫长的晚饭吃的有滋有味，老陈甚至又感到一丝幸福感，竟然向方草地和张逗这两个无关重要的人，说了自己认识何东生这样的失眠国家领导人，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一起看老片，何东生看片时候都睡着，但平常晚上不睡觉，开着车子满街跑，给交警拦住就打电话给秘书，秘书就替他擦屁股。

饭后，张逗弹吉他伴方草地唱歌，一听原来是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飘》。方草地还唱得有小鲍的原生态味道。

饭后继续喝燕啤吃曲奇，张逗用手提电脑自顾自上网。方草地叫老陈给出指示，怎么去找他的朋友。

老陈说："我也不确定。我只有这小条。"

老陈从小皮包取出小纸条。方草地拿来看，问："什么意思？"

老陈说："我猜是麦子不死的拼音。"方草地把纸条给了张逗。

方草地说："那我们就去河南找吧，我开车。胡老师说那教会在河南，我们去了再说。"

老陈说："不要急，那教会叫落地麦子，但我连小希是不是叫麦子不死都不确定，更不知道两者是否有关。"

这时候张逗说："找到了，maizibusi。"老陈和方草地围过去。

老陈说："你就输入 maizibusi？"

张逗说："是呀。"

老陈只知道揣摩 maizibusi 的中文，竟没试过直接输入拼音。

只有一条链接，是两周前在《猫眼看人》论坛上的跟帖：

"小瓜呆，你说你伤心透了，以后不会再在国内的网站上发帖，我也伤心透了，不过我是理解的，你用心撰写的文章被网管肆意删除，或被那些没理性的网上恶棍暴民恶意攻击（他们很多不是愤青而是一上网就变流氓的五、六十岁男人），而你始终说事实讲道理，不出恶言，你的坚定，令我非常敬佩，也鼓舞了我坚持下去。我不怕愤青，更不怕那些老流氓，我会坚持到底，我相信，人是有理性的，真相是不会永远被淹没的。再见吧，朋友，我们会在自由的虚拟世界再见。Maizibusi。"

方草地问："是她吗？"

老陈说："像！"

方草地说："看她的语气，她是同类。"

张逗说："看语气，不会是年轻人写的。"

方草地问张逗："在哪发出来的？"

张逗说："不知道，我上网去找人帮忙。"

老陈看到可能是小希的网上跟帖已经激动得想哭出来，坐回原位，忍住眼泪。

方草地递一瓶燕啤给老陈，也坐下，说："我跟您说说那二十八天的事。"

他做了几下深呼吸，好像赛前暖身。

"那年春节前我去了趟澳门，回来先呆在广东中山等着过节，中山本来是很富的地方，但香港人澳门人都不来买房度假了，工厂也停了，大家都在说农民工今年又只得待在农村不能回城市打工，大学生也连续几年找不到工作，我在一家吃乳鸽的馆子打厨房工没几天也被开了，我无所谓，不打工就玩吧。正月初八那天我在报亭看到《南方日报》和所有日报的统一头条：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你说人多敏感，那天气氛立即非常紧张，我房东找我说，你住在这，有在派出所登记吗？什么年代了？这是广东中山，外来人口还要登记？她说不登记晚上就不让我住，我说你这是毁约，这时候邻居也来了，街道办也叫来了，他们竟然说由房东付钱让我暂住小旅馆，但我不能待在院子里，并要立即交出门钥匙，我说你们把订金退给我，我马上就走。"

老陈说："你想说什么重点？"

方草地说："恐惧，无理性的恐惧，至少连续一周都这样，都说中国要大乱了，国家机器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都快安娜琪啦，还好农民工都没回城，不然不知道会乱成怎么样。但是我不该离开中山，连中山这样地方都绷得这么紧，越往内地走就可想而知，我穿山越岭，几次成了过街老鼠。我不知死活，心里面还想到处玩，想去江西井冈山和龙虎山看看，但过了韶关到了广东湖

南江西三省交界的一个叫梅上丫的镇外，所有人都要下车，外地人不让进镇，拦阻我们的不是公安，是居民的临时组织。我窜逃走，住在一农家，两天后就给公安抓了，是农家举报的。原来解放军已进城，严打开始了。”

方草地说：“他们发觉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回国这么多年，不是不想当中国公民，而是要从美国公民转回中国公民身份是非常难的，比中国公民要当美国公民更难，所以我在北京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聘用自己为专业经理，不断续约，我就有工作绿卡了，偶然去一下澳门香港再入境，就可以长期居留在中国。

说回我被抓，在那个小镇的派出所，六个人会审，两个公安，两个检察官，两个法官。检察官里有一个很强势的女的，法官里有一个是很年轻小个子的女的。那女检察官说，看你样子，哪像美国人，说一段英文听听。我就念了一段《随风而飘》的歌词，念得很溜。那女检察官很不服气的说，明明是中国人，会讲几句英文就装美国人，骗谁呀！美国人为什么躲在农民家，美国人来咱们这地方干嘛，又没有旅游景点，又没有外资投资项目，看你样子就像外国特务。那男的检察官说：外国特务抓到就该枪毙。女检察官看着那年轻女法官说：没意见吧。那年轻女法官说：不能枪毙。那个男检察官说：什么不能枪毙，从快从重呀！女法官说：抓到美国特务的话就该往上报。两个检察官都立即很大反应说那太耽误时间了。男检察官说：那判刑吧。女法官说：不能判刑。男检察官说：怎么不能判刑啊？老美派特务来，咱们中国不高兴，不行吗？女法官反击说：可以不高兴，不能没头脑，是特务的话就往上报，不是特务的话就放人。男检察官又说：美国人也不能享有治外法权呀。女法官说：谈不上治外法权，中国人拥有美国护照在我们国家并不构成犯罪，这是中国自己的法律。两个检察官听女法官这样说都表示很不满，那女检察官提高嗓门对女法官说，同志，你别在这瞎争持，你知道你这样做，白费了公安干警的工夫，辛辛苦苦把人抓来，你要把他放走，这也是在浪费咱们审判小组六个人的时间，这都不说，你这样妨碍进度，会害咱们完不成上面的指标。男检察官点头附和女检察官，其他两个公安和另一个男法官三个人始终不曾说过一句话。年轻女法官够牛，她说，这我不管，我依据国家法律办事，是特务就上报，不是特务就放人。那女检察官狠狠瞪着女法官，气得要爆炸，男的都低头不吭声，我像看戏一样看傻了，然后那女检察官喝叫了一声，把他赶出去！就是把我赶出去，我的命捡回来了，我自由了。“

方草地对老陈说：“在中国这么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还有这么优秀的人才，就算只为了这位年轻的女法官，我也不能让世人忘了拿一个月。”老陈听了也有点感动，更想念小希。

方草地继续：“我知道不能到处乱闯了，下次弄不好真给毙了。镇头附近有个道观，里面有个老道，我说出几个以前听说过的老道士的名字，哈，他就让我住进去。我以后再跟你说我闭关和辟谷的事，您知道辟谷吧，简单说就是戒食。我可以辟谷十四天，您不相信？我们来一个比赛，看谁辟谷时间长……”

老陈看着手机短信说：“不必了，你赢了，我少吃一顿都不行。你把话说完，我有话跟你说。”

方草地说："我在观里想辟谷二十一天，但才第十四天老道就拿着粥进来跟我说：您应该出去外面世界看看了。我相信他这样说一定有道理，于是就回到县城，到处死气沉沉，报上说严打一定要继续。还好交通有点恢复，我就去了赣州，是个地级市，出奇的死寂，迎面走过的路人都不会看对方一眼，像八九六四后的北京。但是到三月初，晚间新闻说严打告一段落，第二天各报头条写：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老百姓都笑容满面，走到街上放起鞭炮来。所以，从世界经济冰火期到中国盛世开始，中间有二十八天时间，是由绝对恐惧的安娜琪过渡到相对恐惧的严打，然后才到盛世，而不是现在大家说的无惊无险冰火期和盛世是同一天。我说完了。老陈，您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老陈说："收到胡燕短信，说落地麦子地下教会在河南焦作。老方，我们就去一趟河南吧！"

2

几个好人的信望爱

落地的麦子不死

跑遍大江南北的方草地一边开着切诺基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奔驰，逢车过车，一边告诉长住北京的台湾作家老陈一些奇奇怪怪的见闻。

方草地说河北太行山区有个快乐村，村里的人都忒别快乐，但媒体被三令五申不准报道，可能是跟上游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化工厂有关。他从一个喝醉的石家庄记者口中知道这消息后，就去找这个村子，进了村真的发觉村民个个面带笑容特别友善，看上去都很健康，男人头上插花，有几个老妇光着上身拖着布袋奶在晒太阳，见到陌生人也不顾忌，在中国真是见所未见。方草地还沿着河谷往上游又走了五公里，果然看到一巨大的化工厂，远远就有铁丝网和各种警告，没法走近，不过可以看到有小型飞机升降，估计有专用的飞机场。

老陈听着听着，不管心里怎么想都不敢搭腔，怕方草地走神。车速还这么高，又边驾驶边说话，几次与对头车擦闪而过，能活着到达河南就要还神酬佛了。

老陈不甘心在见到小希之前就这样死掉。他觉得，如果要意外死亡，他希望是跟小希握着手一起去面对生命最后一瞬间，如果是正常死亡，他希望是小希在床边守望着他。他愿意和小希作伴一起面对晚年，迎接衰老，分享生命最后的岁月。但小希现在一定是活在她个人的地狱里，看不到出路，自己务必要要带给她希望，让她不再孤独，务必要尽早把她拉出来，让她不再劳碌，一起享点福，过点好日子。老陈拿出布手帕假装擦眼镜的偷偷抹一下湿湿的眼。

老陈吃一口妙妙的曲奇饼，窗外是无尽的华北平原，心中竟是无穷的爱，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还能有这样的感觉。

从北京南行过了保定还没到石家庄，在一条通往分支路的高速路公路出口前，方草地把车停在路旁。

老陈看着车载 GPS 说：“石家庄，顺着高速直走就对了。”方草地不语，老陈问：“什么事？”

方草地说：“不好意思，我有个预感。”

老陈怕他预感到小希：“预感什么啦？”

方说：“预感到我跟您提过的那个快乐村了。”

老陈松口气：“快乐村怎么啦？”

方说：“不知道。不过我想去看一眼，行吗？很快的，没多远。”

老陈无奈的同意。

他们的车就在这个出口出去，转向西行，走柏油路不到一小时进山，又走了二十多分钟沙石路，二人下车，徒步半个多小时山路到了快乐村。

快乐村已空无一人。方草地一间一间进屋，出来跟老陈说：村民连农具、厨具都没带走，太诡异了。

老陈给另一个现象吸引。快乐村的屋子，都是很典型的华北特别是河北乡村建筑，粗糙简陋。河北农村不算最贫困，但是在中国的乡村建筑之中，老陈认为河北是最不堪的，在风格上最没要求，一代一代永远是因陋就简，可想而知河北农民一定是美学上最懒的。不过，快乐村的房子，虽然原型也是粗陋的河北乡村建筑，但家家户户都在外墙画了彩图，有年画味道，但风格自由多了，带着娇态，以老陈现在的心情，还能看出其中的爱意。墙上的图有多有少，有的一幅墙只画

了一朵真花大小的彩花。这点额外的装饰、求美的工夫，却是在河北原生态农村见所未见的，农民成了涂鸦艺术家，快乐村说不定是名副其实的。

老陈心想，要是能见一下这些画彩画的农民也挺有意思，现在算了。

他看见方草地对着上游方向发呆，问：“怎么啦，走吗？”

方说：“才不到一年前，人都还在。”

老陈警告说：“你不要想叫我往上游走五公里，我一公里也走不动。”

方草地说：“一定还有汽车路可以开到化工厂的那头。”

老陈想彻底打消方草地去找化工厂的念头：“那条路可能是从山西那头过来的。我可以想到一百个理由为什么村民都搬走啦，而都跟化工厂无关。你不要整天想着有什么阴谋。”

方草地还站着不动。老陈使出杀手锏：“老方，你是知道的，你的预感，也不能改变要发生的事。”

方草地无奈的说：“您说的没错，咱们走吧。

◎◎

河南，黄河之南，天下之中，九州之中州，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的主题旅游公园大省。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伏羲女娲成婚造人，炎帝神农播五谷尝百草，黄帝破蚩尤，大禹治水，商汤革命，武王伐纣，神话耶历史耶，都给河南赶上了，能不纪念一下吗？能有真迹吗？之后二十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称得上立传的二十四史人物将近一千人，大概也是各省之最，都是列祖列宗的民族头等大事，能不各按实际知名度表扬一下、开发一下吗？于是，寓教育于商业旅游娱乐，历史主题公园遍地开花，带动地方景区地产发展。

北京女子韦希红，又名小希，最新网名麦子不死，最后一份短工是在河南省新郑市的黄帝故里卖冰棒，之前还在三个自称盘古之乡的地方和周口的女娲城当过售票员。看她的行踪，下一站不是去神农山就是各个号称大禹在此治水的景点。

果然，她去了好像跟盘古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商汤文武都有关的焦作，古称怀川。这里有六十个古城，而传说中炎帝播五谷、尝百草的所在地神农山就在附近，不用说衍生了很多历史主题公园，不愁当不了旅游从业人员。不过，她没有立即去找工作，反而心神恍惚的到处游荡，皆因焦作这两个字勾起她心里面很隐晦很私人的回忆。当年她刚从大学出来，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个县城做法院书记员，处理严打案件，当时公检法六人小组的同志认为她办事不力，做她的工作，举的例子就是郑州、开封、洛阳一次枪毙四、五十个人，连焦作这样地方，也一次枪毙三十几个。不知道为什么，韦希红到了洛阳、开封、郑州都没想起那年的严打，但到了焦作，当日的情境就历历在目。

那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命运，证明他不是当共和国法官的好材料。

韦希红像发病一样，在焦作市区一个旅馆躺了两天，然后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在焦作解决掉八三年严打的幽灵，不让它再缠着自己。第三天清晨，她随便搭了一辆往温县方向的小巴，去了一个叫温泉镇的地方。她全无目的到处乱逛，走过一户人家，院门敞开着，里里外外有几十个人，个个慈眉善目、衣着端庄。

这时候门外的人陆续进屋，只剩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旁，看着韦希红。那人往前走两步，才知道是个瘸子。那男人对韦希红说：“进来吧。“韦希红慢慢走进院子，眼睛盯着大屋上的一条横幅：“落地的麦子不死”。

韦希红想：只听说过精神不死或物质不灭，这里却说麦子不死，还挺唯物主义的。

◎◎

温泉镇所在的焦作市温县，是国家级优质小麦种子基地，而当地有一个基督教新教的地下教会叫落地麦子，好像是天意，其实只是巧合。

落地麦子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叫高生产。看高生产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父母可能是地方上的小官小吏，所以当年才会积极唱和国家政策而用生产、计划这些词来命名子女。

两年多前，高生产和李铁军等五人因为在焦作市区组织地下教会，跟政府的三自教会闹矛盾，被地方宗教局和公安抓去坐牢。在狱中，他们称自己为落地麦子，取意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死，就只是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上，反而会生出更多麦子。他们已抱着殉教的决心，入狱后反而比以前更坚定，绝对不会放弃主的事业。出狱后，他们也比以前更无畏。首先，曾经做生意赚到钱的李铁军，在温泉镇买了个院子建了大房，成立了第一个团契。跟着其他三人也分别在焦作的乡镇各建了团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而高生产则穿梭于四个团契之间巡回布道。

跟两年多前不一样的是，宗教局、三自教会和公安都没有再来找他们麻烦。更奇怪的是，请求入教的人数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

现在，温泉镇的团契每天举办的见证会和读经班，都会有几十人参加，周日的布道会更要分三场，每场一、两百人。每天都有信徒介绍新人入会，也有人自动找上门来，像韦希红这样。

高生产曾经有点担心，教会办得太火，会不会引起注意。但是李铁军和其他三人都是以生命交给主的决心豁出去的往前冲，高生产想拦也拦不住。譬如说，当时李铁军要在院门外挂基督教春联，高生产是反对的，认为太张扬了，中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能挑穿，可是最后拗不过李铁军。李铁军认为光是产品好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宣传来配合，春联是广告。李铁军还说了一句话让高生产感动：我们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我拒绝再偷偷摸摸。果然，李铁军是对的，很多人就是看到春联才知道这里有教会，进来听布道而成为信徒。

后来宗教局的官员也来了解过，问了些资料，态度非常好，没说什么话，之后也没采取什么行动。这两年，政府的身段确是柔软了。到李铁军要在大屋前挂“落地的麦子不死”的横幅时，高生产也不反对了。

高生产是省师范大学毕业生，坐牢前是中学老师，长期订阅《读书》杂志直到改信基督，是个知识分子，不想李铁军他们都是农民出身，所以有时候他顾虑的事情特别多。他忧虑现在的宽松情况不能长久，因为全国各类宗教都发展得太快，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新教。若把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加在一起，二零零八年信徒的数字是五千万，现在，高生产心里泛起一个数字：一亿五千万！其中大多数是这两年之间增加的，所谓地下的家庭教会又占八成以上。解放以来，全国除工农阶级外，没有任何单一族群占人口这么大的比例。当年打压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右派，都是极多数向极少数专政，而不是现在十二亿分化的人民对一亿五千万团结的信徒。共产党还能像镇压法轮功一样对待基督教吗？高生产一方面希望基督徒人口快速成长，另方面他也怕共产党随时翻脸。他祈祷主赐给中国基督教多十年的发展时间，他发誓要让中国基督徒人数在十年内到达三亿五千万，也就是他认为十年后的全国人口四分一的安全临界点。

为了长久发展，他主张每个教派教会暂时各自为政，福音派、自由派、基要派和灵恩派之间不要交往，同一派的不同教会之间也不要过度串联，他不想给政府一个印象，觉得家庭教会在发展跨省甚至全国性的组织。很多教会中人都不理解他的苦心，还批评他不够开放、孤芳自赏，甚至说他想划地为王。高生产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纵向对上帝，不是横向联系。

高生产另外能做的就是写文章在信徒之间流传，其实也是传信息给政府。他的重点信息是：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基督教不图世俗政权，是稳定社会的力量，但世俗政权也不要来干预宗教。他希望能够影响政府改变惯性，接受政教分离的观点，政权与宗教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样在现阶段来说是对宗教发展有利的。他也用各种网名在网上写博客，支持一些北京学者提出的宗教脱敏化诉求，这也是符合中国基督教现阶段的利益的。

不过，在脱敏化的同时，高生产不主张给政府添加压力，并且反对一些大城市的激进基督教知识分子要求将家庭教会正名，或将地下教会合法化、地面化、公开化。他认为政府不可能正式承认家庭教会，脱敏化已经是底线，脱敏化之后政府最好当做不知道有地下教会，宗教局当做没听过三自之外有家庭教会，地下家庭教会也不做任何让政府下不了台的事。不折腾，大家面子都挂得住，日子都好过。

高生产想到，后世可能会说，现阶段才是中国新教基督教最纯洁的年代。因为除三自教会外，新教在中国仍然有地下的色彩，做教徒没有太多世俗的好处，故此现在的信徒反而大都是怀着纯正的心参加教会的，出发点比较单一，是为信仰而信仰。个别教会负责人或志工腐败是例外不是常态。在中国，真正对名、利、权有野心的人，会去参加共产党或民主党派，或利益集团，或黑社会，或娱乐圈，较少会选宗教这平台，就算要选也会选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或自创邪教，不太会来新教地下教会。反观在基督徒是主流的国家如美国，教会难免要跟名、利、权和利益集团掺和在一起。高生产希望中国基督教能够长期在地下成长，没有野心家看上家庭教会，基督教徒永远保持现有的纯洁。

落地麦子教会在基督教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而且因为负责人皆曾坐牢，很多外国基督教人士前来求见，李铁军他们都特别高兴的跟外国人来往，高生产则颇有戒心，怕中共罗列勾结外国势力罪。从境外来访的交流中，高生产更察觉到，基督教虽不图世俗政权，但却会被卷入政治。譬如美国，在堕胎、干细胞研究、同性恋权益等问题上，福音派基督徒往往跟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右翼捆绑在一起。美国方面也有人来河南找过高生产，策动他反对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他都拒绝表态，所以美国方面的教会至今没有邀请这位优秀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兼地下教会魅力领袖去访美甚至到白宫见总统。

高生产现在能做得到的，是坚持落地麦子教会不收境外团体捐款，不接受非法进口的圣经，不请非华裔牧师来布道，有人批评说高生产搞的是爱国三不教会。还好，李铁军等其他几人在这几个重要决策上还愿意听高生产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好，信徒奉献多，不太需要外国资助，更不差几本圣经。

有一种难免的良性发展有时候也让高生产头痛。参加教会后，信徒之间有了互相认同的凝聚力，发挥基督的博爱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哪一个弟兄姊妹有难，大家都义无反顾的去帮忙。听说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过因为官商勾结侵犯老百姓权益，而老百姓之中有家庭教会的成员，教内的弟兄姊妹动员起来，去跟官商利益集团抗争的事件，这在官员那里很容易被解读成朝廷与教众的对立，有些地方官员甚至视家庭教会为眼中钉，向地方宗教局施加很大的压力。这种事件多了，很可能逆转现在相对宽松的中央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韦希红的出现，让高生产又喜又忧。

高生产记得第一眼看到韦希红的那瞬间，脸上一阵发热。一定是主引领她到来的，感谢主。

自从两年前温泉镇的落地麦子教会成立后，他在这个院子的门口，引领过不少迷途的羔羊回到主的怀抱。不同的是，高生产一眼看出韦希红不是本地人，有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个跟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她很认真听经，问的问题都很有水准，而且并不令人讨厌。她最想理解的是，为什么大家会相信上帝，为什么被打压在地下的基督徒不但没有怨恨，还比平常人更快乐！

因为我们心中有爱，因为我们有主耶稣，高生产在布道会上说。

韦希红很喜欢团契弟兄姊妹的互相关怀，比她从小学习的阶级感情真诚多了。这种友爱，让她会想到八十年代她在五道口碰到的知识分子，当年也有类似的志同道远之情。现在，一切都随风而逝。

韦希红不禁在想，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好人在中国能坚持下去吗？在一个国情如此、体制如此、风气如此的社会，想独善其身都不容易，还有什么道德精神力量驱使一个人去做好人？没有信仰，做好人太难了。

可是，韦希红没有信教的冲动。她从小就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好学生，脑筋怎么都转不过来，使她在理智上抗拒有神论的宗教。

她在团契里唯一可以做较高层次讨论的对象，就是高生产。但是高生产是落地麦子教会四个团契的主要布道家，而且焦作和河南其他家庭教会也常请他去讲道，不能整天留在温泉镇，所以，韦希红决定高生产去到哪，她就尽量跟到哪，听他布道，再抽空问他问题。

还有一点当时韦希红没清晰意识到的是，团契里虔诚而谦卑的信徒其实都有一种真理在我的轻度亢奋式自满，让韦希红潜意识的感到有点不自在，而高生产虽然布道的时候也很亢奋，但平常的时候往往心事重重，带点忧郁，加上他是瘸子，反而令韦希红觉得容易交流，这驱使了韦希红更多向高生产靠近。

韦希红没有男女之念，高生产却有点心猿意马，甚至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成家了。但是，韦希红还不是基督徒，她在网上用麦子不死名字写的帖子，都是跟政府过不去的，是会惹事的。后来更发生了张家村事件。

张家村几个农户都是团契的成员，前阵子给乡政府和利益集团合谋圈地侵权，其他团契弟兄姊妹都在讨论这事，韦希红知道后特别来劲，搬出很多法律观念，鼓动大家维权，大家才知道她是学法的，对她的见识十分敬佩，准备兵分三路，一路到县里打官司告乡政府，一路在乡政府门外集会抗议，一路把抗议实况录下来，跟所有贪腐罪证一起放到网上广为流传，因为韦希红跟大

家说：互联网就是民间的中纪委、虚拟的公检法。可是这样一来，温泉镇落地麦子团契就会被卷入农民维权的抗争，后果难料。

为此事高生产找李铁军商量，叫李铁军劝阻团契成员不要把事情扩大，以免动摇教会根基。谁知李铁军反而说了高生产："老高，我有甚说甚，大家现在都以为你和韦希红是一对的，她是高大嫂呀，她是皮你是心，这位麦子不死女士是代表你在说话呀。"

无尽大地之爱

进了河南地界，方草地聊到他一生中亲历巧合的事，问老陈相信不相信巧合？老陈心想，作为小说家，他不能不靠巧合，在现实里，巧合的重要性肯定被高估了。不过对方草地说的话，老陈一般不用太回应，方草地就会自己接下去。今天清早从北京出发后，方草地没停过说话。这时候，老陈也只是耸了一下肩。

方草地说："我就知道多此一问，您是作家，一定相信巧合。您知道人生跟小说一样，也都是巧合，不然此时此刻我不会和您一起来到河南。"

老陈好奇的问："你看过美国保罗·奥斯特的巧合小说吗？"

方说："没有，我看过日本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没有巧合就没有小说。"

老陈说："小说是一回事，现实生活里，巧合可能都是因缘而已，表面上是巧合，后面是天网恢恢，有因有果，都是有线索的，不过多数时候我们看不到线索。"

方说："精辟，老陈，精辟。"

老陈看手机："呀，张逗说找到麦子不死在凯迪社区、新浪网、新 NB 网都上了新帖子，其中有一帖说她终于把八三年的幽灵扫地出门，另一帖说她在 H 省 J 市 W 县替农民维权。胡燕的短信说了落地麦子教会是在河南焦作，那就是 H 和 J，只要找到 W 县就行了。"

方说："温县，肯定是温县。因为我去过。巧合吧。"

老陈懒得反驳方草地的逻辑，就从温县开始吧。老陈把 GPS 调到温县县城温泉镇。

◎◎

高生产的大学同学刘星是焦作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媒体宣传方面。当高生产早上来电说想见他的时候，刘星就立即毫无顾虑的说：咱们晚上去亿万饭店吃饭，慢慢聊。如果是两三年前，刘星是不会想被别人在公共场所看到他和高生产走在一起的，但自从这回地方政府换届刘星没被提拔上去，他知道自己的仕途到此为止。他已经五十岁了，这届不上，再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跟高生产老同学一起吃饭不行吗，给人看到又怎么了？

方草地和老陈因为去了趟快乐村，耽误了几个小时，到达焦作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去不了温泉镇，二人只得在市区住一个晚上。当方草地依从老陈的要求在前台登记入住四星级的亿万饭店的时候，在饭店的中餐厅包间里，刘星和高生产已酒过三巡，谈到正题了。

高生产说了自己教会最近遇到的麻烦：几个团契弟兄姊妹在张家村被侵权的事情，有可能越演越烈。

宗教是宗教事务部门的事，不是刘星部门的事，所以可以当做老朋友闲聊。高生产知道绝不能挑明说要刘星指点迷津，这样刘星肯定反而什么真话都不愿说了。高生产只是自说自话的把教会的状况说完，两人继续喝酒，说点废话屁话，耐心的等着听刘星接着说什么正话。

刘星酒虽然喝多了，但经过这么多年官场的磨练，说话还是滴水不漏，不会让人抓到把柄的。他说最近各级政府都在学习中央的一个文件，还要考评，他都会背了：

“现阶段我党执政理念是善治为民，搞好干群关系，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干部的爹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建设社会稳定的预警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严密防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把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始终放在中国核心利益的第一位。”

换个说法，现在政府要做出替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姿态，所以不能出现破坏和谐形象的群体性事件，官员不但是不要激惹老百姓，并且要有预警性，预防群众闹事，预先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缺乏预警性，发生了群体事件，不管事件如何解决，事后总有官员要背锅。

什么叫一党专政？专政就是执政党有绝对的权力在想要实行严打式专政的时候，国家机器可以不经人民授权、不受人民限制而对人民或部分人民实行专政，而到了执政党想要不折腾的时候，则要处处让人民感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照顾。现在是不折腾阶段，只要共产党一党执政基本制度这个核心利益不动摇，手段不怕灵活，身段不妨柔软。

高生产对此太理解了，这两年教会能不受干预的发展，就是因为国家现在的政策是不折腾，官员都怕自己的管辖范围发生群体事件，害自己丢乌纱帽，所以谁都不敢去桶马蜂窝。地下教会就是一个个马蜂窝。

刘星此时此刻说这番话，是有用意的，而高生产也解读得非常精确。潜台词是，既然现在是民怕官、官也怕民，如果把群众要闹事的消息预先张扬，说不定官员反而会愿意化解。准备闹事但是还没闹起来的一刻，是各方最有回旋余地的时候，真的闹事了，后果反而难料，弄个打砸抢烧罪名给镇压下去也说不定，官民两伤，这样就算事后有几个官员背锅下台，对大家都于事无补。

但是，该把群众闹事的消息预先张扬给谁知道呢？太张扬就变了公开事件，官方面子挂不住，但是张扬不到点子上就没效果。譬如说刘星就是会装不知道，因为不是他的管辖范围。高生产闷闷的吃餐后水果，心里想，哪个官员会紧张这件事？

本来，最直接就是乡政府的领导，但是，如果原先不是他们财迷心窍，也不会勾结利益集团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在巨大利益面前，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不会轻易让步，非得把事情闹大到真的变了群体事件才有转机，但这正是高生产站在教会立场想要避免的。高生产盘算，要张扬就得张扬到上一级政府，就是县政府。

于是他好像转话题似的不经意说，咱们温县的杨县长，挺能干的，形象也挺好。刘星就在等高生产说这句话，立即接茬说：“小杨，年轻有为，三十多岁，前途一片大好。”

高生产听懂了：刘星已指出该找谁了，一个主管各乡、紧张自己仕途的年轻官员。

这是刘星还做了一个空降的手势，说：“你知道咱们焦作市长是从福建调过来的？你知道小杨县长是市长提拔的？你知道这回换届，市长要调到省里去？”

高生产心存感激的想，到底是老同学，把话说到这么清楚的份上。市长从外地空降而来，一定会提拔一些干部作为自己的班底，而不会重用像刘星这样跟老市长的人。杨县长就是市长的人马，现在市长要调到省里去，屁股坐稳之后，就会把自己的人带到省里。对四十岁不到的杨县长来说，只要这几个月县里没出大事，就可以顺利跳级去省里当官。

换句话说，若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不管处理好处理不好，杨县长调省里的事都添了变数，所以杨县长是预先张扬群体事件的理想对象，年轻有为的他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个腐败的乡干部而让自己的仕途多了不确定因素？

刘星看到高生产已经完全意会了，心中也生起一股自豪的快感，摇摇晃晃的去厕所了。高生产趁此时间打电话给李铁军，叫他马上约见杨县长。

◎◎

焦作也是中药种植基地，盛产地黄、山药、牛膝、菊花。方草地在北京知道要来焦作的时候，就想好要顺便采购一点怀药，到北京调理张逗的内伤和妙妙的痴呆。他四点半就起床，练完气功，天还没亮就出门，不打扰老陈睡眠。

老陈昨天赶了一天路虽然很累，可是晚上却没有睡稳，六点多就起来，在饭店吃了早餐，却要等到快九点方草地才背着满满一大背包草药回来，这时老陈脸色就有点难看了。二人急急出门，开车去温泉镇。

到了县城中心，方草地问一辆出租车的司机，知不知道温县有个叫落地小麦子的耶稣教会？司机说，那没几步路就到，叫方草地开车跟着，把他们领到教会大院门口，不收分毫。老陈想，不是说地下教会吗，怎么谁都知道地址，门外还挂着基督教春联，这么明目张胆？方草地则在想：河南人惹谁啦，都骂河南人，你看这位的哥多仗义？

院子里，高生产和李铁军正打算出门，去见杨县长。李铁军有点得意的说，咱们教会在温县一带有上千信徒，县长敢不接见咱们吗？高生产叮嘱李铁军，待会见到县长，说话的事交给高生产，他有把握说服杨县长解决张家村侵权的事，叫李铁军少插嘴。

想着说着，四人在院子大门口碰着。

方草地怕老陈的台腔普通话露馅让别人起疑心，抢着说：“哥们儿，劳驾，这是落地小麦子那个耶稣的地下教会吗？”

李铁军有点戒备的说：“这里是落地麦子教会，你们找谁？”

方草地说：“我们找一位叫小麦子不会死的大姐，真名是……是什么？”

老陈接说：“韦希红，小希。”

方草地说："认识吗？"

李铁军不想说谎，只重复的说："韦希红，韦希红，小希，小希……"

方草地："北京来的。"

李铁军继续像在想的说："北京来的，北京来的，北京来河南的……"

方草地不耐烦的问："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李铁军说："咱们当家的是上帝。"

方草地说："你瞎扯什么？"

老陈阻止方草地，说："算啦，我们走吧。"

老陈把方草地拉走。

李铁军回身特意把院子的大门掩上，跟高生产走到镇上去。李铁军心里想，牧者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羔羊。他对高生产说："你说，这两个人，说不定是什么安全部门的眼线，我可不愿意跟他们多说。刚才我可没说一句谎话。"

高生产刚才也没说一句话，不过他对两人另有判断，他直觉老陈跟韦希红有点特殊关系，是男女的事，所以明知道韦希红在哪也不说，不想助他们找到韦希红。高生产知道，这两个人是会再回来的，而他对自己的故意沉默，内心还有点感到不安。不过，他脑筋很快转轨，处理事情轻重有别，现在重中之重是避免教会卷入维权抗争。

如果老陈没收到张逗的短信，知道麦子不死在 H 省 J 市 W 县，还不能确定消息是不是在这，说不定这时候已经信心动摇了。现在却一到温县就找到落地麦子教会，老陈肯定小希就在附近，刚才那两个人只是不肯说真话而已。他叫方草地在教会外面守候，等小希出现，自己走回镇上，找网吧试试上网跟麦子不死联络。

老陈和方草地不知道但高生产和李铁军知道的，是小希现在正在院子里面上读经课。今天，小希整天都不会出院子，中午在教会吃饭，下午在教会上网，浏览网上虚拟世界，或许以麦子不死的名义写篇博客谈农民维权，说不定还会来个跟帖骂网上颠倒是非的老混蛋。农村地区五点半吃晚饭，六点半参加团契每日见证会，八点跟几个热心的弟兄姊妹开张家村维权的最后行动会议。小希感到生命很充实。

◎◎

河南焦作市温县，县城温泉镇人口不到十万，宽带网吧却有好几家。当高生产和李铁军在黄河路的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室被县长接见的时候，老陈也等到了一家网吧开门做生意。他在凯迪社区、新浪博客和新 NB 网找到 maizibusi 的博文和跟帖，感到激动万分，小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但老陈花了四个小时，才发出第一张跟帖。

最初，老陈还装酷，写自己跟朋友正在河南旅游，顺便经过焦作想买点中草药，假惺惺的问小希是否还在北京，说有机会见个面。老陈大概想小希回帖说，这么巧，我不在北京，也在河南焦作，我们就在亿万饭店吃中饭吧！还好，老陈没有发出这帖，想骗谁？智商太低了。小希上次给文岚吓走后，是不会随便再跟他见面的。

于是老陈删掉重写，他为上次的事道歉，望能再见到小希。但是这样的帖子，小希看到后，大不了回邮说上次的事不用道歉，真的没事，有空再见。老陈还是见不到小希。

老陈意识到他必须要坦率的说，自己已经来到焦作温县，就是想见她一面，因为……因为自己想跟她在一起。老陈决定说出自己对小希的爱。既然可以公开示爱，其他方方面面也可以坦诚相向了。二十多年前，他对文岚动了真情，结果受了伤害，多少年都不敢再付出点滴感情。现在，又要打开胸膛给小希检阅，确是需要勇气。老陈呆坐了两个小时，才文思泉涌的写了一张近五千字的跟帖叫《一个不陌生的人给 maizibusi 的信》。

信的开句是："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河南焦作市温县温泉镇黄河路的摩登伏羲网吧里了……"老陈先说九十年代在五道口的五味茶室认识小希后，一直都喜欢她，自己当时没有表示，一是因为她身边很多男性朋友围着她，后来更有了英国男朋友，二是自己感情受过创伤，伤到不敢再谈恋爱，而那个让他伤透心的，就是上次闯进来的文小姐。老陈把自己跟文岚如何认识、如何订婚约、如何被甩，写到如何二十多年后再遇上法国水晶灯。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心在最近的几个月却给另外一个也是久违的女人所占了，他如何找她的联络方式，如何等她的回邮，如何重见了一面，如何因为文小姐的出现又失去联络，如何在网上追查，如何凭不牢靠的资讯前来河南，如何拼图知道她在温泉镇，这女人就是小希。现在，他只希望小希能给他一个机会，跟他交往，给他时间，可以在河南，可以在北京或别的地方，让他证明对小希的爱。他还带来了一个朋友，可以帮助小希恢复记忆。老陈甚至把在来河南的路上对死亡的想法也写出来了，如果要

意外死亡，他希望是跟小希握着手一起去面对生命最后一瞬间，如果是正常死亡，他希望是小希在床边守望着他。他愿意和小希作伴一起面对晚年、迎接衰老，分享生命最后的岁月。

老陈想把帖子当做小希的跟帖，但篇幅太长都贴不上，只能把文章切成一小段一小顿的分段贴，并留言说自己在新浪开了博，可看到全文。

老陈豁出去后，很平静的在电脑前坐着，没几分钟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回应。

其实，中饭后小希在教会上网，很快就看到老陈的跟帖，也去新浪看了全文，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动弹不得。过去两年来，小希多期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男人，做个生活上和感情上的伴，但每次都让她失望。碰到老陈后，她还有过一点幻想，觉得老陈是与别的男人不同的，结果自己差点成了第三者。就在自己状态越来越差，接近绝望的时候，她找到了教会。她并没有信教，却加入了一个大家庭。然后发生张家村维权事件，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没想到正在这时侯，老陈又出现在她生命中，向她倾诉一生，并愿意作伴到老。

小希呆坐在电脑前一个多小时，她知道在另一台电脑前，也有一人在呆坐着。

终于，她回了一帖："我已经不是九十年代的小希了。"

很快，老陈的帖就上了："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小希："我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老陈："我知道，我会照顾你。"

小希："我的身躯衰败不堪。"

老陈："我是你美丽的见证。"

小希："我不确定是不是想谈恋爱。"

老陈："我会耐心的等你确定。"

小希：“我现在肯定没时间谈恋爱。”

老陈：“我更可以等，在河南，在任何地方。”

这样一来一往，已下午五点多了。

小希最后一帖：“我要离线了，你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小希去帮忙教会做晚饭，老陈也离开电脑，打算回到教会找小希。

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整个下午，多少网民在屏着气追看他们的帖子。两人离开电脑后，网民之间的讨论开始，兴奋地跟上了很多帖子，对老爹老娘的网恋，有的人说感人，有的说肉麻，有的说可爱，有的说恶心，台湾网民说她 orz 服了这对欧巴桑欧吉桑，大陆网民也说整件事横看是囧侧成雷，不过总的而言网民一致达成一个判决：少罗嗦，小希跟老陈好了就一切都 OK 了呗。

◎◎

晚上六时许，温泉镇落地麦子团契的弟兄姊妹，吃了晚饭，怀着感恩的心情，陆续来到教会，在院子内外，恳切的等待见证会的开始。

这时候，搞生产和李铁军也从县政府大楼出来，两人站在马路边，决定再做个简短的祷告，感谢主恩。上午见到年轻有为的杨县长，高生产如有神助，该说都说了，有条不紊，不亢不卑，县长虽没做表示，但高生产知道他的话杨县长都听进去了。至于县长将会如何权衡利弊，教会的命运如何，就交给主了。散会后，县长秘书追出来，叫他们不要走远，随传随到，这是好征兆。他们两人就一直在政府大楼外的一家小餐馆等候，高生产还拉着李铁军的手说：我们祷告吧。

杨县长跟幕僚短暂商讨后，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乡领导和利益集团企业代表立即赶来县里开会，下午一直开会到五点多结束后，才电召高与李回到县长办公室。这个杨县长是个有官本位思想的官，不过也是个聪明人，知道高生产在玩逼宫，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得不让步。他告诉高生产和李铁军，张家村的征地项目一定如期进行，不过在县政府的协调下，每户赔偿有所提高，并且规划因为实际需要做了修正，刚好那几户教会农民的宅基地都不在征地范围内了。这样，利益集团被迫回吐了一点暴利，乡干部贪腐水平太低也被县里领导训得无地自容，政府的威信保住了，有组织的群众闹事也预先化解了。

杨县长制式化的送高生产和李铁军到办公室门口，心想以后到了省里再也不用受你们这些教众刁民的气。高生产知道目的已达到，临走还恭维了杨县长几句，说他真是人民的父母官，杨县长则回说自己只是公仆，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是爹和娘。他们就这样的互相认对方是爹是娘，心照不宣的冷冷告辞。

在返回教会的路上，高生产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信徒的权益争取回来了，教会与政府的冲突也躲过了，唯一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的是摩拳擦掌要跟政府大闹的一伙团契弟兄姊妹，特别是小希，但在事情孰轻孰重上高生产从不含糊。

高生产和李铁军还没走到教会，老陈和方草地已经随着信众坐在屋子的礼拜堂里，还东张西望的看小希在不在。在厨房，小希协助准备好茶点后，刚把下午带过来的心情平静一下，从里屋小窗张望了一下礼拜堂，心跳立即又加速，因为看到老陈坐在信徒之间。小希躲在窗后，不敢去礼拜堂，隔墙传来小敏迦南诗歌《我算什么》，让小希激动不已。

高生产和李铁军走进礼拜堂，高示意李交待一下，李就请大家肃静，有事情跟大家说，然后把政府在张家村的新决定跟大家宣讲了。高生产接着说团契弟兄姊妹被侵权的事已解决，这是一个神迹，见证上帝听到了大家的祷告，然后领导全体一起高呼：感谢主！有些信徒感动的流出眼泪。很多信徒喜欢来见证会就是因为永远有感人的见证。

刚静下来，老陈就站起来大声说：“各位，我有话要说。”

李铁军想制止他，高生产拉了李铁军一下，示意让他说。高生产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勉强阻拦，就交给主来定夺吧。

老陈说：“各位乡亲，我在找一个人，她叫韦希红，也叫小希。”

人人瞪着这个陌生人，没人反应。

老陈说：“我是她的朋友。”

还是没人搭腔。

老陈继续："你们知道她在哪，请告诉我，让我见她一面，因为……因为我不能没有她，我爱她，我求你们，求你们告诉我，她在不在这里？"老陈单掌掩面而泣。一个动真情的男人，会令人动容。

团契的每一个河南好人都全神贯注的看着老陈，不知该怎么办。

"老陈！"

这时候，小希从里屋出来。

老陈抬头看到小希。

小希心平气和的说："我们回北京吧，老陈。"

3

危言盛世

人的生命，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

--霍布斯《利雄坦》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

--马致远《夜行船・秋思》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

--伏尔泰《戆弟德》

中国式理想主义者

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经历过理想狂飙的年代，受过理想主义的洗礼，就算后来理想变成噩梦而幻灭，整整几代许多人失去理想，却没有唾弃理想主义。

方草地与韦希红就是成长在这样的年代。也学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强烈的理想主义人格特质。一个理想幻灭了，就算没有立即捡起另外一个现成的理想来替代，他们也会继续寻找、追求。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事业主义者、不是享乐主义者、不是妥协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避世主义者。他们是难以言喻的中国式理想主义者。

所以，就算在共和国成立了六十多年以后，中国肯定还是理想主义者的大国——中国人口基数大，理想主义者比例上小，实际数字放在别国仍属惊人。

想想那些正在坐牢的、受监控的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民主宪章发起人、公民组织负责人、自组政党者、公共知识分子、对不法行为吹哨示警者，以及地下教会传教士，大概都是 2.0 版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者，何况现今中国！

◎◎

方草地与韦希红一见如故、相逢恨晚是可以预料的。他们有太多共同的语言和体验。更关键的是，他们经过了两年像疯子一样的独自寻觅，终于证明吾道不孤。

当老陈介绍他们认识的时候，他们一眼就看出对方是同类人。他们很自觉的分析，为什么当周围人其他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一种轻微的嗨的时候，他们却一直是寂寞地清醒。方草地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二零零九年中曾发出警告，说顺尔蜜、安可来和齐留通等哮喘药物，可引起忧郁、焦虑、失眠甚至自杀倾向。说不定很多中国人用的哮喘药也有同样的副作用。因为药物缘故，哮喘药服用者比常人更难嗨起来，也因此更清醒。小希说这就奇怪了，因为抗忧药的效果应该是相反的，药物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羟色复合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让人兴奋起来，所以像她这样的服药者不应该完全体会不到别人的嗨。她说看到报道说那些可以改变情绪的抗忧药，在美国已超过降血压药成为使用量最大的处方药，加上非处方药，抗忧药现在是美国最多人在服用的药物。很多美国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忧郁症，只是情绪不好、精神不振、做事不起劲，就找抗忧药来吃。由此，小希猜想会不会中国也有很多人在随意服用抗忧药，所以整天嗨嗨的。方草地指

正说，抗忧药在中国在普遍也不可能人人都用，而今天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几乎全民皆嗨，而清醒的人这么少。

两人在从河南回北京的路上一直分享两年来的感受，老陈只有旁听的份，直到方草地驾驶的切诺基灰头土脸的回到妙妙与张逗住的村里。

晚上，张逗和妙妙在院子里支了个帐篷，他们的房间让了给小希，而方草地则在自己屋里加了一张折叠床给老陈。

小希已经说了，她愿意跟老陈交往，但需要时间适应，暗示不想马上搬到老陈家同住。方草地说，小希可以暂时先住妙妙房间，等天气凉快一点，他和张逗可以再建一个房子给小希住。老陈心想，小希暂时不想跟自己同住，并不等于想长住在村里，但老陈没有催促小希立即做决定，并认为在妙妙张逗家过渡，既有方草地陪她聊天，又可躲开城里的政府眼线，未尝不是个好安排。

像老陈这样的外人，是很难预想到方草地和韦希红这两个长期失散的中国是理想主义同志，碰撞在一起，加上个年轻力壮的张逗，会爆发多大的威力和斗志。

◎◎

跟方草地和张逗详谈后，小希慢慢恢复了第一天的部分记忆。就在正月初八城市地区春节长假后开始上班那天，电视、报纸和网路统一报道了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的新闻，大家突然有个大祸临头的感觉。网上、手机上，各种说法如过山车一样的一波一波传来。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骂美国恶性通货膨胀，美元一次性贬值百分之三十，害中国人不见了多少血汗外汇储备。接着说南方的工厂大批停工，农民不能回城市工作，中国经济这次真的要崩溃了。跟着传来黄金涨至二千美元一盎司，沪深股市全线跌停板，新疆西藏已戒严。一下子市面气氛大变。上班族开始回家，交通大乱，小道消息更多。到下午人们的反应就是抢购食品和日用品。

这时候张逗也补充说，他和妙妙也第一时间到处采购猫粮狗粮，还好这样做了，因为猫狗粮在那天断货后，要一个多月后才恢复供应。

任何系统，如果大家都做同一个动作，只有正向回馈而没有足够反向回馈，都会崩溃。抢购日常食品用品就是如此，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预期会涨价，有货扫货，囤积在家，人同此心的话，结果真的供不应求，出现恐慌性抢购及民众之间的冲突。

同样奇怪的是，央视、北京台等官方媒体都在播报世界各地的乱象，竟没有谁出来说一下国内粮食、日用品供应充足之类的安抚人心的话。方草地说，政府不可能反应这么慢。他和小希都认为事有蹊跷，一定另有原因。

小希记起当天下午自己不断打电话给认识的学者和媒体的人，想知道能做点什么，要不要大家聚一下讨论一下，但对方都忙着抢购食品照顾家人，无人有暇商量应对大计。到傍晚，小希和宋大姐决定不做生意了，关了店门回家。回家路上的情况就像八九六四后和零三年非典期间，人车都很稀落。她们两个都携带着店里的食物，有一个骑车的从后面越过宋大姐，把她手里提着的一课大白菜抢走。

晚上谣言满天飞，手机、网路、电视时通时断，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的笛声不断，却没有宵禁。院子里，有人张罗自组保安队。

第二天以后的事，小希还是想不起，而且一想就一头汗，就头痛想吐。

只知道有一晚上小希回到家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整夜未眠，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又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没多久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这是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小希妈宋大姐说的，小希自己完全不记得，奇怪的是过阵子小希再问的时候，宋大姐也说不记得了。

方草地说他当时在广东，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七天。前六天人民已万分恐惧，都听说别的地方大乱了，但方草地经过的地方其实都没怎么乱，只是他作为外来人，老被人怀疑盘问，日子不好过。正月十二他窜到广东江西湖南三省交界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后来都说正月十四最恐怖，镇上出现打砸抢烧的情况，也有大批居民听说县城里比较安全，都往县城方向逃。很多人都重复收到一个短信：“我刚从最高当局得到消息，乱了，失控了，大家保重。”

多年来，很多人都问过，中国会不会大乱？会不会失控？爆发点在哪？方草地跑遍西部地区，中原和其他地区也没少去，他一直跟人说，放心，串不起来，中国是小闹不断，但不会大乱，事件都是地区性的，不会蔓延全国。

但是那七天，全国老百姓如处身炼狱，一天都嫌长，到了第七天，已经忍无可忍，快要崩溃了，可想而知坏人更是蠢蠢欲动，人们陷入极大的恐惧，快到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看样子，接下来就是安娜琪，无政府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保生命保财产战争。所有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机器快点出动。

方草地当时也想着情况再不改善，中国恐怕真的会大乱了。

第八天，正月十五，一小纵队解放军来到镇上，受到人民热烈欢迎。

张逗补充说确实听说如此。前年正月十五那天解放军部队进城恢复秩序，这次北京人可是倾巢而出夹道欢迎。下午，公安、武警和军队就联合宣布严打开始。张逗没有北京户口，不敢乱跑，在家躲了三周。

小希想，难道自己竟然也去了欢迎解放军？那自己真的是疯了。大概是下午听说又要严打，所以回到家第二天就情绪失常的大闹。

方草地告诉小希，严打开始，任何可疑人物都给抓起来，自己被村里人举报，抓到公安局，交六人小组从快从重的审判，幸好碰到一个力排众议、坚持依法办案的年轻女法官，才捡回一条命。

那天晚上，小希感怀身世般的大哭了一场。八三年严打和八九年解放军坦克进北京开枪镇压学生，都把她吓到了，让她充满挫折感，怀疑自己的抉择和能力。但是今天，她觉得又恢复了元气。这段时间以来，从在网上跟老愤青们论战、表达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到在家庭教会替农民维权，到听方草地讲正义的年轻女法官据理力争的事情，小希觉得自己越来越坚定了，好像终于找回了自己。

◎◎

方草地与小希，谁的理想主义更激进呢？答案是小希。什么叫激进？激进的古典意思就是根源，找出事情最本质的根源。方草地是有一种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感的，加上他执着的个性，驱使他不懈的去寻找失踪的那个月。小希的正义感其实更抽象，更理念。小希小时候所受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得平等、正义、友爱互助这些词汇都带着光芒镌刻在她心中。她并不知道共产党的虚伪。大学时期她学的是文革后重新回归的罗马及拿破仑法学，八十、九十年代则接受了启蒙理性及自由、民主、真理、人权等价值观的洗礼，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留下深刻的烙印，是一种典型当代西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虽然其中不乏盲点和内在局限，却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小希更激进，而且是坚贞的激进。

试想想，是什么支撑着小希这几年吃尽苦头的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我们之前读到她在八十、九十年代是知识分子沙龙的女主人，的确，在那些年代她主要是在听别的风云人物说话，甚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到了这两年知识分子跟政府和解或被和谐掉之后，小希却逆风而起，从没有间断过孤军作战，义无反顾的在网上发表意见，据理力争，这个过程迫使她理清自己的思路，并用讲理的方式做表达，因为对手是不讲理的，是靠情绪、修辞、美学、民粹甚至暴力的语言表达的。她越写越冷静，头脑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不要有个错觉，以为她还是当年有正义感却脆弱的

法院书记员，或是作风自由、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沙龙女主人，或是连儿子都管不好的没主意的失职妈妈，或是像惊弓之鸟一样到处窜逃的疯女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名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她不会想到以此自居。这是她的武装、她的志业，她赖以生存的一口气、她的可爱与可恶。她愿意含辛茹苦的过日子，忍辱负重的做人，就只是为了更接近真相。

长夜漫漫

在妙妙家过了两三天，到了周末，老陈回幸福二村家里，换了身干净衣服，去星巴克喝杯大拿铁，周日晚上又去参加简霖每月一次的老电影聚会。这个聚会，近月来只有简霖、何东生、老陈三人，说穿了聚会已变成简霖为了迁就堂弟兼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东生所做的刻意安排，老陈只是必要的陪客，如果老陈缺席，只剩下简霖何东生两个堂兄弟，感觉上有点尴尬，很难维持下去。人情上，老陈感到自己有责任到场。他向小希、方草地耐心的解释了他非去不可的原因，而且，老陈说自己有点上瘾了，想每月一次的听听何东生借题发挥的长篇大论。

这周，看的是一九八一年拍摄的《夕照街》，喝的还是一九八九年的拉菲，因为简霖托中介从拍卖会上进了五箱货，大概未来一顿日子在老电影月喝的都将是八九拉菲了，当然，对只喝八九拉菲，老陈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夕照街》拍摄地点就是今天北京二环边两广路夕照寺街一带，戏是描述改革开放早期北京一些普通老百姓的新时期生活，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雏型。戏中有个骗子，假装是香港人，穿一身白色西装，操着假粤语，招摇撞骗，骗财骗色。年轻的陈佩斯则在影片中演一个养鸽子的待业青年，口头禅是“拜拜了您呐！”

片子放完，何东生一开口就念了几句元曲：“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然后说：“市场经济就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看上去乱，有时候还会失灵，关键是要掌握其中的规律，政府什么不该管，什么必须管，耗了我们两代人心力，改革开放大轮回，反反复复，呕心沥血，到今天午夜梦回我还会冒出一身冷汗……”

老陈差点笑出来，心想午夜时分你何东生都还没就寝，就算就寝也会失眠，何来梦回？这样一走神后，老陈只假装在听何东生滔滔不绝的追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几番的政策大交锋，其实心思都在惦记着才两天不见的小希。最后何东生说了一句“苍蝇总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苍蝇飞就不吃饭了”之后，就没话了，三人喝闷酒快到午夜，何东生上了个厕所，出来问老陈要不要捎带他回家，老陈怕他邀游车河兜风，反而有耽搁，就推谢了何东升的好意。

何东生走了，老陈留下，听简霖说要亲自去伦敦参加红酒拍卖会，进几箱勃艮第，老陈知道简霖已不为文岚所惑，也替他庆幸，然后就告辞。简霖学陈佩斯说：“拜拜了您呐！”

老陈边走边想着明天回妙妙家之前，要记得把幸福二村家中那一大包的降血脂早餐燕麦片带上。

◎◎

这是一个初夏的晚上，老陈心情也特好，幸福感又回来了。当他出了简霖那个社区，拐了个弯，刚走到大马路边的时候，一辆黑色越野车急停在他身旁，吓了他一跳，感觉上那是何东生的车，但驾驶的却是方草地，而在后座的是小希和张逗，三人都在叫老陈上车、上车。

“上车、上车”，三人呼唤着。老陈不由自主的打开前座车门，问：“这车是谁的？”

“上车、上车”，三人异口同声还是那句，老陈脑筋还没转过来，人已上了车，关了门，车开走。

老陈环顾一下，说：“这不是何东生的车吗？怎么……？”

老陈回头看后座的小希和张逗，然后看到两人脚下有个人，一动不动。老陈目瞪口呆的说不出话来。

小希说：“老陈你镇定一点，一切都安排好了，没事的。”张逗说：“他没事的，我用的是上好麻醉药，小猫小狗都不会有后遗症，顶多醒来头疼几个小时。”开车的方草地也插话说：“他起码两个小时不会醒过来，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到，这药我亲身试过一回，不省人事两个多小时，绝对可靠。”

老陈魂飞魄散的看着后座地上的何东生说：“你们疯啦？”

小希说：“我们不会伤害他，我们只想问他一些问题。”方草地说：“问完问题我们就放他走。”

老陈沮丧的说：“你们真的疯了！完蛋了！完蛋了！”

突然方草地也说：“呀，麻烦了！”

老陈回身一看，前方交警在路检，他整个人瘫了一般靠着椅背说：“真的完蛋了。”

方草地说：“大家坐稳……”方草地好像想冲过去。

这时候老陈看到一个肥胖的交警急匆匆跑着过来，就是上月栏何东生车的交警。老陈抓住方草地的手，断然的说：“不要乱来，车慢下来。”

果然，肥交警阻止其他员警拦车，并打手势示意通行。老陈指示方草地：“现在慢慢开走，慢慢加速。”车过路障的那刻，老陈还瞄到肥交警向车敬了个礼。

这时候老陈才松了口气，其他三人不约而同的也大喘了一口气。张逗说：“好险呀！”方草地说：“奇迹呀！”

老陈示意叫张逗坐过去一点，自己把前座椅背向后调了四十五度，然后侧过身来，伸手在何东生身上搜出一个像小型遥控器的窃听追踪侦察器，按一下钮，几秒种后三个小绿灯齐亮。老陈又松口气说：“还好，没窃听、没追踪。”他叫张逗把侦察器放回何东生上装右侧内袋。

之后老陈就乏力的坐着，颓然不语。小希说：“老陈，你不要怪我们，我和老方商量了很久，我们一定得找个知道内情的人来问，否则我们自己怎么拼凑都没办法知道真相，这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不甘心的。”

方草地说：“我们说，在资讯受控制的中国，大概只有国家领导人才会知道全部内情。但我们哪认识国家领导人？这才想到您跟我们说过这个何老师，才想到找他来替我们解说一下，但又怕他不愿意，只能出此下策，我们觉得国家领导人本来就有义务要向我们老百姓说真话，但不吓唬他们一下，他们不会自动说。”

老陈依然沉默。

小希说：“我和老方怕你不同意，所以事先没告诉你，事实上可以说你是没有参与这件事的，如果你现在想置身事外，我们也不勉强你，我们把你放下去打车，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你完全不知情。”

老陈叹了一大口气。

方草地说："当然我们都希望您能跟我们一起听听何老师的解说。我们已经安排好，在两个屋子里用连接线遥控录影一问一答，他连我们的影子都看不到，声音也经过处理，不会知道我们是谁。"

张逗说："刚才在停车场，我也戴了面具，基本上可以肯定何老师昏迷前看不到我的样子。"

老陈这时候才说话："你们怎么会这么糊涂？"

方草地说："您也有不在场证人呀！我们动作的时候，您还跟简老板在一起呀。我们都想到了。"

老陈说："唉，这都不是重点。"

众人不明老陈所指。

"重点是，这个每月老电影聚会，知道何东生会来的人不多，说不定还真的只有我和简霖，顶多加上他的秘书三个人知道。我肯定会被调查，逃不掉，肯定是头号疑犯。你们真的不让我知道这事，人家问我最近见过什么人，我都会交待出你们的名字接受调查。现在知道是你们干的，可能不用上刑我就已经吓破胆了 ，还不坦白从宽，把大家都供出来？我们这次完蛋了。"

这时候众人才恍然，都不说话了。

良久，小希说："老陈，对不起，连累了你。找个国家领导人来问清楚，是我的气话，我把大家害了。"

方草地说："这个我不滚地雷、谁滚地雷的馊主意是我出的，我对不起大家。"

张逗建议："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把车停下，给何老师扶到司机椅子，我们就下车回家，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何老师在不到两小时内自己会醒来的。"

老陈问："他会记得昏迷前发生什么事吗？"

张逗说："我在后面抱着他，用药巾捂着他的口鼻，他只挣扎了六、七秒钟就晕过去。"

老陈沮丧的说："待会他醒来，头会痛，再想起之前的六、七秒钟，肯定打电话给秘书，惊动安全系统，调看街头监控录影，说不定还会找到那个肥交警佐证，然后就是开始调查我，结果我一进去就屁滚尿流，什么都吐出来。我们这次完蛋了。"

众人又失语了，大概都在想各种出路，然后方草地说："杀人灭口……"，众人不约而同倒抽一口冷气，方草地接着说："……杀人灭口的事我是不会干的。"

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都下车吧，我把车开到南方，然后向政府勒索一笔大钱，转移视线。你们都在这里下车吧。张逗，把麻醉药都给我留下。"

小希说："这怎么行呢？"

方草地说："我烂命一条，怎么不行？老陈，您说呢？"

老陈说："老方，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就算你到了南方，在给抓之前自行了断，还是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几个人知道他今晚的行踪，我是肯定会被调查的了，同时我百分之百清楚自己又怕痛又胆小，进去之后什么都会和盘托出，你就算独自牺牲了，也揽不住这件事。我们还是完蛋的。"

然后老陈问张逗："现在离他醒来最保守估计要多久？"

张逗看看手机说："最快九十分钟，我还可以再加药。"

老陈说："事到如今，急也没用。还有点时间，你们让我想想再说。"

◎◎

老陈在车上考虑各种脱身之术的时候，已忆起自己写过的硬汉侦探小说《十三个月亮》，用过一个叫同生共死的桥段，但他一直怀疑，在生死攸关的现实里，把自己和众人的生命交给小说的桥段，是不是太儿戏了？但除此外难道还有什么万全之计？

回到妙妙的家，老陈也独自坐在一角，不发一声。他闭上眼睛屡屡看到自己一生虚度，名誉扫地，想到幸福的飘渺，人生的无常，想到自己在牢狱和刑场。他双脚发抖，浑身冒冷汗，但每

次他都强把自己拉回现实，一次再一次沙盘推演自己的同生共死桥段，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来来去去的天人交战，弄得老陈筋疲力倦，但他知道，时不我予，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几条人命都在他一念之间。

张逗和方草地已把何东生抬进屋子，绑坐在一张有扶手的宽椅，椅脚已预先固定在地上。摄像机开着，通过延长连接线，众人在另一间屋子监看着快将醒来的囚徒何东生。

小希搬了张椅子坐在老陈的面前，握着老陈的双手。看着小希，老陈感到很平静，他直觉到一点：同生共死的小说桥段，对一般庸官不见得有效，但是对何东生，反而有一丝机会，因为老陈觉得何东生不是一般的庸官，智商够高，脑子够用，应该懂得玩这个游戏。老陈下了决心，就这样赌一把吧。

方草地这时候面色凝重的走过来，方说：“老陈，无论您怎么决定，我们都听您的。我预感我们能逢凶化吉。”

老陈问：“他醒了？”

方说：“是的。”

老陈问：“录像机都开了，都连接到电脑，随时可以上网传出去？”

张逗在监控电视旁说：“一个录像机，一个 MP3 录音机，一个台式电脑，一个笔记本，都连接了，无线宽频上网，三部手机摄像头也对准何老师，都是一个按键就可以群发出去的。”

老陈问：“很好。你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是不是？”

方草地和小希点头。

老陈问：“好，事到如今，将错就错。待会你们先不要说话，一切都得听我的，到我叫你们提问题，你们才尽量问个痛快。行吗？”

众人说：“行，都听你的。”

老陈说：“就算我叫你们做些你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也得做，同意不同意？”

众人低声说："同意。"

老陈说："那现在我们过去问他！"

方说："不用过去，在这边问就可以。"

老陈说："这样说不清楚，得面对面。"

方说："那我替您过去问他。"

老陈说："我得自己过去。"

方说："那您戴上面具。"

老陈说："老方，戴或不戴，还有分别吗？你们绑架何东生的那一刻，我已经跟你们一起走上不归路了。现在，我过去，反而是你们可以考虑留在这里，置身事外。"

说罢，老陈带头就走。小希也扔下手中的面具，跟着走，然后方草地和张逗也照做了，都跟在老陈后面。

◎◎

何东生到底是个心细如发的人，醒来后忍住头痛就开始思考，他已想到这不是他秘书就是简霖或老陈干的好事，但他必须要不动声色，不能让绑匪洞悉他有这个想法，否则肯定会给撕票。所以，当他看到老陈毫不遮掩的推门而进，他的反应不是惊诧，而是绝望，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老陈都不怕暴露身份，面前另外两男一女都不戴面具，这就表示绑匪已经打定主意不会给他活路了。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

老陈说："东生兄，喝点水，吃两片头痛药。"张逗拿着水和药，何东生没反应。

老陈说："东生兄，如果我现在要加害于你，也用不着骗你喝水吃药，是不是？"

何东生没抬眼的说："有进口瓶装水吗？"

老陈看众人，众人摇头。

何东生"唉"的叹一口气，然后示意张逗喂他喝水，但不要药。他大口的吸啜了整杯的水。

老陈待他喝完："东生兄，你是聪明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说什么，好吗？"

何东生咬牙切齿的问："为什么？"

老陈说："你问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里，准确的说在没有征求你同意的情况下，将你绑架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问题想问你。"

何东生冷笑几声。

老陈感到自己像是小说中人在说话，反而心平气静了："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不可置信吧！并且，回答了问题后，你就可以走了。"

何东生有点愤怒但有气无力的自语："扯淡！"

老陈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我们不会让你活着走，因为我竟然让你知道了我是谁。其实，哪怕我不露脸，我想你也会想到了几个名字，包括我在内。当然，你也可以预见到，你出事了，肯定会有人来调查我，那我迟早就会心防崩溃的招供，我这几位朋友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候何东生有点专注了。老陈继续："我们也想活下去。你活，我们才能活。"

何东生说："对，想活命，马山让我走。"

老陈说："不要急。随随便便让你走，你不能摸摸鼻子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转个身就会叫人来抓我们。所以，就算此时此刻我们让你走，我们已经是犯了重大的刑事罪，难免一死，就算你替我们求情，我们死罪能免活罪也难逃。不，我们不需要你的宽恕，现在不是在求你法外开恩。"

何东生说："你到底想怎样？"

老陈说："我要你明白，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同生共死的处境，生则同生、死则共死，选择在你。你想听我解释吗？"

何东生说："说！"

老陈说："先说共死的一面。你设想一下，我们的录像机录音机都开着，都连着互联网和手机，一按键就可以群发出去。如果我们这样做，全世界立即知道你被绑架了，谁都隐瞒不了。没错，不久后你就会获救，我们就完蛋了，但你认为贵党从此会怎么看待你？会怎么理解这间荒诞的事件？任凭你和我们如何解释，有谁会相信这样难以置信的绑架理由？所有人都会猜测事件的"真正"背后原因吧！且不说你夜里在北京开车兜风的事也会引起遐想。你认为贵党还会相信你、用你吗？当然，在被抓之前，我们更会尽量发出许多真真假假的文字材料，都说是你透露的国家机密，让网上去流传。你说，你认为你的官运会不会戛然跟你说拜拜？你比我们更熟知贵党的思维和运作方式，你自己判断一下。"

何东生："这样做你们死定。"

老陈说："我们已经是死翘翘的了，一只脚已经在棺材里面。不过我们死，也拉你陪葬，哪怕不是要你的命，至少断送你的仕途。"

何东生说："哈，这就是你所谓的共死？"

老陈说："没错！也可以说是共同自杀行为。"

何东生说："那么同生呢？"

老陈说："首先，待会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你老老实实有问必答，知道我们满意为止。然后，到天亮，我们就放你走。"

何东生说："天亮你们放我走？我不信！"

老陈说：“你心里相不相信无所谓，重点是你玩不玩这个同生共死游戏，不玩，就是选择共死，我们反正是死，现在就现让你仕途死，再考虑你肉体死不死。玩，天亮就 game over，你开着你的路虎回家，就当你平常一样，晚上睡不着，开着车在外面兜风，累了在车上睡了一觉，天亮回家。你知道，别人也知道，你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常如此这般在外过夜，谁都不会过问。”

何东生说：“然后呢？”

老陈说：“然后？没有然后了。或者说，然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我们保命，你保官。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谁都不说出去，过了这个晚上，大家黑不提白不提，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何东生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们不说出去。”

老陈说：“的确是。你不相信我们不说出去，但是，只要我们说出去，我们大概就会被天涯追杀，为了保命，我们不能说出去。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太相信你不对我们秋后算账，你回去之后，说不定仍然不放心，还是会找人杀我们灭口，不过杀人灭口的事总得要靠人，而且也难保没有漏网之鱼，会把今天晚上的事放到网上，总之同样是有风险，你自己评估吧。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如果人真有理性的话，哪怕为了自利自保的理由，我们也知道最好的选项是各自保持沉默，不做多余动作，不要节外生枝。换句话说，你我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份同生共死的协议。”

何东生说：“理性？协议？你对人太有信心了吧。”

老陈说：“我愿意赌一把。你愿意吗？”

何东生说：“你知道青蛙被蝎子过河的故事吧，蝎子半途忍不住蛰死青蛙，自己也淹死，天性！”

老陈说：“诚然，诚然。咱们两边都有风险。我承认这确是逼于无奈的险招。如果还有路，我也不想这样险中求生，我们几条人命，换你一定乌纱帽，我认为我们的代价比你大多了。老实说，我提出这个同生共死方案，是因为我想不到两全其美、你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更好方案。东生兄你有更好的双赢方案吗？我是没有了。你可以慢慢想想看。”

何东生想，整件事太荒诞太梦幻了，但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个同生共死想法简直是儿戏，不过对方好像很认真。冒生命风险，问几个问题就放自己走，这群疯子在想什么？不过看样子自己

只要同意跟他们玩的话，至少暂时可以活命，出去后主动在己，一切好办。此情此境，在受制于人的状况下，何东生以己度人，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比老陈的疯主意更好的主意。

何东生说：“提问可以，但我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老陈说：“这由不得你，我们不要来秀水街讨价还价那一套。我们几个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要你解答我们的问题，直到我们满意为止。我们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次得不到满足，一切对我们都变得没意义了，我们宁为玉碎，同归于尽。况且，东生兄，不管你有没有泄密，只要贵党怀疑你泄密，你就是泄密了，就算我们把这一刻到此为止的录影，传出去一部分，我相信你已经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同生共死是个完整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协议，双方要么全盘遵守，要么拉倒。如何？”

何东生只怕再拖下去，老陈改变主意：“天亮我就得走。”

老陈说：“一言为定！”

何东生说：“再给我杯水。”

张逗给何东生喝水的时候，老陈也趁机交待小希和方草地，话也是说给何东生听的：“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包括待会的全部一问一答，都只是给我们五个人十双耳朵听的，一点都不准泄露出去，就算有些内容你们觉得必须公诸于世，对不起，也不容许。这是同生共死协议的最关键条件。”

小希、方草地、张逗不语。

老陈说：“你们刚才说过，一切听我的，就算我叫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也得听我的。对不对？”

小希、方草地、张逗这下点头了。

何东生说：“还等什么？再不问就天亮了，想问什么，问呀！”

巨灵来了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八九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八八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一九八八年过后，就到了一九九零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分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道，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二零零九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四九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九六五二一，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二零一八后，就提前进入二零二零。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八九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八九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二零零九年有惊无险，还不如二零零八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定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几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做集中培训。

在二零零九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即使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云的趁机一举拨乱方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

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识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零八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对谁稍不坏、谁比谁更坏心里有数，他较愿意襄助一些没有什么出身背景的技术官僚掌权。但是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卷入权争的风暴眼中，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换届而出现大动荡。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本身难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说在换届前一年左右，来一场恰当的大危机，而政治局决定援用并按部就班执行“治国平天下方案”，这样，何东生心想，中国就有救了，虽然后世大概不会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贡献，不会想到“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匹木马是他何东生为党永久执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带来盛世，所有功劳将归在最上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何东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个人的投资策略，是跟美元对赌。在中南海这么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员一样，尽量把人民币挪到国外换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资产，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分换成加币作为自己独生儿子在彼邦读书的费用，并在温哥华尚娜斯老布尔乔亚高级洋房区置业。剩下的美元则买了金矿、石油之类矿产、能源股，打算长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决定留住人民币，或投资在人民币的硬商品上，就是国内房产。他不玩国内股票，一是没时间，二是讨厌整个游戏的不诚实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觉得他贪财。这些年他的反美投资策略带给他可观的回报，坚定了他对国际经济的看法。当零八年金融海啸肆虐的时候，何东生早就有所预期，然而他还是觉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经济理论，重构了他心目中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之路，并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结合在他的“治国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缘故，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这只怪兽。美国的民选政客受制于利益集团：华尔街、大企业、军事产业、地方势力、教会、工会、特殊利益的公关游说团，还要照顾媒体民意，故在需要他们团结办大事的时候只能左顾右盼，小打小闹，不敢忍痛刮骨疗伤，更不可能大刀阔斧。他们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及共和党右翼更不断扯后腿添乱，完全跟时代脱节，有破坏没贡献。何东生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无寄望，更不相信美国那些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经官员有魄力作出正确救世界经济的决定。反而，他越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驾驭现阶段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如果中国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的话。

不过，何东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光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各级党政部门已经受利益集团和贪腐官员的过度把持，他们会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确的政策。所以，何东生心想，只有一场空前的危机，时任当权者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专政，政令上行下效，为蓄势待发的中国盛世奠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何东生虽然预期世界经济会出现比零八年更严重的动荡，却没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机这么快就到临，而政治局在慌乱的第一天，就决定启动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应变储备方案，

叫“冰火盛世计划”。这个计划当然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智慧，只不过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东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国平天下方案”。

先说美国怎么啦？怎么学起我们中国，国家印钞票卖债券，去救没救的汽车公司、去注资已破产的银行，钱都花不到点子上。结果，信贷没有再活络、房价继续寻底、市场依然收缩、失业率照旧爬升，而美元则一台阶一台阶的往下走，美国的投资者不要美元、世界的投资者不要美元、连日本、俄罗斯、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不敢只持美元，美国债券长期短期利息再好都难以出货。美元在零九年初曾一度回升，但之后两年已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终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到了临界点，在二月的一个交易日之内，噩梦骤然而来，美元被恐慌性抛售，随之是美股崩盘，黄金二千美元一盎司，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和财政部长辞职，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史蒂格里茨和克鲁格等一起确认美国正式进入高通胀式大衰退，即中国媒体所说的冰火期。

这时候，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经济当然不妙了。中国的情况呢？中国也危了，出口停滞、失业人口骤增、股市连续跌停板，这次经济的增长由正变负大概是逃不掉了。二零零九年靠国家财政拨款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行为，虽然有助于保证 GDP 增长，却并没有真正拉动消费内需，不少钱是投在可疑的大型项目和固定资产上的，受益者主要是官僚及央企的裙带利益集团，反而助长了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压缩了民企空间。

最要命的还是美元大幅贬值。在二零零四年前，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大。但从零四年开始，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外国制造的进口工业产品，而出口却越做越猛，外汇储备骤然攀升到超过二兆亿美元，然后在一天内不见了三分之一以上价值。原来，中国虽然叫嚷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像日本、俄罗斯、台湾等地的中央银行在放美元，而是一直到最后还在挺美元、买美元资产，不是不想跟美元逐步脱钩，而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我们是已经跟日韩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铺垫双边的货币交换安排，我们是已经在积极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即外国媒体所说的熊猫债券。所以不是不做准备，而是时不我予，只能祈望美元暂时不倒，想不到美元偏偏这么快就倒了。但政治是残酷的，光是主权财富缩水这项罪名，加上事后可预期的国内经济负增长，上一届政府在党内已威望全失，到一年后换届的时候将全无招架之力，肯定都要下台，那将是一个亲痛仇快的时刻。这就是上届政府毅然决定采用冰火盛世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呀，既然横死竖也死，索性背水一战，釜底抽薪，以期扭转乾坤，胜则全胜，败则……败则管他洪水滔天，是下届政府的事了。

美元大贬值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八，中国刚过了农历年假期，除了部分工厂外，全面开市。那天早上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报道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冰火期。下午各城市就出现食品和日常用品抢购潮，到晚上已经人心惶惶。

国际机器去哪里了？

其实，全国的公安、武警、解放军当天都已经进入了戒备，中央向各级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冰火盛世计划已经启动。这个行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必须全国一盘棋，按预定计划走，才能竟全功。

第一环，除新疆和西藏立即戒严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中央命令，国家机器不准出动。换句话说，国家机器在等。等什么呢？等着看要多久才出现真的乱象。等着看民众能够忍受多长的无政府状态。等着那一刻，人民呼唤政府不要抛弃他们，恳求国家机器出来拯救自己。就是说，等到全国人民再度心甘情愿的委身给巨灵。

如果出现大规模打砸抢烧的情况，或居民集体逃离自己的居住地区，那就是国家机器出动的信号。结果，民众度过了六天惶惶不可终日、谣言满天飞的日子，到了第七天各地报上来的情况，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但就是这样，全国也只有少数地区出现大范围打砸抢烧或居民集体逃离的现象。第八天正月十五，解放军、武警部队象征性的开进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全无例外的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这说明在小康社会，人民怕乱多于怕专政，而且中国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序，渴求稳定的人占绝大多数，只要矛头不是指向政府，一切都好办。

那天下午，公安、武警、解放军联合宣布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社会秩序一下恢复，连偷鸡摸狗行为都戛然绝迹。政府也宣布开仓派送中央储备粮的大米，每天限量配给，完全免费，二十四小时来者不拒，确保老百姓不愁挨饿。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嫌国家储备粮用的多季稻大米口感不好，都不爱吃，竟不踊跃领米，而且因为严打，投机分子也不敢去收购储备粮卖给米酒厂。

方草地气愤的问何东生：“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吓唬老百姓？”

何东生像讲课般的说：

危机开始的时刻是很关键的，一开始处理不好就很难收拾。这次危机是超严重的，足以诱发全国性的群体事件。它从经济面开始，但会引爆各种潜伏已久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果政府的反应太温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怨气会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药，有些阶层又接受不了，会反弹。不管我们怎么做矛头都只会指向政府。

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可能是族群对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体事件，都是群众与政府对立。很多老百姓已经有了定见，认定不闹事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动辄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如果全国同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矛头、怨气都是指向政府的话，我们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个火头一个火头的去灭，或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去安抚，再多警力、军队、武装力量都不够，国家机器就崩溃了。

反过来说，只要矛头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个别不法之徒滋事并不构成群体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矛头都同时指向政府。

推演来推演去，险中求胜的唯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无政府状态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用他在《巨灵》或叫《利维坦》一书的说法，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那才是终极的恐怖。你们认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说怕中国会大乱，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面前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只有让人们真的感到，大难当前，只能指望我们共产党了，我们才能接着集中资源办大事。

小希顶了何东生一句："现在谈的是政府和无政府，没有说政府必然就是你们共产党！"

何东生说："争论这个没意义，反正现在两者是一回事。"

小希问："你们制造无政府状态，已经骗得民心，连北京老百姓都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了，还想怎样？为什么要严打？你知道每次严打会有多少人枉死？"

方草地说："我就是差点死在这次严打。"

何东生说："凭良心说，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搞严打。但是，上一任政府为了在换届前表现强硬，并且也真的为了办好接下来的大事，不得不如此。全球经济进入寒冬，中国要自救，就需要下猛药调整经济，但这样一来社会有可能失控，政令会被扭曲，民众会闹事。国家必须完全控制了社会，驯服了老百姓，大家乖乖地听话，才能共度时艰。怎么驯服呢？八三年市场经济出现乱象，老邓不是也搞了一次严打，八九六四，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打。懂吗？为了办大事，牺牲是难免的。"

小希和方草地觉得何东生这番话强词夺理，想反驳，何东生示意让他先把话说完。他说：一八一六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争效应消失，英国出现经济大衰退，国债是

GDP 的两点五倍。不巧的是因为一八一五年印尼发生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全球灰云盖日，导致翌年欧洲农作全面失收。当时的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顾问你们知道是谁？就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眼看大衰退将要引起社会打乱了，他们只用了一招作为危机处理。哪一招呢？就是取得议会同意，废止 Habeas Corpus，即英国的人身保护令，谁闹事谁不听话，政府可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来就关在狱里，用现代话说就是政府随意践踏人权。结果，整个大衰退期间英国的刁民都不敢闹事，过一年后经济就恢复了。神奇吧？

当然，这个期间人民是要吃苦挨饿的，而且以前资本主义衰退大多数是周期性的，一年两年，撑过去就没事。但这次跟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大萧条一样，可以拖它十年八年，硬撑撑不过，政府要进场。我的重点是，永远是稳定第一，但稳定不是目的，稳定是为了办大事，所以非常时期或紧急状态一定要先严打，敲山震虎，然后，趁着严打的效应仍在，就放手推新政。

乱纷纷蜂酿蜜

严打为盛世计划的第二环，同时推出五项配套政策。

1. 国人所有在境内银行的个人存款，百分之二十五必须换成国家规范的消费券，三分之一在九十天内、三分之二在六个月内要花掉，逾期作废。

中国人过度储蓄，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因之一。中国的私人和企业的存款量分别达到 GDP 年度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百分之三十以上，当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有闲钱的人更捂着钱包不花钱，人人如此，经济能不衰退？要民众掏钱消费，靠降息或道德劝喻已经不灵，只能靠强迫性政令。这在西方国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项政令第一个优点是执行上相对简单，所有银行都电脑化，一刀切下去很容易。第二个优点是这项政令只涉及有产者，影响的主要是在银行有个人存款的城市中产和小康这些先富阶层，包括公务员、专业人士、白领、国企员工、小商人和退休人士，要他们花百分之二十五存款在自己身上，同时帮助国家刺激经济度过难关，说得过去。消费者开始花钱，企业也开始花钱。第三个优点是不用国家财政拨款或提供凯恩斯式就业工程即可逆转衰退，至少是强力开动了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引擎，估计至少可以拉升五个 GDP 增长点。

这一来，有点存款的城镇居民就已经够忙了：钱要花到哪里去？买什么商品或服务？

2. 既然制造了需求，就要有供应。第二项配套政策是取消三千多项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制，方便民间资本进入各行各业，放宽针对内需产业的信贷，鼓励创业，同时完成政府功能转变，官退民进。除有关国家安全和央企垄断的产业外，许多受限制行业，现在都

撤退。何东生对老陈说，现在谁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不用书号就可以出书了。老陈反驳说：可是所有书都一样要送审，很多题材是禁区。何东生说：但至少现在到处是民营出版社了，还有中外合资出版社，完全符合 WTO 要求。

这政令也够有效，一时间好像全民皆商，不论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人都在谈生意、动赚钱脑筋，找人才，或被人找，找资源，或替资源找人。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们一条缝，他们就能撑出一片天来。

奇迹一般，广东、江浙那些本来做出口的制造业空闲设备，转眼都改造好，开始为内需而生产。过剩的写字楼和厂房也一下消化掉。新产品、新服务，一两个月间就充斥市场。中国在半年内成功的由投资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带动的经济体。

有多成功？何东生说第一阶段目标是回到中国八十年代，即内需占 GDP 一半，这目标达到了。理想目标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美国，内部消费占 GDP 百分之六十。后来美国做过头了，过分依赖内部消费，到百分之七十多，投资和出口都不足，信贷过滥，民间完全没有储蓄，才出大问题。但美国七十年代前的内部消费比重，是一个大国很理想的比重，中国十几亿人，本身已构成一个超大内部市场，许多方面可以自力更生，不需要过分依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今后可以不过度受美元波动影响了。当然，暂时中国内需只是从 GDP 的三成半提升到接近五成，投资和外贸仍占一半以上，依然有过度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状况，并且到了全球经济复苏后外贸比重还会稍有回升，但总的来说内需比重大大调高，国人工资提升，企业投资回报好，国家税收也相应增加，成功消解了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危机，还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上最严重的偏差，故此可以说，盛世的经济基础这一刻就已经打下了。

一箭双雕，因为到底都在创业和扩充业务，城乡失业问题也解决了。

3. 此时许多农民工也回城，趁这个民工荒的时候挑选待遇好的工作。那么留守的农民忙什么？也在忙着处理自己的财产。第三项新政策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地产权，农民成了有恒产之人。这件事说了多少年，现在终于落实，背后动机之一是想在经济危机时刻转移农民注意力以维持社会稳定。果然，农民都忙着处理自己的资产。何东生本人对农地应否私有是拿不定主意的，别国的私有化经验并不见得都正面，但他拗不过其他人的意见。有一点可以确定而且令他没话说的是：农民是支持私有化政策的。何东生带点伤感的说：中国从此不能走回头路了。
4. 这是全国充满激情的一段时间，看上去有些混乱，但这是建设性的必须的乱。也就是说，在解放生产力和调动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严防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对政策的破坏。在此之前三周的从重从快严打，先灭掉一批黑恶势力、职业罪犯、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扒窃乞丐集团，接着借严打余威，再宣布三严打，即打击贪污腐败、打击投机造假、打击谣言惑众。大家当时一听到严打都怕死了。

共产党最擅长打小苍蝇，随手抓几个典型来判死不手软，也震慑了一下地方官吏，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这就达到预期效果了。只要地方吏治有点改善，官员们暂时不敢上下其手，前面三项经济新政就有较大的成功机率。

5. 何东生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认为市场万能，更不相信放任主义。他从来知道公权在某些环节不能缺席。前面的几项政策，制造了真实的需求，也开动了相应的生产，这个时候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信贷大增，商品和服务都会出现短期供不应求的状况，就算没有投机倒把分子，任由市场去调节，人们会有通胀预期，物价也会不规则的飞涨，如果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就会让这次改革受到巨大压力，甚至翻车。怎么办？只能管制物价。

这是何东生认为整个冰火盛世计划在理念上最多争议、执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环。那些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专家学者，大概对物价管制四个字本身就有负面的条件反射。何东生的经济学是自学回来的，本来也是这样反应的，直到今年细读西方国家的经济史之后，他才发觉在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物价管制的成功例子，而这些都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他大开眼界的读到犹太银行家毕芬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成功的主持的意志帝国的经济计划。到二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效的结合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最鼓舞何东生的，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政策，包括物资管制，不独承担起了庞大的军费，并藉此正式替美国摆脱了纠缠十二年的经济衰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夫曾任职当时的物资管理局，有员工一万六千人，他在一九七二年获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之前曾写过物价管理的专著，并在七十年代经济滞胀期间再度提出管制物资，可见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接受物价管制，只不过近四十年芝加哥学派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抬头，影响所及，没人再记得物价管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实际上在欧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经济活动是受到物价管制的。

何东生几年前先是突破了自己对经济学的认知，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耐心的将理念推销给中央其他同志。幸好中国的许多官员刚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走出来，表面上接受市场经济，打从心底里一听到管制就高兴，所以何东生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利市场运作的物价调控，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说在重大经济转型时期是必须的，是扶助市场，不让新兴市场自我毁灭，而不是替代成熟市场功能的。

不过，何东生组成的物价管制班子中，没有一个是满脑子意识形态的官员。骨干是一批五十多岁的技术官僚，他们累积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价调控的经验，加上大批重点大学招来的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尖子，配备了以前计划经济年代所不具备的资料库管理软件和全国连网，让地球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即时上网查看全部最新价格调控资讯。物价管制是明码实价、真刀真枪的，要让生意人赚钱，鼓励他们生产，但要打消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念头。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管制对供求有什么影响，都需要把握得恰到好处，要压制暴涨暴跌，更要在适当时刻放手让市场自己的调节功能来接手。这样的大规模回馈式调节系统，让最初抱着批评态度的外国媒体大开眼界。说穿了，再具威权的专制政府也只有用上了二十一世纪的自动化资讯和计量技术，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一代的“指令经济“。这样，物价调控替这次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作了护航。

以上的五套配套政策，当今世上大概真的只有中国才可以同时做到。

在全球经济的困难时期，西方国家焦头乱额、自顾不暇，但这是我们的拜年机遇。本来是岌岌可危的上届政府，将一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短期内化危为机，让国内外都接受了中国盛世的说法。到翌年，党政班子顺利换届。何东生没有升官，他想晋身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打算落空了，只是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成了三朝元老。冰火盛世计划周年的时候，何东生不无自嘲的恭喜自己说："何东生，干得好。"

百年梦圆

方草地和小希还有许多问题要问，是关于无政府的一周和严打的三周的，但他们被何东生的言说带着走。何东生上了厕所，再喝了水后，人更来劲了。他话匣子一开，是有一股不容置喙的魅力的。

方草地和小希也不否认这两年中国经济势头很好，但是他们认为政治方面是更黑暗了，中国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他们抱怨人们好像完全安于现状，个个摆出一副生活幸福完美的样子。

老陈就是其中一个。在重逢小希之前，他觉得当前社会一片祥和，每天都被自己的幸福感动。

身为读书看报的人，老陈甚至有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不久以前还觉得台湾、香港在前，大陆在后，现在感觉大陆在前，台港跟在后；周围的人一向都在批评大陆的贫困落后，突然却高唱起中国盛世的到临；多少年来有识之士说西方制度优越，全世界以美日欧等地区马首是瞻，忽然都纷纷改说他们不行了，现在是全世界学中国。

这当然有错觉成分，经不起一项一项实证推敲，譬如人均收入中国还跟发达国家有很大距离，污染厉害、廉政不彰、人权没保障、言论受管制。但中国就是人多，总实力永远是惊人的，它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经常可以看到国内媒体报道说中国这方面是全球第一、那方面是站在世界前沿。半只半觉间，至少在一般国人的意识中，中国是处处领先了。

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陷入衰退，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长期不振，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提升了内需而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故此再也不必采用遮遮掩掩的重商主义了，堵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以前全世界的制造业怨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价以补贴出口，造成不公平竞争，而西方的劳工团体又批评中国剥削自己的工人以降低出口成本，导致全球劳工福利水准下降。现在，不靠压价出口，人民币可以升值了，人们可以多买进口货、出国旅游以至到处收购外国企业了。个

人收入普遍提高，企业获利，国家税收因此增加。这样，教育、医保，社保都可以加强，还可以加大力度处理环境问题。

何东生说：不能保护工人，做不到全民健保、社保，我们算什么劳什子社会主义国家。听得小希和方草地直点头。

不过度依赖出口不等于不和别国贸易，中国只是相对的跟发达国家脱钩，并不妨碍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更不是锁国。中国还在进行重工业建设，所以需要把德国之类发达工业国的整条高科技生产线拆卸到中国来重组。另外，美国也有些产品是中国暂时做不出来的，向波音飞机和许多精密高科技产品，能花钱买到就尽量买。当然欧美一时间也不能完全不依赖中国货。中国出口欧美的总量减少，正好收窄贸易差。但总的来说，中国大部分商品都能自己制造，山寨不山寨，内部市场够大，有竞争就会价格便宜、品质过得去，发达国家可以卖给中国的工业产品将会是越来越少。中国内部市场这块肥肉，则让外国资本、名牌和零售企业为了进入或留在中国而愿意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这做法不符合 WTO 精神，不过因为发达国家自己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行为已令 WTO 谈判搁浅，无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成了昨日之梦想，谁都不能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话了。

中国最需要的是能源、矿产、原料和粮食，绝大部分来自亚非拉国家。现在甚至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俄罗斯也一边买进中国产品而另一边为中国提供能源、矿产、原料、粮食，所以中国也可以视他们为第三世界国家了。人民币与主要贸易国都订了双边货币交换机制，俨然已跟美元、欧元一样成了世界流通的货币。中国已经是跟美国、欧盟、日本一样重要的经济体，而后三者都在冰寒火热的滞胀期，中国这边风景独好，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接受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增长则连续第三年在百分之十五，这种态势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早期曾经见过，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中国 GDP 年增长也到过百分之十五，不过当时的总量小。简单的说，中国现在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火车头，难怪亚非拉国家都向中国靠近，难怪有人说，美国帝国年代告终，中国世纪正式开始。

老陈、小希、方草地都是不懂经济的，但他们关心中国，也知道关心中国不能不关心经济，所以都很认真的听何东生解说。令他们听得更是张口结舌的是当何东生从经济转而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

美国经济再糟糕，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惟有它拥有全球打击的力量。

中国不能走冷战时期苏联的老路，跟美国全球争霸，做军备竞赛，搞什么保证相互毁灭的对称的恐怖均衡。不，那不是平天下之道，不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国家利益。像何东生这种理性的，并且是深藏不露的中国式理想主义者，知道此路不通，中国国力承受不了。要牵制美国发动远程战争，中国用的是先发制人和非对称的远程袭击能力，要防止国土受侵略并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要成为周边区域的大阿哥而不是世界霸权，用国际理解的话语这就是中国的门罗主义。

美国的核武器，可以远程一击毁掉中国，所以中国要让美国清楚知道，中国是不会等待美国发动第一击进攻的，而是会在之前抢先攻击美国的。换句话说，美国不能恶形恶相的以核武来要胁中国，以免刺激中国先使用核武。这就是先发制人策略。

中国的远程攻击力量，仅足以毁掉夏威夷和美国西岸的一些大城市，但这就已经足够，已将是美国不能承受的损失，就算之后美国的反击可对中国造成百倍的损毁，对美国人民来说代价还是太大。就是用这两招，先发制人和非对称远程袭击，来阻吓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远程核战争。

这也是一种非对称的同生共死默契，核战争是胜者也要付出过大代价的。中国的战略是公开的而且清楚的告诉了美国，以免美方有人弄不清楚状况。同时，中国一直在劝美国不要建设东太平洋反导弹防御网，因为这样会引发中美的核武竞赛，迫使中国发展能够突破美国防御网的洲际导弹、核武潜艇和太空武器。

何东生不认为中美会发生核战，更认为美国以常规战争方式入侵中国国土的机率几乎是零，虽然美国仍在东亚布了重兵。

他说，中华民族历来最大的忧患是外族入侵，国土割裂，以至受异族统治，但现在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今天中国的国土安全系数是华夏五千年历史上最高的：谁还会敢派兵侵略中国本土？

建国后，抛开台海、西藏、新疆的冲突不说，中国对外曾先后跟印度、苏联、前南越和越南在边远地区短期开战，但对国家安全真正有威胁的唯一一次是抗美援朝，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中国周边有十四个陆地接壤国家和六个海域毗邻国家。四九年后，中国已总共协商解决了十四处陆地边界纠纷和两个外岛争议。但是，短期内解决不了的边界纠纷还是有，摩擦断层由印度不承认属于中国的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到中国不承认属于印度的八万四千平方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达旺地区或阿鲁纳恰尔邦，到中越新马菲及文莱在南海，到中日在东海，甚至跟喜马拉雅小国不丹现在都有边界争议。另外，中国在西藏和云南兴建大型水坝和改变河道的项目，越来越受非议，引起了跨国水源争夺纠纷，因为南亚和东南亚多国境内，除了恒河之外的所有主要河流，源头都在我们这边的喜马拉雅地区。

不过，这些纠纷甚至武装冲突都不太可能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当然，何东生知道军方有人很不喜欢他这种论调，那涉及军费利益的问题。不过他虽然不同意那些军方利益集团整天贪得无厌的要求国家多拨军费，但他不会天真到以为大国崛起可以不靠武力作为后盾。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想的是如何最有效的优化国家利益，不用以武制胜。这就要讲大战略。

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是陈义太高，反惹人怀疑，以前中国不断强调绝不称霸、和平崛起、和谐世界，人家相信吗？现在确是别人顾忌中国的时候，倒不如把国家利益和战略清楚的摊出来，让别人知道进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期搬出门罗主义的说法。

在一八二零年代，美国的门罗总统宣布崛起中的美国不会跟当时的欧洲列强争霸，但列强也不要来侵犯美洲，或想把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再度变为欧洲殖民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是为门罗主义。

现在中国也可以仿效当年的美国，宣布中国绝不会和列强争夺全球霸权，但是，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请欧美列强势力其实是指美国退出东亚。这里，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现代之前是属于中国朝贡体系内的。

当亚洲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文明和发源自地中海的欧洲文明在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中国在大漠高山的阻隔下，相对自给自足的自封中土，自视为天下，文化上有很强的连贯性。可能是地缘理由，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的侵略性和扩充性，不如历史上许多强大军政集团，像亚历山大、罗马帝国、阿提拉、十字军、蒙古人、帖木儿、奥斯曼帝国、拿破仑、或大航海殖民主义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或在冷战结束后多年的今天，还在全球各国土地上有八百五十个驻军点的美国。

何东生强调说：中国才不要当吃力不讨好的世界警察，更不想统治别国。到今天有听说中国想去占领别人的国土吗？

他说，以他的理解，中国世纪不是中国独享的世纪，中国世纪是指中国终于可以恢复十九世纪中以前的原有历史地位。中国坐拥自己的天下就够了，不贪图君临世界。这个企图，要让欧美列强知道。中国不想通吃，但欧美也不要想挡住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的崛起和一体化。趁这个世界贸易收缩、欧美都主张自我保护的机遇，中国趁机推出的门罗主义可以改写世界秩序，只要美国在政治上退出东亚，中美欧三强各有互不侵犯的势力范围，各自都可以活得很好。以政治影响的区域化代替争夺全球霸权，反而会在这个无可阻挡的中国崛起时期保障了世界和平。

其实在政治以外的经济领域，全球早就大致形成三个区域，一是欧盟国家，二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三是亚太地区。各区域的内部贸易和直接投资，总量超过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欧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欧盟国家，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主要生意伙伴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或中国。甚至除中东以外但包括澳纽在内的亚洲国家，自二零零七年开始超过一半的贸易是跟其他亚洲国家。现在只是要将政治与经济等量起来，都加以区域化。

政治区域化后，在商言商，欧美中都可以在对方的国土和势力范围内做生意，并各自投资开发非洲、亚洲和拉美，其中有合作有竞争，但都是用商业的准则。譬如在安哥拉，中国、法国、美国企业都拿到离岸石油开采权，当地政府多了选择，就不容易受制于任何一国。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让中国决定重点投资非洲，安哥拉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单一国家，其他供石化能源给中国的非洲国家包括苏丹、尼日利亚、尼日尔、贝宁、加蓬，以至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中国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石油是来自非洲，比重仅次于中东地区。除能源外，中国还在非洲采矿伐林，整片承包农地种中国需要的农作物，也建公路医院码头机场通讯网，从津巴布韦到索马里，中国在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有投资。中国一向主张做生意、交朋友，不干预别国内政，这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所欢迎的态度。中国势将超过美法英而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不是没道理的。

在南亚和中东，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友好，特别是花心思、花本钱在多年的友邦巴基斯坦。这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考虑，一方面牵制现在已变成亲美国的印度，所谓冷印度、热伊斯兰，另方面是因为非洲和中东的石油、矿产要运到中国，最短的途径其实是经由海陆两路运到巴基斯坦西南角的瓜德尔港再北上，沿着中国建造的瓜德尔至道班丁铁路连接到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到中国新疆。这样，我们所需的战略物资就不用独沽一味的全依赖长途航运，因为中国的远洋军力不足以确保印度洋及南海航线不受强大的美国、印度或其他军事力量干扰，特别是在必经的马六甲海峡——印度与美国、新加坡、泰国、印尼、澳洲以至日本海军经常在这片海域联合演习。

中国也不放过接收任何列强手中漏出来的能源。二零零八年油价由一百四十七美元跌到三十三美元，中国就加码进口委内瑞拉、伊朗的石油。零九年俄罗斯突然毁约中止进口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中国也就立即伸援手，跟土库曼斯坦签三十年合约，铺七千公里输气管道把天然气由土库曼斯坦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送到中国。哈萨克斯坦的石油更不用说，中国不单参与开采，长达三千公里的哈中输油管更象征了中国首次以跨境油管直接进口能源。除俄罗斯和伊朗外，里海周边的国家皆为陆地所困，能源出口要经过别的国家，故皆支持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终战略目标，就是建立“泛欧亚大陆能源桥”，驳接中东、伊朗、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到中国新疆。

现在，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促成非洲、中东、中亚、伊朗、巴基斯坦这些地区的局势稳定，不受列强过度操控，阻止宗教极端势力、分裂主义者、恐怖分子颠覆当地政府。为了孤立疆独，中国更对中亚六个“斯坦”国家及土耳其特别示好，邀请了迄今进不了欧盟的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家。伊朗也正式加入了上合组织。意想不到的连以色列也只得向中国示好，以尖端科技输送中国，因为怕中国转移先进武器甚至核武给伊斯兰国家。

中国也不反对俄罗斯着力驱赶美国势力离开中亚、高加索和乌克兰这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不过这些多民族国家并不愿意再投入俄罗斯怀抱，像哈萨斯坦人就不能忘记斯大林害他们颠沛流离、在集体农场吃苦头的日子。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向美国和北约抛媚眼。但中亚各国都认为中国对该地区没有政治野心，大家比较放心跟中国做生意。反而是中国不想让俄罗斯感到中国要

吃进它的地头。两国政府最新的流行辞令是外交协调，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提供巨额贷款给一个在黑海以西、 一向不搭界的欧洲小国摩尔多瓦，就是为了协同俄罗斯抵制西方势力的东进。

中国一直很忍辱负重的在争取俄罗斯为友邦。一个多世纪以来被俄罗斯占去的中国土地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那么大，好几年前中国已放弃追讨，跟俄罗斯共同宣称中俄边界线全部勘定。只要中国不翻案，中俄中间没有理由再发生重大冲突。俄罗斯地大，人口在减少，军事的威胁来自西线的北约势力。它的政治精力，都花在了处理能源收入的不稳定性，管控少数民族的共和共及重振在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这些事情上。新一轮的全球衰退对俄罗斯这个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体打击甚大，幸好当欧洲再减少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时候，中国马上增购俄罗斯能源。自从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和其他经济支柱如大型武器装备和西伯利亚木材，都离不开中国市场。俄罗斯的石油在二零一零年已通过东方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由斯科瓦罗甸送到黑龙江大庆，现在天然气也从阿特莱经过六千七百公里的输气管运到中国，减轻了俄罗斯对欧洲的依赖，也让中国石化能源的来源更分散。因为资金不足及裙带理由，俄罗斯多个寡头企业纷纷接受了中国友好国企入股，共同垄断该国的钛、黄金等贵重金属。可以说，在经济上中俄是互补的。近年多个接壤中国的俄罗斯远东地区都看到这点，改变态度，默许甚至欢迎中国资本、企业和民工进场共同开发。为了两国的核心利益，在大战略考虑下，如果我们不挑起失地问题，中国与俄罗斯现在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何东生说，这次世界重心的乾坤大挪移，是百年难逢的机遇。中国近年真是国运亨通，不过要做到长治久安，治国平天下，何东生认为还有关键的一步：与日本结盟。

要做到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中国和日本要结盟。只有日本改变态度，脱美入亚，美帝国主义才可能撤出东亚，当年的冷战布局才终于可以在东亚瓦解。当中日这两大超级强国联手，世界新秩序就出现了，后西方、后白种人的新纪元就无可逆转的成形了，欧美列强就无可奈何了。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一九二四年要跑到日本宣扬亚洲主义，劝日本不要学西方的帝国主义，而应该跟中国联手实现王道。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者，难道他看不出日本的野心吗？但他知道，光靠日本或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赶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势力，但若中日合作，就谁都阻挡不了东亚的复兴。可惜当年日本没有听孙中山的规劝，反而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害己害人，终弄得中日两败俱伤。

现在，机缘再临。两国政府冒着国内震耳的反对声浪决定结盟，签署两国史上最完整的中日安全条约和最紧密经济关系双边协议。

何东生说：你们可能有所不知，日本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军费名义上只占GDP 百分之一，但日本的经济实体大，而且它跟中国一样，很多费用隐藏在其他预算专案里，包括拨给海上自卫队、太空计划和武器研发的钱，都不在国防预算内。所以，日本的年度国防费用实际数字远高过一般所说占第二、第三位的英国、俄罗斯。与中国公布的数字，但它在高尖技术上领先，而且许多民用工业都可以很快转成军用，实际上是世界第二。你想想，这样一个全球第二或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常规军事力量在中国旁边，如果是不友善的，将多让中国坐立不安？这还没说到驻日本、冲绳、韩国的美军。反之，日本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同样没有安全感，将逼

使它废除和平宪法，做正常国家，与中国军备竞赛，接受美军继续留在东亚，甚至独自发展核武。这样一来，东亚地区会稳定吗？最后两个东亚巨人会不会又是两败俱伤？

要拆掉这个定时炸弹，让中日双赢而美国退出东亚，需要大智慧，或百年难逢的机遇。这机遇就是这一轮全球经济滞胀。可以说，日本经济低迷已超过二十年，每次有爬起来的迹象，又再次倒下去，变得越来越没力气，碰上这一轮全球大衰退，复生遥遥无期，曾经傲视全球的日本工业产品不能寄望在短期内还有出路。在日本最脆弱的时刻，中国的领导人觉得机不可失，要求一向对外封闭、自我保护的日本市场立即开放给中国，特别是容许中国的资本收购或投资日本企业，否则将报复性的等量限制日本工业产品和企业进入中国。这个打击对日本将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现在是日本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八年，日本经济曾稍有起色，就是靠中国市场。

终于，两国政府以自由贸易的理由，冠冕堂皇的签订双边最惠国条约，双方可以无障碍的进出对方市场，像中国以最紧密经济关系协议对待香港特区一样。日本这样对他国敞开大门是史无前例的。两个市场加速一体化，势将可挑战美国、欧盟的总体经济。

中日一联手，韩国和亚细安国家都表示愿意配合中日组成东亚共同市场，甚至澳纽、加拿大西部两省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拉美国家都想加入，组成东亚太平洋共同体。

除了扩大自由行外，中日双方更破天荒的签订优才和投资移民计划，让有专长或资本的日本人移居中国、中国人移居日本。为了迁就老龄化的日本，中国赴日的移民限在四十五岁以上，而日本人移居中国则不设限。就是这样，估计每年以这个计划名义移民日本的国人将在五万以上，不少于赴加拿大的人数。移民原因很多，有为了工作，有为了拿日本护照方便旅行，有为了日本的生活质感，也有因为不想子女在中国受升学折磨。日本来中国定居的多是老人，以他们的退休金在中国能获得性价比很高的照料与享受。换句话说，中国在替人口负增长的日本补充优质人口。这政策象征意义重大，意味着中日两国人民尽释前嫌的互相接纳，就像德国与法国历史上曾是世仇，二战后和平共处并开创了欧洲的新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中日签定互不侵犯的安全条约，任何一方受攻击，另一方将施援手，就如美日安全条约、北约或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的结盟。中国高明之处是为了消解日本的不安，不要求日本废除美日安全条约，现在日本等同于同时受中、美保护，买了双保险。日本跟澳洲、印度的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也不用中止。中国换来的是日本保留和平宪法，不拥有核武，不做军备竞赛。

中日安全条约也钳制了朝鲜，一方面让朝鲜知道核讹诈吓唬不了日本，因为现在日本若受攻击中国是会出手的，另方面也叫日本不用再想以朝鲜的威胁为理由而扩军。倔强的韩国感到孤立后，也开始考虑跟中国签署类似的安全条约，进一步驯服朝鲜的军国主义。

顺带，日本承认钓鱼台等东海外岛为历史属性有待解决的非武装地区，中日双方同意共同开发。这也是中国和越新马菲诸国共同发展南海所依据的模式。中国就是这样，人家承认它是大阿哥，就一切好说，让点利没问题。

上世纪日本侵略中国，至今中国还恨日本人，但今天的日本人其实并不恨中国人。他们以前看不起我们，现在害怕我们，但他们当年是侵略者，所以反而是没有仇中的情结的，这点大家想一想，是可以理解的：你把我们害惨了，你当然不恨我们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败在美国人的手里，日本本土从没给别族占领过，只有美国曾经占领日本，至今在日本国土上还有五万驻军，所以日本人倒是有一种想看到美国受挫的情结的。这是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微妙的深层心理，雪耻的方法不一定是战争，而是尊卑地位的逆转，或至少扯平。这是为什么东亚门罗主义和中日安全条约在日本国内竟然有不少支持者，因为给美国吃了一记闷棍，而中日最紧密关系双边协议的潜台词说明了日本需要中国的扶助，也让许多中国人觉得有面子。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日竟然结盟，东亚共同市场竟然在几年内可能实现，中国主导的东亚门罗主义呼之欲出，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孙中山若在世也会深庆百年梦圆。何东生得意的大呼：妙哉、妙哉！

现实世界的最佳选项

小希抗议：哼，百年梦圆？孙中山活过来也会再被气死！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权在哪呢？百年了，民权还不是给你们随意践踏，动不动就严打、抓人、关监狱。

方草地说：是呀，你说社会秩序乱，矛盾大，黑恶势力横行，可是这乱象是谁搞出来的呀？还不是你们共产党贪腐无能搞出来的？建国都六十多年了！难道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吗？

小希说：依你说，中国已进入盛世，盛世了，为什么还不能依法治国？难道中国不该有法治吗？执政六十多年，还做不到善治！问题都在你们共产党根本不想政治改革，所有政策都成了你们贪官污吏的发财机会。一党专政能解决自己的贪腐吗？看看你们养出来的富二代、官二代，多不像话！完全是权贵资本主义。

方草地说：共产党最虚伪，整天睁着眼睛撒谎、掩饰真相、篡改历史，你骗我、我骗你，上行下效，连年轻一代都学坏了。一个最讲诚信的民族堕落到这样，还说是盛世？

老陈也加入说：说来说去富国强兵，如何占资源，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超日赶美，你们的经济发展成本多高呀，连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给你们透支了。这种走西方工业国家发展的老路，迟早到头，走不下去。

方草地曾在非洲做过生意，看到过另一番的景象。中国企业在非洲做基建项目，都雇用自己的中国民工，不用当地人，无助于当地高企的失业率。中国廉价的小商品充斥非洲市场，毁了当地仅存的制造业。中国人跟那些老欧洲殖民主义者没分别，都是勾结贪腐的当地精英统治阶层，榨取当地天然资源，而不是替当地建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小希又说：一个真的富强大国，为什么这么脆弱，受不了一点批评，要扼杀言论自由？看你们怕互联网的样子，哪像一个泱泱大国？

方草地回国后周游少数民族地区，更因为寻找他父亲和盛世才的足迹，曾跑遍北疆南疆。他的总结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汉人抱怨反相歧视式的不公平，维藏少数民族却感到受屈辱打压，疆藏地方贪腐官僚盘根错节，凭借族群紧张局面自肥，旧恨新怨，新疆、西藏不得安宁。方草地大喝一声：中国不走联邦制是不行的。

老陈说：你何东生就是典型的中国儒生，满脑子治国平天下，整天想当官、想做帝王师，接近权力就亢奋，一进入权力核心就支持威权专制，美其名要绝对权力来办大事，其实都是个人的欲火焚心。办大事不一定是办好事，也可以办出大坏事，后患无穷，这种例子这几十年还少见吗？

何东生笑眯眯的听着，好像在享受批评，然后说："你们说的都对，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更多，比你们知道的更糟糕、更荒谬。前两天我们还开会讨论三峡库区山体滑坡导致长江阻塞将会带来的大灾难，谁都明白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不知道哪一届政府倒霉要去擦屁股而已。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能看别人挑水不腰疼，什么好处都要。人总是要有所弃。大国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拆烂污的事，但只能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真心话，中国是没办法比现在更好的了。"

小希问："什么叫没办法比现在更好？"

何东生说："西方不是有个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他是全善的，不可能故意创造一个不好的世界，是不是？但世界确实存在不完善之处，所以莱布尼茨这个哲学家就替上帝辩护，说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已创造了他能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的现况，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则是现实上不可能的，你不能假设说中国有英国的议会传统，或北欧的社会民主，或美国的广大土地资源，中国就是中国，历史不是白纸可以任意填写，也不能重来，只能从现下开始。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找到现实世界中的最佳选项。"

老陈说："伏尔泰就讽刺过莱布尼茨这种世界不可能更好的心态，'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已经是最好的了'。"

方草地说："听不懂。"

"说来说去，就是替你们一党独裁专政辩护，"小希说。

"那你能提出另一个完整的、可行的更佳选项吗？"何东生问。

"提不出来，并不等于我要接受你的选项，"小希回答。

老陈、小希、方草地的反驳与责难，何东生心里明白着呢。他知道一切归咎到共产党这把双刃剑。怪就怪托洛茨基、列宁当初弄出个一党专政。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受教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考茨基就已经看到问题所在，说官僚一党专政的苏联将会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糟糕，怪不得列宁恨考茨基入骨。

但到了今天，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资本主义一党专政，还能够被替代吗？还是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的最佳选项？

一党专政的确解决不了自己的贪腐，一党专政也必然要管压言论、抑制异己。但不用一党专政，管得住中国吗？能让十三亿五千万人都温饱吗？能执行冰火盛世这样的大计划吗？中国能这么快崛起吗？

有人可能会想，现在中国崛起了，盛世开始了，可以结束一党专政了吧！二十年前的何东生也会这样想，他可能会加入党内的民主改革派，甚至支持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在今天，何东生已经对西方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八九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没有理想，作为中国政权的垄断集团，共产党执政是为了自保，当官是为了图利，根本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这号人物。何东生现在对政治改革不单缺乏激情，甚至犬儒的认为不该改、不能改，一改就乱。他说：就让中国维持现状，平平稳稳的再发展二十年，到时候再说吧。至多，来点小碎步改革，渐进式的推行善政。他没法想象一个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是什么摸样。他不无嘲讽的说：政治改革？有那么容易吗？最后过渡出来的不是你们想要的联邦制，不是欧式社会民主或美式自由民主的宪政，而是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之大成的中国式法西斯专政。

小希回了一句："你们现在就是法西斯了，还用过渡吗？"

何东生也不生气："就算是法西斯，现在也只是初级阶段，你们可还没尝到过真正的法西斯暴政滋味，听你们说话就知道你们对邪恶缺乏想象力。"何东生脑中泛起党内几个法西斯野心家

的样貌，心想如果这几个人掌了权，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有的瞧。他甚至升起一股使命感，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他们上台。

这点何东生是清楚地，这届政府的党内对手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右的，但最大的威胁来自极右。冰火盛世计划其实是继承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衣钵走的，为此得罪了很多势力，树立了不少敌人。老左新左都反对农地私有化，许多大国企不满把原是它们垄断的行业开放给民营企业，而且因为撤销管制和鼓励竞争，减少了官商勾结和官员的寻租机会。更甚者，对一个贪腐已经根深蒂固的执政党，这届政府试图引入财产申报阳光法案来检举官员的合法收入与实际财富不对称的做法，也让许多贪腐官员下决心要联手弄垮这届政府。

想夺权的党内野心家，永远在找当权者的软肋下手。现今这届政府最大的软肋不是别的，正是与日本结盟和暂搁边界争议这两件事。仇日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牵连几代人，现在突然跟日本结拜做兄弟，虽说符合国家的核心利益，许多人还是受不了。边界共同开发，很容易被认为丧权辱国。党内野心家们看准了这点，知道只要点燃着民族主义情绪，扣上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甚至卖国的帽子，这届政府就可能会招架不了，至少民望折损，而世人一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波涛汹涌，也会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扩张性、侵略性的新帝国，落实了中国威胁论，剑拔弩张，不再信任中国，这届政府里外不是人，这就正中党内野心家下怀。何东生担心长此下去，中国的民意会给法西斯野心家绑架。

何东生甚至有点缅怀现已消失的自由派，少了他们当靶子，老左新左民族民粹国粹国家极右等所有反自由主义力量都直接对着这届政府来了。可惜自从世界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后，被视为亲西方的自由派式微，他们的思想在中国失去市场，原自由派人士经过反思后，大多成了这届务实威权政府的支持者，认为不能走西方的道路，认同当前的中国模式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的最佳选项。剩下死不悔改的自由派知名人士则被有效的禁音消声，不能出现在媒体，不准出版、演讲或教学。现在，偶然能在网上打游击般微弱发声的只是如小希一类的漏网小鱼。

天佑我党

真是漫漫长夜，老陈、小希和方草地这一天心情如坐过山车，跟着又受到资讯轰炸，到这刻都精疲力竭，而负责录影的张逗更已经打了几个小盹。

只有何东生越晚越来劲，这几个小时像是他一个人在表演脱口秀，并且什么话都不保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自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多好，很久没这么痛快过。他更意会到，这些话平常是不能说的，今天不说，以后大概见到棺材都没机会说。他也明白自己以前从来不喝北京的自来水，今天一下子喝下几大杯，是会有较异常的反应。

何东生忽然脑中飘起一件最近发生的奇事，心里头痒痒觉得不吐不快，主动跟老陈、小希、方草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国家秘密，最近有恐怖分子，潜进一个国家高度保密的工厂想爆破，还好安全部门收到线报，把他们全部击毙。惊人的是那六个恐怖分子都属于北京一个法兰斯主义小组织，成员都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的学生，知道后我们只能替他们保密，说他们出了车祸，但死不见尸，家长还闹了一通。我说这事是想让你们知道，真正的法兰斯主义已经在中国扎根了。这些大学生能知道这家秘密工厂，一定是党政军内部有黑手，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我只能用法兰斯三个字来形容他们。

小希凝重的问：“死者之中，有姓韦的吗？”

何东生想了想，说：“韦，没有。”

小希问：“肯定没有？”

何东生说：“我的记忆你不用怀疑，何况韦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有的话我一定记得。”

老陈看到小希松口气，知道她想到儿子韦国。

老陈随便找个问题来问：“你们怎么会有线报？”

何东生说：“老陈你不能小看我们的安全部门，他们到处都放了眼线，一般有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坐探……可是怎么就漏了你们几个？”

“为什么他们要爆破那家工厂？”方草地突然很认真的问。

今天，既然冰火盛世计划、治国平天下大计以至国家的国际大战略都已经摊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

“这样说吧，现阶段我们政府跟那些法兰斯的分别是，我们想老百姓有爱心而没有攻击性，法兰斯要老百姓有攻击性而没爱心。那家工厂制造的东西，让老百姓开心，充满爱心，不想攻击别人，所以法兰斯份子要破坏它。这样说可以吗？”

方草地很直觉的说：“是在河北太行山的那家化工厂吗？有自己飞机场的那家。”

何东生有点诧异："你们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看样子我们的保密有漏洞。"

方草地问："那家工厂生产什么让老百姓开心的东西？何老师，你答应过，问什么说什么。"

何东生说："说也无妨，反正我也不觉得是坏事。你们就算没听过 MDMA 也听过摇头丸吧。我们生产是第 N 代的 MDMA，温和、不会上瘾、无副作用，服用后心情特好，觉得世界充满爱，想跟别人拥抱，向别人倾诉心里话，但头脑是清醒的，没有幻觉，像我现在这样子。"

"要这么大的工厂制造摇头丸？"方草地不解。

何东生解释："不是制造摇头丸，根本没有丸，也不是要来卖给别的国家，我们是大国，不是北朝鲜，你不要想歪了。我们只是生产这种化学品自用。"

老陈插嘴："就像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

何东生答："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不过我们根本不是受他影响。我们有个维稳办，里面是有专家学者在做调研的，调研古今中外的维稳技术。其中有个专家研究英国的资料。你知道国外的年轻人，除夕都爱走到街上喝酒狂欢，喝醉酒会闹事。你看足球就知道，英国球迷多暴力。但在上世纪末有好几年，也是他们叫 Ecstacy 的摇头丸流行的那几年，除夕晚上的暴力事件突然骤减。原来英国年轻人吃了摇头丸后，只想摇头，听音乐、拥抱，爱周围的人，跟周围的人倾诉心事。这是摇头丸里 MDMA 化学品的效果，跟酒精和其他迷幻药的效果不一样，酒能乱性，令人兽性发作，有暴力倾向，迷幻药则产生幻觉，不利人际语言沟通。我们的维稳办找哈工大提炼了一些 MDMA 样品，最初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用途，做实验呗，就像零零七特务电影里那个新奇武器研究室，发明了一堆有用没用的东西。

直到政治局研究冰火盛世计划的时候，有常委怕严打效应会让人们太郁闷太消极，影响第二环节五大经济改革政策推行时老百姓的积极性，感叹说最好有一种东西，让人们心情好，态度积极，但又不会有攻击性，影响社会和谐。有个公安口的人在九十年代去过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研究过毒品问题，他开玩笑说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除非全国人民一起嗑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即 MDMA。

就是这样开始的，越讨论越觉得可行，有常委说还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好的玩意。你们知道吗，制造 MDMA 的原材料樑木的油，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多？就是我们中国，巧吧！西方和我们的研究都发觉少量服用对人体应该是无害的，而且没看到长期服用有什么不良副作用，既然有此一招可以让全国人民开心一点，增强国家稳定系数，性价比太好了，何乐不为？

不是说我们政府是办大事的政府吗？于是说做就做，在河北建厂，标准化生产，统一管理，科学的品质保证，添加在所有国家的自来水水库，及牛奶、豆浆、汽水果汁饮料、瓶装水、啤酒白酒黄酒。除偏远地区外，覆盖城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每人服量极微，血尿体检一般检不出来，人们根本不会察觉，只是稍稍开心了一点。不过，这只是个辅助性的小专案，冰火盛世计划的成功是因为宏观政策正确。

老陈、小希、方草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像虚脱一样浑身乏力。

老陈恍然有所悟的说："怪不得我们都嗨赖赖。"

方草地说："可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诚实人一天到晚的嗨！"

小希说："你们怎么可以背着老百姓这样做？"

何东生说："我党做多少事都是老百姓不知道的，从来如此。况且在自来水里添加化学品，很多地方都这样做，譬如香港就在自来水里加氟防蛀牙，都是为了民众好。"

小希说："你这是愚民政策，老百姓都没怨气了，就放过你们了。"

何东生说："确实有这样的目的。"

老陈说："目的既然达到了，为什么还不撤？"

何东生说："好好的何必撤？广大人民心情好，全社会和谐，有什么不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信教的人激增，家庭暴力和农村妇女自杀案例明显减少，不好吗？再说，现在真有点不敢撤，撤了不知道老百姓会不会不高兴。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住久了，回到原居住地的时候就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没有像待在中国的时候那么快乐，整天想回来中国。这样的国际友人我们多着呢！外国有人批评中国，他们就会站出来替中国辩护，说你们去中国住一回，就会知道中国人多快乐。"

方草地说："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反应，我们这里就有三个人不受这玩意控制。"

何东生说：“我跟你们说，这是件好玩意，但只是件小玩意，根本谈不上是控制，只是改变人的一点情绪，老百姓该干什么还照样干什么。我们的跟踪调查数字也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有正面反应，也许有很少量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反应。不过大部分人开心就好了，少数人是会受多数人的情绪感染的。当然还有些例外中的例外。我看出几位是属于那极少数极小数不快乐的人，和我一样。我是故意不喝自来水和国内饮料，就是想看看别人嗨了自己不嗨是什么滋味。今天破戒了！第一次用的时候效果最好，你们看我，喝了你们的白开水，说多少话、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

一直不曾开口说话的张逗突然问：“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在水里的？具体是哪一天呀？”

何东生说：“具体的日期是很清楚的，就是三周严打的最后一天，那天全国第一、二、三线及县级市的自来水厂同步提供这玩意，因为第二天中国盛世就要正式开动，得适当的微调人们的情绪……”

张逗大叫一声“我弄死你！”他像一直愤怒的猛兽，扑向何东生，以庞大的身躯压在孱弱的何东生身上。“我弄死你！”

老陈、小希、方草地慌忙的合力试图拉开张逗，但张逗力大如牛，哪拉得住。

三人喊着：“张逗，放手！”“张逗，你疯啦？”

张逗一边扼住何东生的咽喉一边喊：“是他害了妙妙的，是他害了妙妙的！”

看样子这下何东生要被掐死了。

突然传来妙妙的尖叫声。张逗松了手，回头看。妙妙站在房门边，以严厉的眼神睆着张逗，像在责怪张逗使用暴力。妙妙手中拿着一盘曲奇饼。

方草地就势拉开张逗。

差点闹出人命，老陈、小希都心有余悸。何东生死里逃生，还没喘过气来说话。

张逗微弱的说："是他害了妙妙。就是严打结束那天妙妙开始得病，就是因为他们在水里放了东西。"

何东生沙哑又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疯子！一群疯子！你们……"他本来想赌气说"你们把我杀掉算了"，但她的理智告诉他，对绑架者做这种提示对自己不见得有利。

还是老陈冷静，他拿着水过来，何东生故意不看他。老陈说："我替你松绑，你喝点水，怎样？"

何东生有点心动。老陈解开何东生的捆绑，说："刚才是意外，信不信由你。鸡已经在叫了，天快亮了，黑夜快过去了，你就再忍耐一下吧。"

老陈助何东生喝水，并对其他人说："你们还有问题要问吗？"

方草地说："有，差点给弄忘了。失踪的一个月！严格来说是二十八天，就是何老师你刚才说的无政府的一周和严打的三周，现在除了这里三个人加上你之外，我问过所有的人都不记得。老陈，你也不记得，是吗？"

老陈答："确是没什么印象。"

何东生吃吃笑起来。他说话还有点障碍，咽了一口唾沫，说："再给我喝水！"

方草地问："何老师，你能解释一下吗？是那年大家接种禽流感的疫苗吗？那其实是维稳办研制的健忘药，是不是？"

何东生纠正："不是，禽流感疫苗就是防禽流感的，总共才只有几千万人接种了。维稳办哪有这么神奇的健忘药，有就好了，我们党就真可以随意改写自己的历史了。"

方草地问："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希问："是摇头丸水吗？"

何东生又忍不住的吃吃笑："不知道！如果你问我真正的原因，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掌控，很多事情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你说的失踪的一个月就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方草地问："你们不知道，谁知道？你不要隐瞒……"

何东生接着说："不是要隐瞒，我会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冰火盛世计划取得初步成功后，《人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第一句写"自从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的盛世正式开始……"这只是文章的修辞，把两句话生硬的放在一起。那天后，这两句话在各种报道中不断重复，变成标准套句，人人琅琅上口。

当时中宣布还有一份报告已经注意到，媒体甚至网路都很少有人再提到中间隔着的二十八天。我们认为是人们不堪再去回想痛苦的过去，大家都向前看，忙着赚钱花钱的事。

这对我党是有利的。无政府、严打，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是沾血的，是造孽，如果你信教的话。所以，中宣部就趁势有意不让网路和媒体谈论那二十八天。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网管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传统媒体就更不敢不听招呼，完全在掌控中。加上中国盛世开始后，大家对西方失去兴趣，老百姓都爱看我们自己五花八门的媒体，看境外媒体的人少之又少。这样一来，本来已经很少有人谈论的二十八天，就真的在公共论述中不见了。

然后，一件至今我都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越来越多人真的忘了那二十八天，不是一般的一时忘记，而是压根儿记不起有这回事，就像有些人无意识的在记忆中抹掉一些童年的重大创伤。

中年以上的人们并没有忘掉更早前的八九六四，只是在这两年盛世，大家日子过得好，已很少人有兴趣再去关注文革、八九六四，那是自然的淡出。

但人们是真的记不起那二十八天。

是不是跟水和饮料有关，我不能肯定。中南海有特别供应的水和饮料，我们喝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虽然有些人自律性没这么强，到处乱喝也说不定。我想说的是中南海里的人一般都记得那二十八天，而且也都知道中国境内出现了集体的选择性失忆。

我刚意识到这回事的时候，还到处故意试探各个圈子的人，包括中低级干部和专家学者，果然是真的没有记忆了，像自我洗了脑一样。才没多久以前的事就不记得，太奇怪了，但事实确实如此。

不记得最好。上一届的班子，手上沾了那二十八天的血，巴不得大家都忘了这事，于是立项修改那二十八天的资料，譬如现在所有图书馆里的报纸，都是电子档，我们就重编一下那二十八天的历史，主要是将中国盛世正式开始的日期提前了二十八天，跟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连起来，不再存在无政府一周和严打三周。这个改动，竟然没人抗议，也几乎没人察觉，偶然国内外有人提及，也给过滤掉了。很快，新版本就成了惟一版本。实际上我也很惊诧，中国人怎么会这么健忘？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没错，中央主管宣传的部门是做了些工作，但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如果不先是老百姓自己想忘记，我们也不可能强迫大家忘记。是中国老百姓自己主动给自己吃了健忘药。

小希和方草地都焦急的问：“为什么？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解释的。”

何东生说：“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不知道！”

小希和方草地都呆住了。

何东生见大家没话，再补充说：“我真的没办法解释，我也很纳闷。可能现实世界不想侦探小说，不是每件事都有完美的解释。我承认，这也是我个人解答不了的最大的一个谜，为什么老百姓会集体失忆？可能人就是善忘的动物，人们就是渴望着忘掉一些历史。可能中国共产党运气就是好。可能是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的，六十年还不够。可能是神迹，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可惜我是唯物主义者，否则我一定会说这是天意，是上天想共产党继续执政下去。天佑我党。”

小希、方草地都沮丧的呆坐着，只有何东生像是个胜利者。老陈也听得愣在那里，良久才回过神来，看到窗外已露白，说：“东生兄，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之间有个同生共死的默契，今晚的事，大家不说，这样，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你可以继续你的升官发财，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各位，没其他事，我们就让何先生回家。”

小希、方草地和张逗都没话，老陈平和的对何东生说：“你可以走了。”

何东生犹疑了一下，站起来，缓缓的走到门前，然后停下来，转身自辩说："你们认为我稀罕升官发财？我这是为国为民！"

众人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何东生幽幽的补了一句："随你们信不信"，然后出门。

顷刻，听到越野车开走的声音。

老陈、小希、方草地默然不语。

张逗把录影录音备份分给大家。

这时候，方草地说："那我该走了。"

老陈说："对！"

方草地问："我带您们到市区？"

老陈说："不，天亮了，我跟小希自己走到路边去搭车，你赶快走吧！"

方草地跟众人拥抱道别，开他的切诺基走。

张逗问老陈："陈老师，会有事吗？"

老陈说："一半一半吧！"

张逗说："我懂。"

小希说："好好照顾妙妙。"

三人也拥抱告别。

走出门外，老陈对小希说：“我在云南边境那边有朋友，他们都没有嗨赖赖的感觉，你愿意跟我一起过去吗？”

小希想了片刻，说：“有机会，我想把我妈也接过去。”

老陈说：“没问题！”

东方既白，两人半遮着自己的眼睛，迎着刺目的晨光，走着。